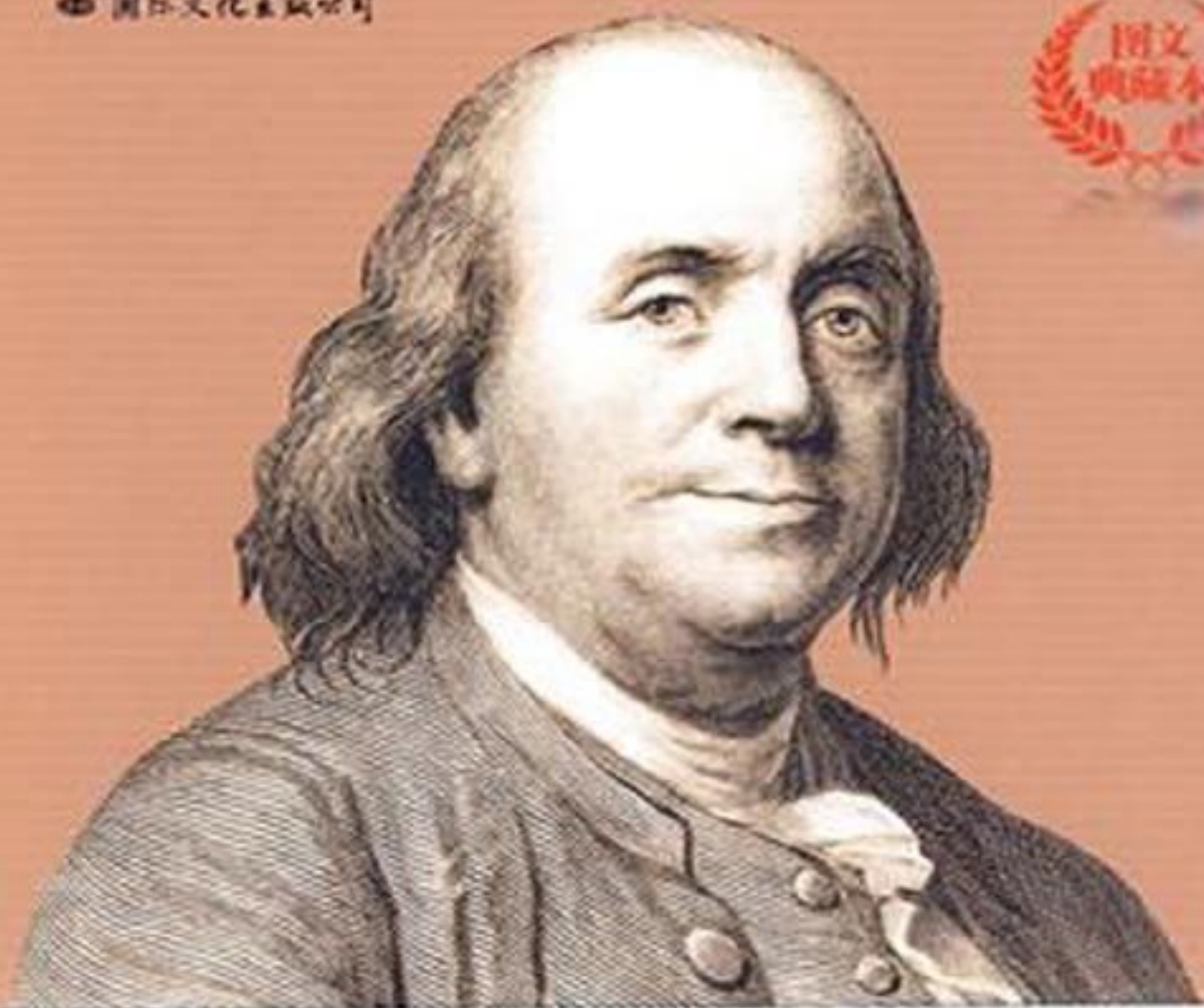


富兰克林自传

BENJAMIN FRANKLIN

(美) 本杰明·富兰克林 著
唐长孺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当代史学大家唐长孺代表译作
留给年轻人的宝贵精神财产

影响世界两百余年的励志经典，改变美国人命运的二十种著作之一，历届美国总统必备参政枕边书，有75%的世界500强企业领袖阅读过此书，超过90%的美国人承认接受过《富兰克林自传》的影响。

完整呈现自传原貌的图文典藏本

- [封面](#)
- [第1部 正传](#)
 - [正传前言](#)
 - [家族逸事](#)
 - [少年印刷工](#)
 - [兄弟失和](#)
 - [独闯费城](#)
 - [总督的“赏识”](#)
 - [与科林斯的交往](#)
 - [费城生活](#)
 - [与劳尔夫的交往](#)
 - [伦敦的印刷工生涯](#)
 - [再返费城](#)
 - [再与凯默合作](#)
 - [我的思想观](#)
 - [合伙创办印刷所](#)
 - [创办讲读俱乐部](#)
 - [办报成功](#)
 - [自立门户](#)
 - [结婚](#)
 - [建立订阅图书馆](#)
- [第2部 正传续篇](#)
 - [两封来信](#)
 - [续传说明](#)
 - [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 [读书是我唯一的乐趣](#)
 - [道德圆满计划](#)
- [第3部 续传](#)
 - [我的政治观](#)
 - [我的宗教信仰](#)
 - [《穷理查年鉴》](#)
 - [编报心得](#)
 - [汉姆菲尔牧师](#)
 - [苦学多种外语](#)
 - [回到波士顿](#)

- [读书俱乐部壮大](#)
- [初入政坛](#)
- [热心公益事业](#)
- [怀特菲尔德牧师](#)
- [事业取得成功](#)
- [教友会](#)
- [发明新式火炉](#)
- [开办学校](#)
- [募捐技巧](#)
- [关注市政建设](#)
- [奥尔巴尼计划](#)
- [为布雷多克捐输](#)
- [担任西北边防军务](#)
- [自然科学成果](#)
- [出使英国](#)
- [被扣在纽约](#)
- [终于到伦敦](#)
- [第4部 补编](#)
 - [不辱使命](#)
- [附录 富兰克林年表](#)

第1部 正传

（写于1771年）

富兰克林自传的这一部分是他于1771年，在当时英国特怀福德镇圣阿萨夫教堂主教家写给其儿子威廉·富兰克林的，正如作者指出的，“这些所写的目的在文章开头表示过了，里面包含一些对于别人并不重要的家庭逸事”。

正传前言

亲爱的孩子：

我素来就喜欢收集我祖先的一些遗闻逸事。你也许还记得，当你随我在英格兰时，我曾为了这个目的跑过远路，去遍访亲族中的遗老。想来你也会同样喜欢知道我一生的经历，可其中的许多事情，你还不熟悉哩！恰巧我现在在乡村中休假，预计可有一星期的空闲，我就坐下来把这些事写出来给你。

我这样做，也还有别的原因。我生长在贫穷和微贱的环境中，经过许多艰难，在世界上居然有点财富和相当的声望，并且我一生的经历带有很多幸运的成分，我运用处世之道，靠了上帝的保佑，获得成功。我的子孙也许喜欢知道，他们可以找出一些事情正适合于他们自己的境况，而取以为法。

那种幸运，当我回忆它的时候，常常使我想，如果它给我以如意称心的话，我绝不反对把同样的生活从头重演，不过要求享有作者在再版时改正初版错误的权利。这样，我除了改正错误之外，还可以把一些不吉祥的灾难和事件改变一下，使别人更为舒服一点。就算这点也被否定了，我仍旧愿意按原样重度一生。但是这样的重演是不能指望了，那么最接近重演的该是回忆平生而把它写下来，使这回忆在可能的范围中传之久远。

因此，我也将纵容这个在老人们是那么自然的癖好，来絮絮叨叨地谈他们和他们自己的旧事。并且我将谈得不使为了敬重长辈才不得不来听的人厌烦，因为这本书的读或不读，原是随人的便的。

最后（我最好自己承认，不然的话会没有人相信我），或许我还应该深深感谢自己的虚荣心。的确，我从来很少听过或看到过开始时说“我绝不存有一点虚荣心”等话，而紧跟着就自夸自赞起来。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有虚荣心，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份的。我对于虚荣心，独采取公平态度，深信虚荣心常使人得到好处，并使他交往的人都受其益。所以，在不少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为他一生幸福中的虚荣心而感谢上帝，这完全是无可讥笑的。

既然我说感谢上帝，我愿自己承认我过去在上帝的福荫下，已享有上述的幸福——上帝以处世之道引导我，并赐予我成功。对于将来，虽然我不应妄测，但我的这种信仰却诱我希望有同样的好处仍旧降临到我身上，继续着这种幸福，或者使我有能力负担不可避免的逆境，可以像别人一样来体验它。

我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只有上帝能够知道，也只有他的权力能够福佑我们，甚至在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也如此。

家族逸事

我的一位伯父的札记曾经传入我手（他有同样的收集家族逸事的癖好），供给了我一些关于我们祖先的事情。从这些札记中，我才知道这个家族住在北安普敦郡埃克顿村，已有300年之久了。以前还有多少年月，他就知道了（或许是从“富兰克林”这个词被这个家族用为姓氏的时候起的。当时立一个姓氏是流行全国的，而“富兰克林”这个词以前是一个自由农阶层的称号）。

他们保有30英亩的不动产，以铁匠之业为辅助，这个行业直到传至我伯父的时候，都以长子继承，我伯父和我父亲遵行这个惯例，都以长子继承。我查阅埃克顿村的户籍簿册，找到了他们出生、婚娶和丧葬的记录，不过只有1555年以来的，这之前的已无簿册可考查。从那些簿册中我知道我是五世以来的幼子之幼子。

我的祖父托马斯生于1598年，住在埃克顿村，直到他年老力衰不能做工的时候，才去和他的次子约翰一起住。约翰是牛津郡班伯里的一个染匠，我的父亲当时正跟着他做学徒。我的祖父就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我们在1758年看见过他的墓碑。他的长子托马斯住在埃克顿村的老宅里，后来老宅传给了他的独生女。这位独生女和她的丈夫（威灵堡一位姓菲雪的）又把田宅卖给了伊斯德先生，而伊斯德现在还是那里的业主。我的祖父有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分别是托马斯、约翰、本杰明和约塞亚。我愿尽我所知，把他们的事情写下来给你，可惜有些札记不在手边。如果那些札记不曾在我外出的时候遗失，那么你会在那里发现许多更详细的情节。

我的大伯父托马斯继承父业，学了铁匠。但是，他天资聪敏，在求学方面受到（就和他的弟兄们一样）当地教区的大绅士帕尔梅先生

的鼓励，取得了充任秘书职务的资格，也是北安普敦郡城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人，许多建议都与他有关系。他还受到哈利费克斯爵士的高度重视和赞助，是一名在当地相当有名的人物。他逝世于1702年1月6日，四年后我在同一天出生。我记得当某些长辈向我们述说我大伯父的生平时，最使你感到惊奇的是有些地方很像你所知道的我的情形，你曾经说：“他如果你出生的那天去世，有人会以为是灵魂转世呢！”

我的二伯父约翰是学染匠的，我想是毛织品的染匠。

我的三伯父本杰明是学染丝的，在伦敦当学徒，他是个聪明人。我记得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曾到波士顿我父亲的家里来，并和我们住在一起有几年之久。他活的年纪很大。他的孙子塞缪尔·富兰克林现住在波士顿。本杰明留下两大本手写的诗稿，都是他自己的诗，包括偶然的几篇是写赠亲友的，这一部分送给了我作为一个范本。他曾创造了一种自己独有的速记法，还曾教过我，不过，久不练习，现在我已经完全忘了。我的名字就是跟了这位伯父起的，他和我父亲感情特别亲密。他是很虔诚的教徒，每逢有出色的牧师讲道，他一定前去参加听讲，用他的速记法记下来，因此他存有许多讲道的速记本子。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照他的染匠职位来说或许是大才小用了。我新近在伦敦得到一卷他所收集的有关公共事务的重要时事论文，是从1641年到1717年的。就卷数的编号可以看出是缺了很多的本子，但还剩有对开本8册、四开本和八开本24册。一个贩卖旧书的商人收到了这些本子，由于我有时买他的书，他认识我，就把这些本子拿来给我。这像是本杰明去美洲时遗留下来的，算来那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有许多地方他还在书的边上作了注释。

我们这个微贱的家族很早就信奉新教，在整个玛丽王朝时期一直都是新教徒，当时因为他们强烈反对天主教会制度，所以有时会处在

招惹灾难的危险之中。他们曾得到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为了隐藏和保全它，就用绳子把它绑在一个折凳背面。当我的曾祖父给家人诵读时，便把折凳翻转过来倒放在膝上，翻读绳子下边的那些书页。期间，留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口放哨，如果他看见宗教法庭的传令官走来，就立刻报信。一旦有这种情况，曾祖父就把折凳再翻转过来正放在那里，《圣经》仍像往常一样隐藏在折凳下面。这件逸事我是从三伯父本杰明那里听来的。我们全家族都信英国国教，直到查理二世王朝行将没落。当时有些教堂的牧师因不信国教而被斥逐，在北安普敦郡举行的非国教的宗教会议上，本杰明和约塞亚皈依了它们，并终身矢志不渝，家族中其余的人仍旧属于圣公会。

约塞亚，我的父亲，早年就结婚，大约在1682年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迁移到新英格兰去了。当时法律禁止非国教派的宗教徒集会，并且这种集会常常受到扰乱。我父亲的熟人中一些重要的人迁移到那个地方去，他也被说服跟他们一道到那个他们希望享有信教自由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他的这位妻子又生了四个孩子，而他的继室生了十个，共十七个。我记得一次同时坐在他桌前的就有十三个之多。他们都长大成人，男婚女嫁。我是最小的男孩子，只有两个妹妹比我小。我生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继室，名叫阿拜亚·福格尔，是彼得斯·福格尔的女儿。彼得斯是新英格兰第一批移民中的一个，曾被科顿·马瑟在本国宗教史上光荣地提到过，称他为“敬神而饱学的英国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曾听说他写过各种各样的作品，却只有一篇是付印了的，我在前些年曾读到过。这篇写于1675年，是用那个时代民间流行的普通诗体写的，论及当时那里政府的设施。这首诗支持了信仰自由，代表了浸礼会、教友会和那些曾遭受迫害的别的教派，讲明印第安人战争以及其他灾祸之所以降临，皆由于宗教迫害，这些正是上帝对此种严重罪行的惩罚，并且鼓吹废止那些不仁慈的法律。我觉得全诗都写得坦率、磊落。这诗的结尾六

行，我还记得，虽说其前的两节我已忘了。结语的主旨是说他进行批评是出于善意，所以他愿意让人知道他就是作者，他说：

由于对匿名兴谤的事

我是从心里憎恶它；

我现住在雪本城，

我的名字我定要写在这里。

你的没有恶意的真正朋友

——彼得斯·福格尔

我的哥哥们都当了各种行业的学徒。

我8岁的时候，被送到文法学校去读书，我父亲想把我——作为他十个儿子中的一个——贡献到教会去服务。我在读书上的早慧（那一定是很早，我简直不记得我不能读书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他的朋友们全都认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学者，这些都促使我父亲送我去读书。我伯父本杰明也赞成，他提议，如果我愿意学习他的速写方法的话，他就把他速记的布道讲演的册子全都送给我，就像开店一样作为资本先期储备起来。不管怎样，我在文法学校上学实在不到一年，虽然在那期间我已渐渐从那一年级的中等升为全级之冠，并且还进入了高的年级，按规定在那年年底就要升到三年级了。但是这时我的父亲考虑到上大学的费用，既有这么大的一个家庭负担，他不能很好地供给，并且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后来也多穷困不能自足，我听他向他的朋友们说过，这些理由使他改变了最初的主意，叫我从文法学校出来，又送我到一個写算学校去。这所学校的主办人是那时有名的佐治·勃朗威尔先生，他的办学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因为他用的是温和和

鼓励的方法。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很快地把字写得很好，但是在数学上我失败了，毫无进步。10岁时，我被叫回家来帮着父亲做事，是制造蜡烛和肥皂。这个行业他也没学过，他一到新英格兰，看出他的染色业很少需要，不能维持他的家庭，他就改了行。于是我就干一些剪烛心、浇灌烛模、看守店铺、跑腿送货的工作。

我不喜欢这个行业，极愿去航海，我父亲却宣称反对此事。不管怎样，因为住在水的附近，我就常到水边去并很早就学会了游泳和划船。我同别的孩子们在小船上时，通常都是让我来指挥，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情形时。就是在别的事情上我也总是许多孩子中的首领，有时曾令他们陷于困难境地。我想举出其中的一个例子，它显示出我早年突出的协作精神，虽说在当时是不合适的举动。靠近水磨那里有一个咸水池，涨潮时，我们常常站在池边钓鱼。由于过度地践踏，我们把那里弄成一个泥洼了。我的计划是在那里修筑一个钓鱼台，以便我们在上边立脚，我还把一大堆石块指给我的同伴们看，那些石块原是准备在池边盖新房子用的，却正合我们所需。到了晚上，工人们已经下工走了，我就集合了若干我的游戏伙伴，像蚂蚁一样努力地工作起来，有时两三个人抬一块石块，把它们都搬光了，修成了我们的小钓鱼台。第二天早上，工人们一见石块堆丢了，吓了一跳，左找右找在我们的钓鱼台找着了。他们追究探访搬动石块的人，于是我们被发现了，并受到埋怨，有些同伴还受到父亲们的呵斥。还有，虽然我辩解这工作是有用的，我的父亲却教训我说不诚实的事没有一件是有用的。

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一点我父亲的风度和性格。他具有很好的体格，中等身材，很结实、很强壮。他天资敏巧，会画画，会一点音乐，有清脆悦耳的嗓子。他往往在全天店务完了之后的晚上，在他的提琴上演奏圣歌，同时随之歌唱，那声音是很好听的。他也有机械学的天赋，偶然用到其他行业的工具是很灵便的。但是他最大的长处却

在于深明事理和判断果决，不论对私事或公事都是如此。在公共事务上，他的确不曾担任过职务，因为他要抚养人口众多的家庭，窘迫的环境就把他牢牢地拴在商业上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时常有领袖人物来造访，他们征询他对镇上的或他所在的教会的事务有何意见，他们对于他的判断和劝告表示极为佩服。也常有一些人来和他商量自己所遭遇的困难事情，并且他常被选为两方争执时的调解人。他常喜欢邀几位明达的朋友或邻人来家里围桌叙谈，并且总留心引起一些机敏有益的话题来辩论，因为这可以增进他的孩子们的智慧。用这个方法，他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什么是善良、正直和人生处世之道上，而绝不或很少注意到桌上的食物，菜烹调的好坏、过时或当令、对不对胃口等，这样我就养成对这些东西如此地不注意，以致在我面前摆的是哪种食物都不去区分，直到现在，如果在饭后几小时来问我吃的什么，我很难回答。这习惯在旅行中对我很方便，而我的旅伴们有时却为了他们长时间养成的更精致的味觉和食欲得不到满足，而感到很不愉快。

我的母亲也有同样的好体格，她抚养了她的十个孩子。除了我父母去世时的病之外，我从不知道他们生过一点病。我父亲活了89岁，母亲85岁。他们合葬于波士顿，在那里，我于几年前立了一个大理石墓碑，刻有碑文：

约塞亚·富兰克林

与

阿拜亚·富兰克林

埋葬于此。

他们婚后相爱地共同生活了

55年。

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任何有薪俸的职务，

靠了经久不懈的劳动和勤勉，

以及上帝的福佑，

他们维持着一个大家庭

甚为舒适，

且抚育了十三个子女

和七个孙儿，

颇有佳誉。

由此看来，读者，

应当努力勤谨，

勿不信上帝。

他，一个敬神而谨慎的人。

她，一个贤明而淑善的妇人。

他们的幼子

以孝子的心情来纪念他们

敬立这个石碑。

约·富，1655年生，1744年卒，享年89岁。

阿·富，1667年生，1752年卒，享年85岁。

从我这杂乱无章的絮叨中，我觉得我已渐渐老了，我往常是写得很有条理的。不过一个人原也不必穿起大礼服好像赴舞会似的去赴私人的约会，这也许只是懒散罢了。

少年印刷工

言归正传：我继续在我父亲店中干了两年，也就是直到我12岁。我的哥哥约翰，本来是学习蜡烛匠这一行业的，却离开了父亲，结了婚，且跑到罗德岛去住了。显然我注定了要顶他的缺而成为蜡烛制造商，但是我仍旧不喜欢这个行业。我父亲深深考虑到如果他不为我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我一定会像他的儿子约塞亚那样，逃到海上去做水手，使他大为伤心。所以他有时带我出去散步，并造访小木匠、泥水匠、车匠、铜匠等，看他们做活，他就可以观察我的爱好，并力图把我的爱好吸引到某些手艺或别的在陆地上的行业上来。去观察娴熟工匠使用他们的机械工具，使我很喜欢，而且对我很有用。凭借常看也就学会了一点，当不能雇到工人时，我自己也能够在家中做些零活。我也曾为了实验做了一些小机械，当做些机械实验的意向在我心里是新鲜而热烈的时候。最后我父亲终于决定叫我跟伯父本杰明的儿子塞缪尔学制刀业，他在伦敦学过这个行业，大约那时正在波士顿开业。我跟他见习了一些时候，但是他希望我交学费，对此我父亲很不高兴，把我又领回家来了。

我自幼喜欢读书，手中所得到的一点钱全都花到买书上了。因喜欢读《天路历程》，我收集的书第一部就是分做数小册的约翰·班扬文集。后来我把它卖掉了来买柏顿的《历史文集》，这文集是小贩们卖的书，价格很便宜，全部有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小图书馆里大都是神学争辩的书，其中的大部分我曾读过，并且曾一直惋惜，在那一时期我正是求知若渴的时候，但自从决定了我不去当牧师，我就不能得到更多的好书。那里有一本普鲁塔克著的《名人传》，这本书我读得很熟，并且认为那段时间是花费得大有好处的。还有一本笛福著的《计划论》和另一本马瑟博士著的《为善论》，这两本书或许曾使我思想转变，而对我后来一生中的几件大事有着影响。

这个酷爱读书的习惯，好不容易使我父亲决意叫我去做一个印刷工人，虽说他已经有一个儿子——詹姆斯——学了这个行业。1717年，我哥哥詹姆斯从英国带回来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就在波士顿开办了他的印刷所。比起我父亲的行业来，我更喜欢这个行业，但是仍旧热望着航海。为了防止这种倾向的可怕后果，我父亲就急着把我束缚在哥哥那里。我抗拒了一些时候，但终于被人劝服，签订了学徒合同，当时我还只有12岁。我要做学徒一直到21岁，仅仅允许我在最后一年支取最低的工资。在短时期内，我就把事情做得很熟练，且成为了我哥哥的有用帮手。当时我有一些接触好书的机会了，认识了几个书店里的学徒，使我有时能够借到一点书，那些书我要十分注意迅速归还和保持干净。有时一本书是晚上借来而必须在次日一早送还的，我就常常振作精神在我屋中读到深夜，免得到时不还这书就被当做遗失或缺货了。

过了些时候，一位藏书很多，常常到我们印刷所来的聪敏商人马修·亚当斯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图书室去，并且欣然地把我所选择的一些书借给了我。那时我迷上了诗，还作了一些。我的哥哥，以为这是大可利用的，就鼓励我，使我即兴地作了两首民谣。一首题为《灯塔的悲剧》，内容是述说灯塔看守人沃西·莱克和他的妻女沉船的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述说海盗提奇（或黑胡子）就擒之事。两首诗实在不好，都是用市井俚俗诗体写的。印出来之后，我的哥哥叫我沿街兜卖。第一首销路很好，因诗中所述是新近的事实，得到好评。这事使我妄生虚荣心，但是我的父亲挖苦了我的成绩，并劝我作罢，并且告诉我作诗的人一般都是乞丐。这样我就避免了当一个诗人，极可能是一个十分拙劣的诗人。不过散文的写作对我一生的经历却是大有用处，且是我上进的主要方法。我要告诉你，在这种情形下，我是怎样得到写作上的一点能力的。

在城里另外有一个嗜读的孩子，名叫约翰·科林斯，我跟他过往甚密。我们很喜欢争辩，并极愿驳倒对方，这种好辩的脾气，很容易变成坏习惯。这种不需要拿到实际中来的辩论，在人面前往往使人极不愉快。因此，除了破坏清谈以外，你原本可以交朋友的地方，却成为使人憎嫌甚或是仇人的制造所。在阅读我父亲有关宗教的辩论书籍时，我就见到了这点。我久加观察，发现明白的人们很少陷入其中，除非那些律师、大学里的人和教养在爱丁堡的各种各样的人们。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科林斯与我就一个问题引起辩论，这个问题是女子受专门知识的教育是否适当，以及她们能否从事研究。他的意见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因为她们对这事是天生不能胜任的。也许有点为争辩而争辩，我就站在反对的一方，他天生比我善辩，又曾准备了很多的话。并且，据我想，有时他压倒我是靠他的口才比靠他的坚强理由更多些。没有得出定论我们就分了手，且要有一些时候不会再相遇，我坐下来把我的辩论写出来，誊清了寄给他，他回答我，我又答复他。双方都寄了三四封信之后，我父亲偶然看到我的信稿。他并未加入争辩，只乘机向我谈论起我作品的体裁来，他评断说，虽然我的拼写和标点正确较对方为优（这要归功于印刷所），但在辞句优雅、条理明晰方面我却不如对方。在这些方面，他举出几个例子使我信服。我知道他的意见是公平的，从此对于文体更加注意，且决心努力改进。

这时的前后，我偶然看到一卷残缺不全的《旁观者》报，那是第三卷。我以前一本也没看见过。我买了它，读完了它，读得十分愉快。我认为文章写得极好，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很想模仿它。抱着这个念头，我取出其中的几篇，把每句的大意摘要录出，放置几天以后，再试着不看原书，用自己想到的某些合适的字，就记下的摘要加以引申复述，要表现得跟原来的一样完整，把原篇重新构建完成。然后我又把我写的《旁观者》拿来与原来的比较一下，发现我的一些错

误并加以改正。但是我发现自己缺乏词汇，或在记诵和运用词汇方面缺少准备。我想如果在那时以前我还继续作诗的话，一定能获得丰富的词汇。因为为了合律和协韵，写诗常常需用意义相同而长短不同、声调不同的字，这样就会把我摆到继续不断搜求大量词汇的需要下，也会帮助我记住它们而能运用自如。因此，我把一些故事改写成诗，过了些时候，当我把那散文已完全忘净了，我再把诗改写成散文的格式。有时我也把我记录的摘要大意打乱，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开始理出整句、完成全篇时，就先竭力使它们还原为最好的次序。这样是为了训练我的构思能力。而后再把我的作品与原文比较，发现错误，再改正过来。有时我竟生发妄想，在某些意义不大的细节上，认为我已是十分幸运地改进了原文的方法和文体，而这妄想鼓励我自以为可在后来成为一个过得去的英语作家。对于当作家，我是非常有雄心的。我做这些练习和阅读的时间是在晚上下班以后，或在早上工作开始以前，或在星期日。星期日我总设法独自留在印刷所里，尽力避免平常出席公众祈祷会。这件事，在我父亲管教之下时，他时常严格地要我参加，不过，我实在仍认为那是一种义务，虽然对我来说，我匀不出时间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16岁的时候，偶然见到一本书，是特里昂写的，推荐了一个素食谱，我决心严格按这个食谱吃素食。当时我哥哥尚未结婚，没有成家立业，他自己跟他的学徒都在别人家中寄食。我的戒食荤腥，引起了不方便，还常因这个特点受到责备。我学会了几样特里昂式的烹调方法，如烧土豆饭、制速成布丁和几样别的饭菜，就向我哥哥建议，如果他每星期把我饭费的半数付给我，我便自己烧饭吃。他立刻同意了，并且不久我便发现我还能把他付给我的钱节省下一半来，这成了我购书的额外基金。此外，这件事对我还有别的好处。我哥哥和其余的人到印刷所去吃饭，我一个人留在所里，并且，很快地吃完我的点心——那常常不过是一块饼干或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一个从面包店买来的果馅饼和一玻璃杯白开水——我就能利用其余的时间来读

书，一直读到他们回来。由于经常注意节制饮食，头脑就更清晰敏捷的缘故，我在读书方面大有进步。

现在要谈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深愧对数学的无知，在学校时我学了两次都未学好，于是我把柯克的算术书顺利地全部自学完。我也读过舍勒和斯图美的航海书，了解了书中包含的一点几何学，但对那门科学从来没求深造。约在这时，我读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和波特洛亚尔派的会员们所著的《思维的艺术》。

当我力求文体上的进步时，我偶然找到一本英文语法书（我想那是格里·伍德所著的），在书的末尾有论及修辞学和逻辑学的两篇简短概要，后一篇是用苏格拉底辩论法的范例作为结语的。此后不久我就得到色诺芬著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种辩论方法的实例。我被这个方法迷住了，就模仿它，扔掉我粗暴的反驳和固执的辩论，而采取谦虚的、探究的、怀疑的方法。于是，我读了莎弗茨伯里和科林斯的书以后，就成为一个对我们教义中许多论点有疑问的怀疑论者。我觉出这种方法对我很稳妥，且很能困窘那些我用它去反驳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方法，不断地练习它，并且渐渐能够很有技巧、很熟练地去折服别人，即使他们是很有学识的人，而且对于那个结论他们也不能预见，以致让他们陷于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我就得到胜利，而那常常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理由所应得的。我继续运用这种方法不多几年，就慢慢地扔开它了，只剩下用谦虚的话表示意见的习惯。当我提出任何可能引起辩驳的观点时，永远不用“确实的”、“无疑的”，或其他对于一个意见表示肯定语气的话，而宁愿说“我以为”或“我认为某事是如何如何”，“依我看来它似乎是”或“我认为它应该是如此如此”，“由于什么什么理由”或“我想象它是这样，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个习惯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当我有机会述说我的主张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信服，因之我曾不断得到高升。并且，谈话的主要目的是“对别人说”或“听别人说”，“使人愉快”或“使人信服”，

因此我谨劝那些善意的、明白事理的人们不要以固执傲慢的态度来降低他们为善的能力才好，这样就很少陷于被人厌憎的境地，从而引起反感，使那些谈话的目的都归于失败。别忘了，是为了那些目的我们才谈话的，那就是说，要交流见闻，互相愉悦。因此，你若想和人谈话，用一种抬高自己意见、固执独断的态度，会引起别人反感而不注意听你讲话。如果你希望获得和增进知识而向别人征求意见，而你同时还表现得固执己见，那么，谨慎、明晓事理的人因他们不喜争辩，或许会躲开你，让你坚持己见，依然故我。还有，用那样的态度，你会很难使你自己得到听的人们的欢心，或劝诱人们赞同你的观点。蒲柏明断地说过：

人们一定会受教，如果你没有教诲他们的样子，

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便说是他忘记了。

他更进一步劝告我们：

说的虽然是确实的，也要用谦逊的词句。

他可以配上另外一句，而他却配上这样一句，我觉得不是很确切：

因为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假如你问，为什么不很确切？我必须重引这两句：

不谦虚的话没有辩解的余地，

因为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那么，“缺乏见识”（人如缺少了它是很不幸的）不正可作“缺少谦虚”的辩护词吗？而下面两句不是更确当吗？

不谦虚的话只能有这个辩解，

即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是否如此，我应该请求更高明的评断。

兄弟失和

我哥哥在1720年或1721年，曾创刊了一种报纸。它是当时在美洲新大陆出现的第二家报纸，叫做《新英格兰报》。在这之前仅有的一家是《波士顿时事通讯》。我记得，他的计划曾被几个朋友们劝阻，不像会成功的，在他们的评断中，认为在美洲有一种报纸已经够了。在这个时候（1771年），那里报纸已不下25家了。他照旧按计划进行，而我在排好铅字印完报纸之后，就被派出去到各条街上的订户那里去送报。

他的朋友中有几位有才智的人，他们为这份报纸写些短文以自娱，这使报纸得到声誉，销量增加，这几位先生时常来访。听了他们的谈话和他们的文章受到称赞的叙述，我也想到他们中间试一试。但是，我还不过是一个孩子，我恐怕我哥哥如果知道了是我的作品，会反对在他的报纸上印我的任何文字。于是我设法伪装笔迹，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在夜里把它从印刷所的门口塞进去。这篇文章在第二天早上被发现了，并且我哥哥当他的朋友们照常聚会时就传给他们看。他们在我听得见的地方读它、评论它，我发现它得到他们的称赞，并且在他们对作者的不同猜测中，没人能正确说出我的名字来，却举了一些他们中间有学识有才智的人物，这使我非常愉快。现在想来，我是特别幸运遇到他们来鉴赏，只是或者他们并不真正像我那时所敬服的那样高明。

不管怎样，被这种称赞所鼓励，我又写了几篇文章，且用同样的方法传递过去付印，同样获得了好评。我保持着这个秘密，直到为了玩这样的小把戏把我浅薄的知识完全用尽之后才停止，于是我的秘密就泄露了。当我开始为我哥哥的朋友们稍加重视时，我哥哥却多少有些不喜欢，因为他相信（或许有充分的理由），这会使我太自负。也

许这多半是我们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不和的一个原因吧。虽说是弟兄，他总以为自己是我的主人，而把我当做他的学徒，希望我像别的学徒一样干活，有时我觉得他在使派我时过分地鄙视我，而我从弟兄之情没想能得到较多的宽待。我们为此而争辩，常常闹到父亲的面前去，我想大概是我言之有理，或是我会讲话，因为父亲的评判总是对我有利。但我哥哥急躁易怒，常常打我，这使我很生气。只要想到我的学徒年限就觉得长得让人厌烦，我一直希望能找一些机会来缩短它，终于那机会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地到来了。

我们在报上刊登了一篇触犯了州议会在政治上的某些要点而抨击议会的文章（是些什么要点，我现已忘记了），我哥哥被议长拘捕了去受责罚，并被判了一个月的徒刑，他之所以遭此不幸，我猜想，是因为他不肯泄露作者姓名。我也被拘到议会去审讯，我没给他们任何满意的回答，他们只是训诫了我一顿，就释放了事，也许是认为我作为一个学徒是应该为他的主人保守秘密的。

在我哥哥被拘留期间，我非常愤慨，抛开我们私人的不和，我管理了报纸，并且大胆地在报纸上给我们的统治者几次挖苦，这事我哥哥很引以为高兴，却使别人开始对我有不好的看法，认为一个少年就有了兴谤和讥讽的脾气。我哥哥被释放了，但附有一个议会的命令（一个很古怪的命令），上边说：

詹姆斯·富兰克林不得继续刊行叫做《新英格兰报》的报纸。

他的朋友们在印刷所开了一次会，商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办。有些人提议用改换报纸的名称来应付这个命令，但是我哥哥认为那方法也不大妥当，最后才决定了一个似乎略好一点的方案，把今后的报纸放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下刊行。并且为了避免议会的责罚（因为如果仍由他的学徒刊行，那责罚还会落到他身上），所以定下这样的计策：把我的旧合同退还给我，在合同背后注明完全解

雇，一旦有事就可拿出来呈验，但是为了保障他要我为他继续服务的利益，对其余的期限，又签订了一个新合同，这个是要私下保存的。这是一个浅薄的计策，不过还是立刻执行了，而报纸在我的名义下又照常刊行了几个月。

终于在我哥哥与我之间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我推测他不敢把新合同拿出来，就毅然保障我的自由。我这乘机利用的办法是不正当的，并且我把它当做我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之一。不过把这事与他脾气暴躁、常常打我所起的影响相衡量，还是我轻些，虽说在别的方面他不是个坏脾气的人，也许我那时是太没规矩、太叫人生气了。

独闯费城

我哥哥发觉我要离开他时，就设法阻止我被这城里别的印刷所雇用，他遍告每一个主人，于是他们就一概拒绝给我工作。我那时便打算到纽约去，那里离波士顿近，也有一家印刷所。我是极倾向于离开波士顿的，当时我考虑到我已经引起统治者的憎恨了，并且，从议会在我哥哥一案中的专横处置来看，也说不定我若仍留在那里就会立时陷于困境；而且我的有关宗教的轻率论辩，开始使善良的人们怀着憎恶的心情把我指为异教徒或无神论者，所以我决定离开波士顿。但是那时我父亲袒护我的哥哥，如果我试图公开出走，他会设法来阻止我。最后我的朋友科林斯答应为我略施小计。他为自己的旅行与一个纽约的帆船船长商量，异想天开地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朋友，曾和一个恶劣的少女私通，她的家族定要强制我和这个少女结婚，所以我不能露面 and 公开离开。这样我就卖了一些书，筹措了一点钱，偷偷地上了船。由于我们遇到顺风，第三天，我已到了纽约，离开老家也差不多300英里了，一个年仅17岁的孩子（1723年10月），对那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了解，也没人介绍，而且只有很少的一点钱在我的口袋里。

我想学航海的壮志这时已经消磨掉了，不然的话，我现在倒可如愿以偿了。但是，因为此时已有了手艺，且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熟练的印刷工人，我便到纽约的老威廉·布雷福德的印刷所去找工作。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家，因为和乔治·基思吵架才搬过来的。他不能雇用我，因为要做的事很少，而人手已经够了，但是他说：“我儿子在费城最近失去了他的一把好手——那个名叫阿基拉·罗斯的工人去世了，如果你到他那里去，我相信他可以雇用你。”费城离这儿有100英里远，我坐上了一只船动身前往安博依，留下我的行李经由海道运去。

在穿过海峡时，我们遇到一阵狂风。那风把船帆撕裂成好几片，使我们无法进入基尔，而把我们推送到长岛去。在途中，有一个喝醉了的荷兰人，他也是一个乘客，跌到了水中。当他就要沉没时，我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起来，弄到船上来。他掉进水里，倒使他稍微清醒了一点，睡觉前，他从衣袋中拿出一本书希望我给他弄干。原来这本书就是我素来喜欢的作者班扬的《天路历程》的荷兰文译本，铜版印刷，纸质优良，装帧得比我所看到的原文本还好。后来我发现它曾被译成欧洲好多国的文字，并猜想，或许除了《圣经》以外，阅读这书的人比任何书都更多。令人钦佩的约翰·班扬是我所知道的把叙述与对话混合起来写作的第一人，这种写作方法很能吸引读者，使读者在最有兴趣的地方停留下来，好像被拉入伙并出席辩论会一样身临其境。笛福在他写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宗教的献媚》、《家庭教师》和其他作品里都是模仿这本书而得到成功的，还有理查逊也在他的《帕梅拉》中这样做过，等等。

当我们驶近长岛，才发觉那是一个大浪汹涌、不能登陆的石滩，于是我们就抛了锚，使船向着岸边旋转摇摆。有些人来到水边，我们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向我们呼叫，但是因为风是那么大，浪是那么响，我们彼此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在岸边有几只小船，我们打手势，招呼他们用船来接应我们，但是他们或许不认识我们，或是认为那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就走开了。天色已晚，我们除了等待风停没有别的办法了。在那个时候，水手和我都尽可能地睡下了，而且还是和那个浑身还湿着的荷兰人挤在小船舱里，浪花打过我们的船头，水溅落到我们身上，所以不一会儿我们就和那个荷兰人一样差不多成了落汤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躺了一夜，只得到一点休息。第二天风停了些，我们要尽量在天黑以前到达安博依。在水上我们已待了30小时了，没有食物，没有饮料，只有一瓶污浊的甜酒，而行船的那水也是咸的。

晚上我觉得自己浑身发热，就躺在床铺上。不过，我曾在什么书上读过，说饮冷水对于寒热病很有益处，我就照此方法来办，出了大半夜的汗，病就好了。在早上，摆渡上岸，我就登陆步行，向着50英里外的柏灵顿前进了，别人告诉我，在那里可以找到载我到费城去的船。

一整天都下着大雨，我全身都淋湿了，到午间很是疲乏，就停留在一个小旅店里，在那里住了一夜，这时才想，要是永远不离开家多好。我又显得很可怜，有人来盘问我，我发现自己被人怀疑成是一个私逃的童仆，并且这种嫌疑将置我于被扣押的危险之中。不管怎样，第二天我动身走了，到了晚上又住到离柏灵顿剩下不到8英里或10英里的约翰·布朗医生开的旅店里。当我吃点心时，他跟我攀谈起来，知道我曾读过一点书，也就待我很和气、很亲密了。我们的交好在他生前一直未断过。我猜想他从前是一个走江湖的医生，因为没有一个是英国的或欧洲各国的城市他不能加以详细说明的。他有些学问，也很聪敏，确是一个了不起的非教徒。数年以后，他滑稽地把《圣经》改为拙劣的韵文，就像科顿改译维吉尔的诗那样。用这种方法，他使许多事实变得很荒谬可笑，如果他的作品加以印行，定会对那些头脑迟钝的人有害处，只不过那书永未付印罢了。

在他的旅馆里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柏灵顿。但是我很伤脑筋，因为发现那趟班船已在我来以前刚开走了，并且在下星期二以前再没有别的船走，而这一天才是星期六。因此我又回到镇上的一位老妇人处，我曾向她购买过预备在船上吃的姜饼，请她帮我拿个主意。她邀我留住在她家里等候下一班船去费城，我因步行已觉疲劳，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她知道我是一个印刷工人，叫我留在那个镇上从事我的职业，她原不懂开业是要有机器和铅字的。她殷勤招待我，伴以极大的好意给我牛肉吃，仅仅接受我一瓶麦酒的回报。我想我自己必须得等到星期二了。黄昏时我到河边去散步，有一只船路过那里，

我发现它是开向费城的，船中载着几个人。他们带我上了船，由于没有风，我们全程都是划船而行的。大约到半夜了，还看不见费城。有些同伴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就不要再向前划了。别的人也不知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就回船向岸驶入一条小湾，在一个旧栅栏附近登岸。10月的夜里很冷，我们用木条生了火，在那里围着火一直待到天明。一个同伴认识这地方是库柏湾，距离费城不远了。果然我们一驶出小湾就望见费城了，约在星期日早上八九点钟到了那里，在市场街码头登岸。

我对这次旅行作了很详细的叙述，并且还要同样详细地写我初次进入那个城市的情景，这样你可在心中比较一下，我最初的情况和我后来在那里显露头角时是多么不同。我穿的是工作服，因为我的衣服从海道还未运过来。衣服由于旅行弄得很脏，我的衣袋里被衬衫和袜子塞得满当当的，不知道向谁也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去寻找住宿之处。连日的赶路划船弄得我很疲乏，又饥饿，并且我的全部现钱只合一元荷兰币，还有约合一先令的铜元。那些铜元，我作为票费给了船上的人，他们起初不收，因我曾帮着摇过船，但是我坚持叫他们收了。一个人当他只有一点钱的时候，比他钱多的时候还更慷慨一些，也许是怕别人认为他只有一点点钱。

于是我就在街上散步，四下里乱看，直到在市场附近碰见一个拿面包的孩子。我多次都是以面包当一顿饭的，我就问他从哪里买到的，并立刻按他所指示的走到面包店里，向店中人买面包，想来也会像我们在波士顿一个样子的东西，哪知在费城他们好像并不做那个。于是我说买三个便士的面包，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那样的面包。既然这样，我就不管价钱多少，是不是极便宜，也不问他的面包叫什么，我要他给我价值三便士的任何一种能吃的东西。他按照我的话给了我鼓鼓的三个大面包卷，我被那么多的量吓了一跳，不过我还是拿了它就走开了。此时口袋里已没有空地方，我就在两臂下各夹了一个，吃

起另外一个面包卷来，我就这样子沿着市场街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的门前，他是我未来妻子的父亲。当时我未来的贤妻正站在门口，瞧见了，认为我做出了一个极为愚蠢可笑的样子，说实话，我那时的样子肯定就是那样。后来我转身走下栗子街和胡桃街的一段，吃着面包卷走了一路，又绕回来，发现我又在市场街码头，距我坐船进来的地方不远，我走到那里喝了一些河水。因为一个面包卷我已吃饱，就把另外两个送给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她们是跟我们一路坐船来的，正在等着向更远的地方去。

这样吃过饭后，有了精神，我又到街上散步，这时候在街上有许多穿着整洁衣服的人，他们都向同一方向走去。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结果被引入市场附近一个教会的大会堂去了。我在他们中间坐下来，四下里看了一会儿之后，听不到有人讲话，因为过度的劳累和夜间缺少休息，我觉得非常困倦，就沉沉地睡熟了，一直睡到散了会有一个人好心地叫醒了我为止。这就是我在费城第一次走进和睡在里面的房子。

我又朝着河边走去，注视着过往的行人，碰到一个年轻的教友会教徒，我觉得他相貌和善，就向他打招呼，请他告诉我什么地方旅客能够住宿。我们那时正站在一个写有“三水手”的招牌附近，他说：“这里就是一个能留容旅客的地方，但此店名誉不佳，假如您能与我同行，我将带您到一处较好的旅馆去。”于是他领我到水街上的“克鲁克”旅馆。在那里我吃了一顿饭，并且，正在吃时，店主问了我一些试探性的问题，因为从我的年龄和外貌看来有些可疑，好像我会是一个私自逃出来的人。

吃完饭以后，我的睡意又来了，店主把我领到一个床铺跟前，我连衣服都没脱，躺下去就睡，一直睡到晚上6点钟，被叫起来吃晚饭，饭后又早早上床睡下，很酣沉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

装扮得整洁一点，就往安德鲁·布雷福德印刷所去。在店中我看到了老板的父亲，这个老人我在纽约见过，他是骑马而来，在我来之前就到了费城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客气地接待我，请我吃早饭。不过他告诉我他现在并不缺人手，因为新近已补上一个了，但是在这城里另外还有一家印刷所，是一个叫凯默的人新开设的，这个人也许会雇用我。如果不用，我也会受到欢迎住在他店里，他会先给我一点工作做着，一直等到我找到较好的工作为止。

老先生说他可以陪我一块到新印刷所去。当我们找到凯默，布雷福德说：“我的邻居，我领来一位和你同行的青年来看你，也许你正缺少这样一个人吧。”凯默问了我一些问题，放了一个排字盘在我手里，看我怎样工作，随后就说他不久即可用我，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事情要我来做。他把他以前没见过面的老布雷福德认为是全城人中一个对他怀有善意的人，就谈论起他现在的事业和计划来。当时老布雷福德不说出自己原是另一个印刷所老板的父亲，提出巧妙的问题和小小的疑问来引出凯默的话。凯默说他希望不久就把这一行业的大部分生意抓到他自己的手里，并把他的意图他仗恃着什么势力和他打算用什么方法进行，都全盘托出。我站在旁边，都听到了，立刻看出他们之中的一个是精明奸猾的老手而另一个却不过是个不谙世故的新手。布雷福德离开之后，我告诉了凯默这个老年人是谁，他不禁大吃一惊。

我见凯默的印刷所中只有一架陈旧破损的印刷机，一副已磨损的英文铅字，他自己正用它们排一篇阿基拉·罗斯的追悼诗。这个人前面曾提到，是一个有天才的青年，有善良的性格，在这城市里受到敬仰，是议会的秘书，并且还是一个好的诗人。凯默也写诗，但写得很拙劣。他那不能说是写诗，他作诗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思想直接用铅字排出来。这样就没有原稿，而排字盘又只有一套，追悼诗就几乎需要占用全部铅字，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他的忙。我极力想把他的印刷机（他从来没用过它，他也不懂得怎样用它）修理好以使用来工

作，答应在他把追悼诗编排就绪以后，我就立刻到印刷所印完它。之后我又回到布雷福德的印刷所，他暂时也给我一点小活做。几天之后，凯默派人叫我去印完追悼诗。那时他又弄到另一副排字盘，且有一本小册子要重印，因此他安排了我的工作。

我看这两位老板都对他们的行业很不够格。布雷福德本来不是学这个的，又很缺乏学识；而凯默虽然有点像个有学问的人，却又仅仅是一个排字工人，一点也不懂得印刷工作。凯默曾经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还能仿效他们的热烈讲演。在这时，他不表白他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必要时却有点各派都信。他对人情世故全然无知，并且在他的天性里，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的无赖成分。他不喜欢我在他这儿工作却寄住在布雷福德那里。不错，他确是有一个空房，但没有家具，所以他不能留我住宿，不过他在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位里德先生家里给我找到了寄宿的地方，他也是凯默的房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行李和衣服运来了，我的打扮在里德小姐眼里比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的样子可文雅体面多了。

总督的“赏识”

我现在开始在那城市的青年中有些熟人了，他们都是好读书的，我和他们在一块，愉快地度过我的晚上。我靠勤劳节俭赚着钱，生活过得很适意，极力想忘掉波士顿，不希望那里的任何人知道现在我住在什么地方。当然除了我的朋友科林斯，他知道我的秘密，我写信给他，要他保守这个秘密。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出乎我意料地一下子就使我又回到波士顿了。我有一个姐夫，罗伯茨·霍姆斯，是一个航行于波士顿与特拉华之间做生意的帆船船长。他住在纽卡斯尔，距费城40英里，听说我在费城，就写信给我，告诉我自我突然出走，波士顿的亲友们都很挂念，向我保证他们对我的好意，并且说如果我肯回去，每件事情都会称我的心意，很恳切地劝我回去。我写给他一封回信，感谢他的劝告，并详细地说明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作这样的说明是为了使他确信我并不像他所意料的那样是荒唐地出走的。

威廉·基思爵士是费城的总督，那时正在纽卡斯尔，而霍姆斯船长接到我的回信时恰巧和他在一块，便向他说起我，还把信给他看。总督读过信，听说我的年纪还很小，好像大为惊奇。他说我显然是一个有能力的青年，所以应该加以鼓励。又说费城的印刷所都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愿意在那里创业，他认为我必定成功。至于他，他愿为我招揽公家的生意，并在他的权力之内为我做一切别的事。这些话是后来我姐夫在波士顿告诉我的，而当时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有一天，凯默和我正在窗前一块工作，我们看到总督和另一位绅士（后来知道他是纽卡斯尔的弗伦奇上校），穿得很齐整，直穿过街道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并听到他们停在门口了。

凯默马上跑下去，以为是来拜访他的，没想到这位总督却访问了我。他走上来，用一种我十分不习惯的谦虚和礼貌，向我说了许多恭

维的话，表示愿意跟我结交，和悦地责怪我当初到这里时不曾让他知道，还邀我同他到酒馆去，他要和弗伦奇上校去尝一尝他所说的马德拉酒。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而凯默却呆若木鸡。我最终还是跟总督和弗伦奇上校到三道街拐角上的一个酒馆去了。他们一面喝着马德拉酒，一面劝我开业，向我提出成功的可能性，他们两人保证我在承揽军政两界的公家生意中，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援引和影响。我疑心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父亲未必肯帮助我，威廉爵士便说他要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在信里他要说明这件事的可行性，他确信能说服我的父亲。这样子开办印刷所的事情就决定了。我必须搭乘下一班船回波士顿，带上总督向我父亲推荐我的信。在这时候，此事是要保守秘密的，所以我照常和凯默工作下去。总督还时常来信邀我同他一块吃饭，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他还用极和蔼的、亲密的和一切想象得出的友好态度来同我谈话。

大约在1724年4月底，有一只帆船开往波士顿。我向凯默告别，说是要去看朋友。我揣着总督交给我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向我父亲说了些过分称赞我的话，热心地推荐我在费城开办印刷所的计划，说这件事一定会使我发财致富的。我们乘坐的船在驶出港湾时触礁，船裂了一个洞，海水渗了进来。我们在海上遇到大风，不得不几乎连续地排出船中的水，我也轮班参加了排水工作。不管怎样，船航行了14天，我们安全地到了波士顿。我离家已经7个月了，我的亲友们一点没有听到我要回家的消息，因为我姐夫霍姆斯尚未回家，也没写过关于我的消息的信。我的突然出现使家中大为惊讶，不管怎样，大家还是都很高兴看见我，并欢迎我回家，除了哥哥以外。我到他的印刷所里去看他，我穿戴得比以前在他店里时好多了，从头到脚都是整洁的新衣服，有了一只表，口袋里还装了近5英镑的银币。他看见我很不自然，对我上下打量一番，就转身去做他的活了。

工人们则好追根究底地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景况，我为什么喜欢那里。我大大地称赞了费城，我在那里生活得很快乐，还强烈地表示我极愿回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之中有一人问我在那里用什么钱，我就拿出一满把银钱来给他们看，这是他们很少看见过的一种“稀奇物”，因为波士顿用的是纸币。接着我又利用机会让他们看我的表，并且最后（我哥哥仍然生着气和绷着脸）我给了他们一些钱买酒喝，然后就告别了。我这次的拜访大大惹恼了我哥哥，因为，过了些时候，当我母亲向他进行和解的谈话，说她希望我们重归于好，还希望我们将来和睦相处时，他说我在他的工人面前那样侮辱他，那是他永远不能忘记和宽恕的。这一件事，无论如何，他是看错了的。

我父亲接到总督的信显然有些惊讶，但他好几天都不大向我谈起它。当霍姆斯船长回来，父亲把信拿给他看时，才问霍姆斯船长是否认识基思，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又提出，想叫还差3岁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开办实业，那他一定是欠缺周全考虑的。霍姆斯极力说些赞成这个计划的话，但是我父亲对这事的不妥当是看得很清楚的，并在最后加以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写给威廉爵士一封客气的信，感谢他对我这样仁慈的帮助，但是拒绝资助我去开业。在他看来，要是把那么重要的事业经营委托给我，那我是太没有经验了，而且那一笔创办费一定很大。

我的朋友和伙伴科林斯，他是一个邮局的办事员，听了我对我在新大陆的叙述后很愉快，决定也到费城去。那时我在等待我父亲的决定，所以他比我先动身到罗德岛去了。不过他留下他的书，那是一套丰富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藏书，要我同我的书一起带到纽约去。他打算在那里等着我。

虽然我父亲不赞成威廉爵士的建议，但还是很高兴我能在我住过的地方得到那么有名望的人写的称誉有加的推荐书，并且我曾那么勤劳谨慎，在短短的时期内就把自己装扮得这样文雅，所以他在了解了我哥哥和我之间暂无和解的希望后，就允许我再回到费城去。他指教我要谦恭地对待那里的人，争取普遍的尊重，还要戒除讽刺和诽谤，他认为我曾很有这个偏好。他对我说，如果我以始终不变的勤恳和小心谨慎的节俭来工作和生活，到我21岁时一定可以省出足够自己开业的钱来，并且如果我把这事做得差不多，他愿补助我。这就是我所得的一切，除了几样纪念父母慈爱的小礼物以外，就是当我再度搭船前往纽约时，他们的嘉奖和祝福。

帆船驶入罗德岛的新港后，我去看望我哥哥约翰，他已结了婚并定居在那里好几年了。他很亲热地接待我，因为他始终是疼爱我的。哥哥有位朋友佛农，有人欠他一笔账款，约有35英镑，而欠款人就住在宾夕法尼亚，哥哥要我代佛农收款，且保存起来等他吩咐做何用途，于是他给我一张收据。这件事后来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

在新港，我们的船上又上来一批乘客，其中有两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庄重、通情达理的，貌似主妇样子的教友会妇人。这位妇人带着她的仆人。我曾表示要欢欢喜喜地应允她的请求为她做些零碎事情，我猜想她很受感动，对我有相当的好感。当她看到我和那两个年轻女人渐渐熟起来，就把我拉到一边，说：“年轻的人哪，我替您担心着哪，像您这样没有朋友做伴同行，看来对世事或摆在那里陷害青年的圈套又都不大了解，您相信我好啦，这两个女人都是很坏的人，我能从她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来。如果您不加以防备，她们将引诱您到危险的境地，她们是您不认识的人，而我是如朋友般关心着您的平安的，所以奉劝您不要跟她们交往。”我最初还不认为她们像她说的那么不好，她说到一些她所看见、听见而我没注意到的事情，方才使我承认她是对的。我感谢她的忠告，并答应听从她的话。当我们到了纽约，这两

个女人把住址告诉我，还邀我去看她们，但是我没有去，这事我做得好。第二天船长丢失了一把银匙和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船长室里拿出去的，船长知道她们是妓女，他得到一个搜查证，就去搜查了她们的住所，搜出了赃物，并处罚了她们。因此，虽然我们逃脱了触礁沉船的危险（这是我们在旅途中曾经遇到过的事），但我认为能逃脱盗窃的嫌疑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与科林斯的交往

我在纽约找到了我的朋友科林斯，他先到那里已有些时候了。我们从小就很友好，常常共读一书，但是他有着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和学习，并且在数学方面是一个可惊的天才，在这方面远远地胜过我。当我还在波士顿时，我总是和他在一起，花费大部分空闲时间谈天。他不饮酒，是个勤恳的孩子。他的学识为几个教士和别的绅士大加称赞，并推许他将来会有番作为。但是在我离开波士顿的日子里，他沾染了一种好饮白兰地酒的习惯，这是我从他自己的叙述和别人口里才知道的。自从他到纽约以后，曾天天饮酒，行为也很怪僻，又曾赌博，输光了他的钱，所以我必须代他付旅馆的住宿费和给他在费城的开销，这件事使我实在不舒服。

那时的纽约总督伯内特听船长说他的乘客中有一个青年带了许多书，就要船长领我去见他，我就遵命前往拜访。当时如果科林斯没有喝醉，我一定带他同去。这位总督待我很热情，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很大的一个藏书室，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书籍和作者的话。这是第二个注意到我并给我赏识的总督，这对于像我那样的穷孩子来说是很高兴的了。

我们向费城出发。我在途中去收了佛农的那笔债款，如果没有这笔钱我很难完成我的旅行。科林斯希望被雇用于会计处，但是，从他的呼吸或是他的举动里，人家发觉他喜欢饮酒，虽然 he 有过几封介绍信，仍没有得到任何录用。他继续和我在一块食宿，费用由我负担。知道我有佛农的那笔账款，他便不断地向我借钱，还答应如果他有了工作就立即还我。时间长了，他把那笔债款也借去不少，这使我一想到就很苦恼，如果佛农叫我把这笔钱汇去，我该怎么办呢？

他仍是不断地饮酒，关于这事我们有时就争吵起来。因为当他有一点醉意时，脾气很不好。有一次，我们和另外几个青年在特拉华河上的一只船上，轮到他划桨时，他拒绝干。

他说：“我要回家。”

我说：“我们不为你划。”

他说：“你必须划，要不就在水上待一夜，随你的便。”

别人都说：“我们来划好了，那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的心里已为他的别的行为所惹恼，所以仍旧拒绝为他划。这样，他执意叫我划，否则就要把我丢下水去。说着他沿着船舷一步步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来打我时，我急忙用手托住他，举起来，把他头冲下扔进河里去。我知道他善于游泳，所以并不为他担忧。但是在他游到船旁要攀住船时，我们就打了几桨把船划开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去，并且每当他游近船旁，我们就问他愿不愿划船，就再打几下桨又划开去。他气得要死，还是固执地不答应划。最后看他实在精疲力竭了，我们才提他上来，并在黄昏时把湿淋淋的他带回家。从此以后我们难得讲一句好话。后来一个航行西印度的船长要请一位教师去教巴巴多斯岛一个绅士的儿子，恰巧碰见他，愿意带他到那边去。于是科林斯离开了我，答应用他第一次的薪金还我的债，但是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丧失佛农的这笔账款是我一生中犯的又一个错误。这件事显示我父亲的审断不为过分，他料定我的经验不足，不能经营重要事业。但是威廉爵士读了他的信，说他过虑了。人各有不同，而谨慎不是年长的人才一定有，也不是年轻的人就一定没有。

他说：“既然你父亲不叫你开业，我自己愿意帮你做这件事。给我一张需要在英国购买的货单，我买来给你，等你有能力时再还我好了。我是坚决地要在这里开一个好印刷所，并且确信你必定成功。”

他这话说得这样诚恳，我对他话中的意思不曾有半点怀疑。我的开业计划在费城是秘密的，我一直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不然的话，如果让人知道我是依靠着总督的，也许会有几位比较了解总督的朋友劝告我不要依赖他，像我后来听到的，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答应了人家而从来不履行。可是，既然不是我去求他，我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慷慨的人会待我毫无诚意呢？我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给了他一份置办小印刷所需要的各种物品的清单，据我算来大约需100英镑。他很满意，但他说如果我自己到英国去选购，每件东西都仔细查看，拣好的买，那也许更为有利。

接着他说：“那样你在那里时可以结识一些书商，建立书籍文具生意的交易往来。”我承认这么做是有利的。

他又说：“那么，你自己准备一下，就搭安尼斯船去。”这是每年一次航行于伦敦和费城之间的船。这时离开船日期还有几个月，所以我继续在凯默处做工，心里老是担心着科林斯借去的这一笔钱，哥哥会叫我汇出去，幸好几年之内，他没有这样做。

费城生活

我相信我的叙述漏掉了我初次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情形。

船离开布劳克岛时没有风浪，我们船上的人经常钓鱼，而且钓到的不少。在此之前我还是固执地绝不吃荤腥，有时我想起特赖昂说的话：“吃一尾鱼跟无故杀人一样，因为没有一尾鱼曾经或能够伤害我们，所以它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些话似乎很有道理。但由于我从前是喜欢吃鱼的，当鱼沸热地出锅时，真是香气扑鼻，我几次都在原则与嗜好之间徘徊选择。直到有一次，有人把一条大鱼剖开时我看到有许多小鱼从它的腹中取出来，于是我想道：“如果你们自相残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吃你们。”从此，我就大吃鳕鱼，并且和别人一样吃荤，不过有时偶然吃素。做一个理性的动物是这样方便，他想做什么事就可以找出或造出一个理由来。

凯默和我在熟识的基础上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我要自己开业了。他还保留着很多他从前的宗教热诚，很喜欢辩论，我们曾争辩过多次。我常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和他辩论，使他陷入圈套，起先用离题甚远的问题问他，一步步地引他到这一点，遂使他陷于窘迫或矛盾的圈套中。到后来他小心谨慎到一种可笑的地步，对最平常的问题都几乎不回答，先要问我：“这句话你要引我到什么地方来为难我呢？”不管怎样，这使他对我的辩驳能力极为赞誉。当时他正打算建立一个宗教派别，极力拉我做他的同盟。他宣传教义，而我就去驳斥一切反对者。当他把教义解释给我时，我觉得其中有些我不能同意的疑点，除非我有自己的解释或在其中加进我的一些观点。

凯默满脸留着长胡子，因为在摩西教律中有一处说“胡须的一角也不可损坏”，他还谨守礼拜六为安息日，这两点对他都是最重要的事。

我两样都不喜欢，但在有条件时可以同意奉行，那就是叫他承认我的不吃荤腥的教义。他说：“我恐怕我的身体撑不了。”我保证他不吃荤会更好一点。他经常吃得很多，因此我想让他半饥半饱，那一定很有趣。他答应如果我能为他搭伙，他就试试。我照办了，我们吃素吃了3个月，规定由邻居的一个妇人烧好了菜拿来，我给她一张单子，上列40种菜，预备轮流调换，40种菜中既无鱼肉又无鸡鸭。在那时，素食很省钱，使我更觉合适，每星期的花费不过18便士多些。我以前已很严格地奉行四旬斋，拿开普通食品就来吃素食，拿开素食就再吃普通食品，一点也不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想那种戒荤吃素必须渐渐进行改换的说法是没有多大道理的。我进行得很快活，但是可怜的凯默却受苦不堪，对这计划渐生厌倦，急于要吃埃及烧法的肉，就买了一只烤乳猪。他请我和两个女朋友与他一起吃，但是这烤猪上桌太早了，他不能忍住诱惑，就在我们来之前把它吃完了。

在这时期我向里德小姐求爱，我极尊敬她、爱她，而且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也一样爱我。但是她母亲认为我即将远行，加上我们两个又太年轻，才刚过18岁，所以她就深思熟虑防止我们太快地进行到我所希望的谈婚论嫁的地步，建议我们把婚事放在我回来之后再考虑，那时我自己开了店再结婚当更为方便了。也许她想到我的希望不易达到，而我还幻想能够达到。

在那时我所交往的人有查理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詹姆斯·劳尔夫，都是爱读书的。前面两个是城中有名的公证人或转让证书代理人查尔斯·布罗格顿的秘书；另外一个商人的秘书。沃森是一位虔诚而聪慧的诚实青年，另外两人对宗教信仰却较为随便，尤其是劳尔夫，他和科林斯同住在我处，都不能使我安宁，给我添了种种麻烦。奥斯本聪明、正直、坦白，对于朋友诚恳而友爱，但是对于文学作品太喜评头论足。劳尔夫聪明、文雅，极会讲话，我想我从来不曾认识过这样善于说辞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喜欢作诗，且尝试自己作些小

诗。我们四个人在星期日很快乐地到斯库基尔河边的树林中去散步，在那里我们轮流诵读，并对所读的书加以评论。

劳尔夫喜欢写诗，他自信必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可以靠诗致富。他断定最伟大的诗人在开始作诗时，必定是和他一样有许多错误的。奥斯本劝他不要妄想，说他并无诗人的天赋，且劝告他不要在他本行以外乱想。在商界中，虽然他没有资本，但以他的勤劳和信用必能置身于工厂中服务，到了相当的时期，就能独立营商了。我承认我也常常为了自娱而学写诗，不过是求文字上的进步，并无远大志向。

在学诗这件事上，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建议：我们每人在下次集会时都要带一篇自己作的诗来，以求促进我们的鉴赏、批评和修改能力。文辞与表现力是我们所注重的，暂不注重创作，因此我们就议定将《赞美诗》第十八章重写。会期将近时，劳尔夫先来看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写好，我告诉他我很忙，又无诗兴，一点也没有写。于是他把他的作品给我看，叫我评论，我大加赞赏，说据我看来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但是，奥斯本从来对我的任何作品都不承认有一星半点的价值，吹毛求疵，千般指责，那不过是出于嫉妒罢了。他不大嫉妒你，我想请你拿这篇诗作为你自己写的。我假装没有空闲，所以不曾写。那时我们就可以听听他对这诗说些什么。”这件事商定以后，我就立刻抄了一遍，看起来就像是我自己的诗作。

轮到我们聚会了。先读沃森的作品，诗中颇有美点，但更有许多缺点。读奥斯本的作品，更较优胜，劳尔夫一秉至公，指出几点错误之处，但也称赞了它的优美处。他自己说没有作品。我向后退缩，好像请他们原谅，说没有充足的时间修改等等的话，但是他们不肯放过，必定要我拿出来。于是我把抄好的劳尔夫的这篇诗读了又读。沃森和奥斯本甘拜下风，共同赞赏。劳尔夫稍加批评，还给改正了几处，但我为我的“原文”辩护。奥斯本反对劳尔夫，告诉他说他的批评

并不比他作的诗好，于是我们的辩论终止。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家时，奥斯本仍旧表示赞赏我的作品。他说，幸亏他先抑止自己过分夸奖，否则我还会以为他是在阿谀奉承呢。他说：“谁想得到富兰克林居然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绘声绘色，这样有力，这样炽热！他写得比原文还好哇。虽然在他平常的谈话中，似乎他用字不选择，措词含混和错乱，但是，天哪，他的诗写得好多哇！”当我们下一次聚会时，劳尔夫把这个圈套拆穿，大家都嘲笑奥斯本。

这件事更让劳尔夫决定要做一个诗人。我尽力劝阻他，但是他仍继续作诗，直到蒲柏为他医治了，他才成为一个很好的散文作家。以后我还会提到他。其余两位恐怕没机会再提到，所以要在这里说一下。沃森在几年之后死在我的怀中，我颇为悲痛，他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奥斯本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成为著名的律师，赚了很多钱，不过在年轻时就死了。他和我曾经郑重约定，谁先去世，得在死前向另外一个作友谊的拜访，并评述所在地方的风土人情。遗憾的是他没有履行这个诺言。

总督似乎很喜欢和我为伴，因此我常到他家中去，他常常提起助我开业的那件事，好像已成定局一般。他答应在我动身时除了开给我一封专供为购买机器、铅字、纸张等必需费用的信用保证信以外，还有几封给他朋友的介绍信。我为这几封信拜访了他好几次，但他老是指定一个未来的时间，就这样推托延宕，船期也曾数次推迟，直到开船之期已到，我去他那儿告别和拿信时，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接见，说这位总督正忙于写信，但是在船到之前他要先到纽卡斯尔去，在那里他必定会把信交给我。

劳尔夫虽然已经结婚，并且有一个孩子，仍决定与我同行。想来他是要设一个分销处贩卖货物，以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家族不和，他打算把她丢给他们，从此不再回来了。我和我的朋

友们告别，并对里德小姐作了一番承诺，就上船离开费城了。船停在纽卡斯尔，总督果然在那里。但是我到他的寓所去时，他的秘书代他出来见我，极度谦恭地传达口信说总督为重要的公事忙着，不能见我，但是一定会信送到船上，他诚心地祝我航行顺利，速去速回。我只得懊恼地回到船上，但仍不曾有所怀疑。

安德鲁·哈密尔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和我同船而行。他是费城著名的律师，还有教友会的商人德纳姆先生，马里兰州的铁厂老板奥奈思和罗赛尔先生，头二等客舱都被他们占去了，因此劳尔夫和我只得在三等舱找到一个铺位。船上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以为我们不过是平常人罢了。哈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叫詹姆斯，后来做了总督）从纽卡斯尔又回费城去了，因为他被人用巨款请回去为一只被扣留的船辩护。正在我们开船之时，弗伦奇上校上船来了，待我很有礼貌，我和我的朋友这才引人注目，别的绅士们请我到头等舱去住，那里正好空出了两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搬到那里去了。

知道弗伦奇上校已把总督的信带到船上，我就向船长要那些要由我面交的信，他说信都已一起放在袋中了，现在不能拣出来，但在我们到伦敦上岸之前，可以有一个机会拣出这些信来。我也就安下心来，于是船就继续航行前进。我们在舱中有很多可交往的旅伴，大家相处得很好，还有哈密尔顿留在那里的许多旅行中需要的东西，所以旅行很愉快。在途中，德纳姆先生和我结为至交，在他生前我们的友谊是一直持续着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次航行却不大愉快，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都很坏。

与劳尔夫的交往

当我们开进运河时，船长信守他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检查信袋，找出总督的信。我一封也找不到上面写有我的名字而由我转交的信，倒是拣出他亲笔写的六七封信，我想这一定是他答应为我写的信，尤其是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和另外几封给文具商人的。我们在1724年12月24日到达伦敦。我先去拜访文具商人（因为首先由那里路过），把基思总督的信给他。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当他拆开信一看，又说：“哼！这是里德尔斯登写来的。我最近才知道他是个大骗子，我和他已毫无来往了，也不愿收他的信。”这样他就把信还到我手中，转身离开我，去应酬别的雇主去了。我也知道了这不是总督的信，大为惊惶，后来思前想后，把有关情况作了比较，才开始怀疑他的热忱。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把全部事实告诉了他。他告诉我基思的品格，并说基思绝不可能为我写信，知道他的人没有一个会信赖他。他于是嘲笑总督的异想天开，给我信用保证书，自己却连信用也不能保证。当时我颇有焦虑之色，他劝我“在这里的印刷所中找一个本行职位，提高自己，等将来回美洲时对你的事业也会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两人都和那文具商人一样，知道律师里德尔斯登是一个流氓。他曾骗里德小姐的父亲立约，毁了他的一半家产。在这信中还有秘密陷害哈密尔顿的计划（他以为哈密尔顿是和我们同行的），基思也是参与其谋的。德纳姆，他是哈密尔顿的好友，认为我就应该让哈密尔顿知晓这件事。所以过了不多的日子，哈密尔顿到英国来时，我一半为了对基思和里德尔斯登的憎恶，一半为了对他的好意，就去拜访他，还把信给了他。哈密尔顿很感激地向我道谢，这封信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从这时起，他就成为我的朋友，后来我得到他很多的帮助。

但是一个总督玩这样的把戏，对一个穷苦无知的孩子进行阴谋的捉弄，我们怎么能想得到呢？原来这是他养成的习惯，他希望讨人喜欢，但又一毛不拔，空口白话，只给人以希望。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倒是一个才智聪敏的人，擅长言辞，尽管他有时不注意不属他管辖区域的选民的意见。但是我们的几项最好的法律就是他规划的，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施行的，所以他对民众来说也是位不错的总督。

劳尔夫和我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们一起寄住在小不列颠街，租费每星期3先令6便士，在那时这是我们能够支付的最大数目了。他找到几个亲戚，但是他们都很穷，没有能力帮助他。他现在才告诉我，他的志向是留在伦敦，绝不再回费城了。他没有带钱来，所筹之款都已作旅费用了。我有15个匹斯脱尔，所以他在寻找工作时，常常向我借钱暂且维持生活。他最初希望在戏院里谋一职位，自信有资格做一个演员，但是当他去向威尔科克斯（一个喜剧家、书商）接洽时，却被直率地劝告不要再想那个行业，因为在那个行业中他毫无成功的可能。后来他到佩特诺斯特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处去接洽，要在某种条件下为他编写像《旁观者》报那样的周刊，罗伯茨没有赞同。而后他又企图得到一个文书的职位，在伦敦法律协会旁为文具商和律师们抄写，但也找不到。

我很快地在帕尔默印刷所得到工作，那是当时巴特森内一家著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我很勤苦，但是我和劳尔夫一起到剧场或别的娱乐场，把薪金花去不少。我们还一起花光了我原来带的15个匹斯脱尔，以后就勉强糊口够用而已。劳尔夫像是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渐渐地忘了里德小姐的约言，我只写过一封信给她，让她知道我不能立马回去就是了。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个大错误，如果我能重度旧日生活，我一定愿意改正这件事。事实上，以我们的浪费，我已没有能力支付回去的旅费了。

在帕尔默印刷所我被安排去排沃拉斯顿《自然宗教》的再版。他的论点，在我看来，有些不是十分有根据，于是我写了一篇简短的哲学论文，在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论点，题目叫做“论自由与穷困，快乐与痛苦”，我把它题赠我的朋友劳尔夫，印了若干份。我的文章偶然为帕尔默所见，虽然他严正抗议我这本小册子的主张，据他看来是很可厌的，但是他又认为一个青年有这些才智却不为注意很可惜，所以对我很看重。我印行这本小册子又是一个错误。当时我住在小不列颠街，和一位书商威尔科克斯认识了，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大量收集了一些旧书。那时尚无流通图书馆，但是我们彼此同意定一些合理条件，内容怎么样我已忘了，大概是允许我任意取走他的书去阅读，读完交还。我感到这事对我有很大益处，就尽我的能力多多阅读。

过了些时候，我的小册子落在一个外科医生莱昂斯的手中，他著过一本《人类判断的正确性》，因之我们相识了。他很赏识我，常常叫我去谈论一些话题，还带我到位于齐普赛街的一条胡同里霍恩斯开的酒店去，把曼德维尔博士介绍给我。他是《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是一个幽默的朋友，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他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里面的会友大都是最有名的人。莱昂斯又在巴特森咖啡店中把我介绍给佩姆顿博士。佩姆顿答应方便时给我找一个机会去见艾萨克·牛顿爵士，我渴望一见牛顿爵士，但始终没有碰到机会。

我曾得到一些古董，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件耐火的石棉钱包。汉斯·斯隆爵士听说了，跑来看我，请我到他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的家中去，他把他全部的古董给我鉴赏，并劝说我把这个钱包出让给他，因他要买，所以给了我一大笔钱。

在小不列颠街，我们住的屋子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妇人，是一个制帽子的，我想她在修道院区附近是有一个店铺的。她曾受过教育，聪明活泼，谈话风趣。劳尔夫在晚上常读戏剧给她听，他们渐渐熟识

了，她搬到别处去住，劳尔夫也跟了过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日，但是因为劳尔夫还没有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够维持他俩和她的一个孩子的生活，于是劳尔夫决定离开伦敦到村小学去教书，以他的一手好字，担任教职是很合格的，尤其是做算学和会计的教师。这件事不管怎样他认为是屈就，自信还有未来的好运气，所以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曾经担任过这样卑微的职务，就把名字改换一下，他借用了我的名字，使我很光荣。因为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居住在一个小村落中（我想大约是伯克郡，在那里他教着12个孩子的读本、书法，每礼拜薪金6个便士），他把某夫人托我照管，并希望我给他写信，按照他给的地址寄给学校教师富兰克林先生。

他继续不断地写作，曾寄来一首长篇叙事诗，是他新作的，要我加以批评和改正。我也屡次为他批改，但还是打算劝他不要再写了，有一本新出版的杨氏所著的讽刺诗，我抄了一份寄给他，希望他为此书所动，不要再愚蠢地从事诗歌写作了。这些全都没用，一张张的诗稿继续在他每次的信里寄来。正在这时，某夫人因为他的缘故失掉了她的工作，也失去了亲友，常处在困窘之中。她常来向我借钱，我也尽力省下一些钱来帮助她。慢慢地我也喜欢和她做伴了，在这种时候没有了宗教的束缚，我恃着对她来说我所占的重要地位，就图谋亲狎（又是一件过失）。她愤怒地拒绝了我，还把我的行为写信告诉劳尔夫，于是我和劳尔夫之间的友谊就破坏了。当他再回到伦敦时，他宣称我已把他从前受之于我的厚意一笔勾销，那么，我就知道借给他的和替他垫付的钱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了。这倒也无关紧要，因为他已无力偿还，并且失掉他的友谊，我反觉得是从重担中解放出来了。我现在开始想积攒一点钱，并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离开帕尔默处，到林肯旅店广场附近的瓦茨印刷所工作，这是一个较大的印刷所，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离开伦敦的时候。

伦敦的印刷工生涯

我刚来这个印刷所时，在印刷部工作，我觉得缺少身体的运动，我在美洲是常常运动的，那里是印刷部和排字房混合在一块的。我只饮清水，而别的工人，近于50人，都是狂饮着啤酒。有时我上下楼梯两手各拿一块大型铅字，而别的工人却是两手搬一块。从这事和一些别的事情上他们看了很奇怪，说那个“喝水的美洲人”（他们这样称呼我）比他们喝健身的啤酒的人更有力气。在那里有一个酒店里的孩子，他常来这个屋子里，把酒供给工人们。印刷所中我的一个同伴，每天在早饭之前喝一品脱啤酒，早饭吃面包和乳酪时又喝一品脱，在早饭和午饭之间再喝一品脱，午饭一品脱，下午6时一品脱，等到他白天工作完毕时又喝一品脱。我想这是一个极令人讨厌的习惯，但是他却以为这是必需的，喝啤酒工作起来才有力气。我极力向他说明，啤酒供给人的身体的力量不过是大麦的一粒麦或面粉溶解到水中的一小份，啤酒就是这么造成的，在一个价值1便士的面包里的面粉产生的体力比啤酒可多得多呢，所以如果他吃一块面包和喝一品脱水，它能够给他比一品脱的啤酒还要多得力量。但是他还是喝酒，每到星期六晚上他要从他的工资里为那种混浊的液体付出4或5个先令，而这种浪费我避免了。这些贫苦的可怜人老是因喝啤酒使他们自己入不敷出。

过了几个星期，瓦茨叫我进排字房，我就离开了这些印刷工人。排字房的排字工人要我出5先令请他们喝酒，我想这是一种敲竹杠，并且我在印刷部已付过了，老板也这样想，所以不让我付这笔费。我有两三个星期未交，因此，我成了一个像是被教会逐出来的人。他们给我做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我如果出去一会儿，就把我的铅字搅乱，变换我的页码，破坏的事情不一而足。这种种事情，他们却都归于教堂中的魔鬼作祟。他们说这个鬼专给那种没有正式进入教堂的人作

崇。因此尽管有老板保护，我觉得应该允诺付出这笔钱，我确信和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处于一种恶劣的关系是愚笨的。

我现在和他们很友善，没有多时就有着很大的影响。我把他们的印刷工会的规章合理地修改了几处，并驳倒一切反对者而获得通过。因我的以身作则，大部分的工人都放弃了啤酒、面包、乳酪等早餐。他们和我都由隔壁一家代做一大碗的稀饭，撒上胡椒，拌上碎面包，再涂上点牛油，合起来不过一品脱啤酒的价格，就1便士半。而且这样的早餐既吃着舒服，又很便宜，更可使他们头脑清晰。那些仍旧整天滥饮啤酒的，因为不能付款，酒店里赊不到酒了，就常常出利息，向我借款来饮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已“暗淡无光了”（也就是把酒戒掉了）。我在星期六晚上就查看付款表，把他们答应还我的钱合计起来，有时每星期要近于30先令呢。这件事使我在这里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又是个善于辞令的讽刺家，因而他们很尊敬我。我天天上工（我从不过圣礼拜节），老板知道了，又因为我排字敏捷，要紧的工作都叫我做，这些事情一般报酬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日子过得很舒服。

我住在小不列颠街是太远了，就在公爵街另外找一个寄宿处，正对着罗马教堂。那是在一个意大利货栈后面的三层楼上。一个寡妇守着屋子，她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仆，还有一个看守货栈的工人，但住在外边。他差人询问我以前的房主，打听我的人品之后，答应我以同样的租金来住，每星期3先令6便士。她说租金是比较低的，因为她希望有一个男子住在这屋子里保护她。她是个年纪已经很大的妇人，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从小就是新教徒，但是嫁了丈夫，就改信天主教了，她非常敬重丈夫的遗念。她年轻时，时常和著名的人物来往，并且知道许多他们的遗闻逸事，这些事一直可以追溯到查理二世时期。她得了风湿，两足已跛，所以，很少跑出房间，有时需要人陪伴。她们很喜欢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叫我，我一定陪她消磨一个晚上。

我们的晚饭每人只有半条鳕鱼，很小的一片面包和一点牛油，外加半品脱的麦酒，不过席间的娱乐都是在和她谈话。我总是早睡早起，很少搅扰她的家庭，所以她不愿意我离开。因而当我说到我听说有一处离印刷所近的寓所每星期租金只要2先令，这对一心要省钱的我，计算起来大有差异，她就叮嘱我不要想它，因为她以后每星期可以从我的租金里减掉2先令，这样我和她一起住着，直到我离开伦敦，而租金只有1先令6便士。

她屋子的阁楼上住着一位70岁的老处女，过着隐居的日子，关于她，我的房东给我这些叙述，说她是个天主教徒，年轻时曾漂洋过海，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求做一个修女，但是因为她的不服那地方的水土，就又回到英国来。这里是没有修道院的，但她立誓要过着修女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就尽可能地过隐居的生活。因此她把她的家产用于施舍，只保留每年12英镑的生活费，在这个数目之内，她仍旧拿出来许多用于施舍，自己只以稀粥过活，而且除了煮稀粥以外，不举火。她住在那个阁楼上有好多年了，楼下连续而来的天主教寓客允许她住着不出租费，他们认为有她在那里，可以邀福于上帝。每天有一个教士来拜访她，为她忏悔。我的房东说：“我曾问她，像她这样生活，为什么还要天天忏悔呢？”她说：“哎哟，总是不能避免胡思乱想啊！”有一次，我得到允许前去看她，她很愉快且有礼，快乐地同我谈话。她屋子里很清洁，没有别的家具，只有一条地毯，一张放着十字架和书籍的桌子，一张她叫我坐着的凳子和一张挂在壁炉上方的画像，画中女圣徒维隆尼尔在展示她的手绢，手绢上印有耶稣七窍流血的情景，这件事她严肃地讲解给我听。她的脸很苍白，但是从不生病。我即以此例证明：收入不管多微薄，生命和健康也是可以维持的。

在瓦茨的印刷所里我和一个叫威盖特的聪明青年结为朋友，他的亲戚很有钱，所受的教育比大部分的工人来得好。他拉丁文很过得

去，会讲法语，喜欢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個朋友到河里去游泳，只两次，他们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游泳高手了。他们把几位从乡村来的绅士们介绍给我，这几位先生是由水道经过这里到切尔西去专门参观学校和唐·索尔特罗的古董的。我们回来时，应同伴的请求（他们的好奇心让威盖特很激动），我脱掉衣服，跳入水中，自切尔西的近处游到布莱克弗里亚，一路上表演了许多活泼的游泳花样：或在水上，或入水下，他们大为惊异和兴奋，认为这些游泳花样真是新奇。

我自小就喜欢这种运动，曾经学习过色诺芬的动作和姿势，同时又加上我自己的几种方式，目的是求游得既要姿势优美而自如，又要合于实用。趁此时机我把全部的游泳方式表演给他们看，赢得了他们的赞美。威盖特是想成为一个能手的，因我们学习的东西相似，他就慢慢地和我日益亲近了。后来他向我建议一起旅行欧洲，随地做印刷工挣点钱维持生活，我当时很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当我告诉了我的好友德纳姆先生（我一有空就和他在一起消遣的），他阻止我这么办，劝我想着回宾夕法尼亚，他现在正预备回去开业呢。

我必得记录关于德纳姆这位好人的一件逸事。他起先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后来生意失败，欠了不少人的债，和平了结之后，他就到了美洲。在那里，他专心致志地经商，很短的几年中就赚得了许多钱。他和我同船到英国，到了之后就请他以前的债权人来赴宴，在席上致谢他们不苛求债款的好意。当时他们除了受他的款待以外，别无企图，但是在每一个人进第二道菜时，发现在他们的盘子下面有一张银行支票，上边除了以前尚未偿还的债款，还有利息。

德纳姆现在告诉我他预备回到费城去，并且要运许多的货物，预备在那里开店。他建议让我做他的店员，管理他的账簿（记账他可以教我），抄写他的信和照料他的店。他还说，等到我熟悉商业事务之后，就提拔我，派我带着一船面粉和面包到西印度去，并且允许让我

从其他方面得到有利的佣金，并且如果我经营得法，更可给我很大的酬劳。这些话使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已逐渐对伦敦感到厌倦，以喜悦的心情回忆起我在宾夕法尼亚所过的快乐时光，并且愿意再看见那个地方，于是我立即同意每年50镑宾夕法尼亚钱的工资。虽然比我现在做排字工人所得的确实是少了一点，却给了我更好的希望。

我现在离开了印刷所，正如我所想的，这是永久地离开了。我每天从事我的新事务，和德纳姆先生周旋于商人之中，购办各种货物，看他们包装、运输，唤工人速来捆载发送信件等，等到全部上了船，我还有几天空闲。在那空闲的几天中，忽有一日，有一位大人物叫我去，这位大人物我仅知道他的名字叫威廉·温德姆爵士而已，于是我就去见他。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到我从切尔西游到布莱克弗里亚和在几个钟头内教会威盖特和另一个青年游泳的消息，他有两个儿子，预备出外旅行，他希望让他们先学会游泳，如果我肯去教，他可以给我很多的报酬。但他的两个儿子暂且都不在这城中，而我还能留在这里多久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不能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从这件事情，我就想如果我留在伦敦，开一所游泳学校，也许可以赚到许多钱。这个想法很有力地鼓动着，假如这个提议早点告诉我的话，可能我就不会那么早回到美洲去。过了几年之后，我和这位爵士的一个儿子（这时候已经是埃格雷蒙地区的伯爵了），还打过某些更重要的交道，这件事我将到适当的时候再谈。

我就这样在伦敦大约住了18个月。大部分的时间我工作得很辛苦，除了看戏和读书，很少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我的朋友劳尔夫把我弄穷了，他借去我大约27英镑的钱，这笔钱我绝不能收回了，然而在我微薄的收入之中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呀！我爱他，不管怎样，因为他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品质。我虽然没有赚下很多钱，但是认识了几位聪明智慧的朋友，他们的谈话是大大有益于我的，并且还曾读了许多书。

再返费城

我们在1726年7月23日自格雷夫森德起航。这次航行碰到的事情，你可翻阅我的札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些事记载得都很详细。那本札记最重要的一部分可能是写在上面的一个“规划”，这是我在船上制成的，用来规范我将来生活中的行为。更可注意的是，在我这样年轻时就制订出这样的计划，而直到老年时还是很忠实地坚守着。

我们在10月11日登陆费城，在那里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改变。基思已不做总督了，继任的是戈登少校，我看见基思像个普通公民一般在街上走路。他见了我似乎有点难为情，就一句话不说地走过去了。其实我看见里德小姐也该这样难为情呢！她因为收到了我的信，对我回国感到绝望，才听从她亲朋的劝告而和一个陶工罗杰斯结了婚。这件事是我不在时办的。无论如何，她和他结婚后一直过得不快乐，不多久就和他分开了。她拒绝和他生活在一起、姓他的姓氏，现在据人家说，罗杰斯另有一个妻子。他是个毫无可取之处的人，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工人，这就是诱惑她亲友为她操办这门亲事的原因。他后来欠了债，在1727年或1728年时逃走了，跑到西印度去，后来就在那里去世。凯默扩大了印刷店铺，店中附设了文具部，还添了许多新活字版，加雇了工人，虽然并无好手，似乎生意还很发达。

德纳姆先生在水街开了店，我们把货物都陈列在那里。我勤恳地照管店务，学习记账，在很短的时期内对做买卖就很内行了。我们食宿都在一起，他视我如子，真心实意地关心着我，我也敬爱他。那么我们本该很快乐地过下去了，但是在1727年2月初，其时我正21岁，我们两人都生病了。我的病是胸膜炎，这个病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受了很大的痛苦，几乎不想再活下去了，等到身体逐渐复原时，我反倒有一点失望了，同时又有几分惋惜，我现在又不得不把所有讨厌的工作

再重新做起来了。我不记得德纳姆先生生的是什么病，总之，病生得很久，最后他去世了。他在口头遗嘱中赠给我一点遗物，算是他对我仁爱的表示，而他就这样又把我一人留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了。因为这店为他的继承人接管了，我的雇用合同也就告终止。

再与凯默合作

我的姐夫霍姆斯现在正在费城，劝我回到自己的行业上去。而凯默也劝诱我，答应给我一笔很高的年薪，去经营他的印刷所，那么他就可以更好地照管他的文具店了。我在伦敦时从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听说他品格不良，所以无论什么事也就很不高兴和他合作了。我起先想谋一个商店雇员的位置，但是一时不容易找到，只好重新和凯默订约了。我在他的印刷所中认识了这几个工人：

休·梅雷迪斯，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士人，30岁，从前在乡间做工，诚实而有见识，富有经验，喜欢读书，但也好饮酒；

斯蒂芬·波茨，一个21岁的乡下青年，从前也在乡下做工，天赋颇不平凡，机智、幽默，但有点懒惰。这两个人，凯默以每星期极低的工资雇用他们，如果他们的工作有进步，每三个月就再加1先令，而对于这种后来加薪的希望就是他引诱他们的法子。梅雷迪斯做印刷工作，波茨做装订工作，依据合同，凯默要教导他们技术，虽然他自己也是一点都不懂得；

约翰，是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没有一件事他可以做。他的服务期订为四年，是凯默从一只船上的船长那儿雇来的，他也要把他造就成印刷工人；

乔治·韦布，一个牛津学生，服务期为四年，工资和约翰相同，凯默想把他造就成排字工人。关于乔治的事情，下面就要讲到；

还有大卫·哈里，一个乡下孩子，凯默收他为学徒。

我很快发现凯默肯出比往常高出许多的薪金来雇我，是因为想让我把他那里的廉价的生手训练出来，等到我教会了他们（他们是都和他有订约的），他就没有我也能做了。无论怎样，我仍然很愉快地工作下去，把他的印刷所整顿得很有秩序（以前是极混乱的），还指导他的工人渐渐专注于他们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好。

这是一件古怪的事，一个牛津学生竟沦为卖身的雇工。他不过18岁。他告诉我他的身世：生于格洛斯特，在那里的文法学校上过学，当他们演剧时，他因为扮演角色高妙，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名气。他曾加入过那里的“籍契俱乐部”，写过几篇散文和诗歌，都登在格洛斯特的报纸上。以后他被送到牛津上学，在那里他住了约有一年，但是并不满足，想去看看伦敦，希望成为一个演员。终于他在接到了每季补助费15几尼时，没有去还债，而是走出牛津镇，把他的长制服藏在金雀花丛中，跑到伦敦去了。在那里，没有朋友来规劝他，他就与坏人交往起来，不久花光了钱，又找不到门路进入演员的圈子，手头拮据穷困起来，典当了衣服，又没有面包吃。当他在街上饥饿地走着，正不知怎么是好的时候，一张人贩子的广告放在他的手中，是那种用款待和怂恿的办法骗人同意到美洲去工作的广告。他签了这个合同，立即动身上船来到美洲，遂有今天在此佣工的结果。自离家后，他没写过一行信息通知他的亲友。他活泼、聪敏、天资浑厚，是一个快乐的伙伴，但也懒惰、轻浮、极不谨慎。

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走了。我和其余的人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发现凯默一点也教不了他们什么，而从我这儿却天天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他们都比较尊敬我。我们在星期六不工作，因那是凯默的安息日，这样我们就有两天的读书时间。我在这城中和聪慧的人的交往逐渐增加。凯默自己待我也亲切有礼，这时没有什么使我不舒服的事，只有佛农那一笔钱，我尚不能偿还，因为直到那时我还是一个很不会理财的人。不管怎样，佛农很和善的对这笔款一直未提过。

我们的印刷所时常缺少铅字，美洲又没有浇铸铅字的铸造所。我在伦敦的詹姆斯印刷所中曾经看见过浇铸铅字，但未曾仔细留心怎么制。不管怎样，我仍打算自制铸模，以现有铅字为范，造出铅模，来铸新铅字，而我就这样居然还差强人意地补充了所有的空缺铅字。我有时也雕刻一些东西，制造过油墨，兼管理仓库，总之，我成了印刷所的打杂工。

但是不管我怎样勤勉工作，随着别的工人在业务上的进步，我发觉我的职务日渐不重要。当凯默给我第二季薪金时，他明示我，他觉得负担太重，并且认为我应该减薪。而且他逐渐变得很没礼貌，摆出一个老板的样子来，常常挑剔毛病，吹毛求疵，并且似乎预备同我决裂了。不管怎样，我十分忍耐地维持着，以为他之所以这样一部分是由于他负债过多的环境所致。终于因一件小事情致使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那天法院旁边忽然传来很大的吵闹声，我从楼窗中伸出头来看是什么事。凯默正在街上，往上一看，正见了我，就大声怒吼叫我别管闲事，注意我的事务，还加了一些责骂的话。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责骂我，激怒了我，所有在场的邻居都是证人。他还立即进了印刷所，跑上楼来，继续责骂，于是双方都破口争吵起来。他把解雇预告通知单交给我（我们合同上规定下通知三个月以后才解雇），还表示他希望当时没有约定需这么长的解雇预告期。我对他说他的这种希望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立刻就可离开他，于是就拿了 my 帽子向门外走去，在楼下看见梅雷迪斯，请他照管我留下的东西，并把它们拿到我的寓所来。

梅雷迪斯在黄昏时依我的话来了，当我们讨论我的事情时，他非常关心我，并且很不愿意我离开印刷所而他还留着。他劝我不要回故乡，这是我起先的念头。他提醒我注意凯默因为负债，他所有的东西都已抵押，他的债权人已感觉不安，他把店经营得很糟糕，并常常为了现金周转而照本卖出他的货物，还常常赊卖货物，又不记账，所以

他一定要失败，这样就有了我可以利用的空隙。我说我没有本钱，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很看重我，他们之间曾经谈过几次话，他担保出钱给我开店，如果我和他合伙的话，他说：“在春天我和凯默所订的期限就满了，到那时我们可以从伦敦买来印刷机和铅字。我自知我算不得工人，如果你愿意，你出技术，我出资本，咱们就平均分配赚得的利益好了。”

这个建议是合适的，我欣然表示同意。他的父亲正在城里，也赞成这个计划，尤其他看我对他的儿子有很大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力，曾使他戒绝喝酒，所以他希望当我们能够这样密切合伙时，可以改掉他全部的坏习惯。我把一张货物清单开给他的父亲，由他交给商人代为置办各种必需物品，在东西没有运到之前暂守秘密。在这期间我想在别的印刷所里工作，但是各印刷所都没有空缺，所以就闲散了几天。其时，凯默正承印切尔西的钞票，这件事必须要有雕版图版和各式的铅字，而这些东西只有我能够做，并且他恐怕布雷福德会请我去承办这项生意，抢了他的活，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我一个很有礼貌的口信，说老朋友不要为了在感情激动时说出的几句话就分开，希望我能回去。梅雷迪斯劝我答应，这样在我的日常训练下可以使他有更多的进步机会，所以我就回去了。我们过得比以前的日子要平静得多。切尔西的生意承办到手了，我设法为它做铜版来印，这在本国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我为钞票雕刻了一些花纹和字码等东西。我和凯默一起到柏灵顿去，在那里我把全部工作做得非常令人满意，因此他赚了许多钱，才能使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致破产。

在柏灵顿我认识了许多这州的重要人物。有几个是议会派来的监印委员会的委员，监视所印的钞票不得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常轮流地和我在一起，而这些来监印的人，大都带着一两个朋友做伴。我读书多，思想受其陶冶，见识远高过凯默，正是这一原因，他们更喜欢与我交谈，他们请我到他们家里，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

并且待我极有礼貌。那时，凯默虽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冷淡。其实他是个怪人，不懂公共生活，喜欢反对已被公认的意见，又极不整洁，对于宗教的某几点太过狂热，并且又有一点流氓气。

我们留在那里约有三个月，在此期间我所结交的可以列入朋友行列的有下列几个人：

艾伦审判官；

塞缪尔·巴斯蒂尔，是州秘书长；

艾萨克·皮尔逊；

约瑟夫·库柏和几个姓史密斯的人，都是州议员；

还有艾萨克·德科，是测量局长，他是一位伶俐精明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在年轻时开始做烧砖匠运泥的小工，到成人后才学习写作，后来为测量员拿测量链，他们教他测量，由于他工作勤奋，到现在已赚得了一份很可观的产业。他说：“我预知你必能很快地在印刷业中挤出凯默，并且在费城以此致富。”那时我打算在这里或别的地方开业的意图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些朋友后来对我帮助很大，而我偶尔也对他们有点帮助。他们毕生都不断地关注着我。

我的思想观

在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先告诉你我当时有关原则和道德方面的思想观念，那么你就可以明白这些东西影响我未来的事业是多么深远。我的父母老早就给我宗教上的感染，他们虔诚地给我的童年染上反国教的色彩。但是当我在各种不同的书上读到对某些问题的辩论，而对他们有所怀疑时，我还不满15岁，更开始怀疑《启示录》本身了。有些反对自然宗教的书落到了我手里，据说博伊尔牧师的讲道主要取材于这些书。有时，他们对我所造成的影响却正与他们的目的相反。其中引用来为了加以反驳自然宗教的理论，据我看来比驳斥者的理论强有力得多。总之，我不久就成为自然宗教者了。我的理论把一些人导入歧途，尤其是科林斯和劳尔夫，但是后来他们两人毫无怪罪，而我却深受其苦，更回想基思对我的行为（他又是另一个自由思想者）和我自己对于佛农和里德小姐的行为，这些事时时使我大为不安，我开始疑心自然宗教的教义，认为虽然它们也许是对的，但不很有用。我在伦敦所著的小册子（印行于1725年），曾取德莱顿的诗作为题词：

凡是存在的，都是对的。

但是半盲的人，

只看见链条的一部分，

只看见最近的一环。

他的眼睛达不到那在上天衡量一切的公平的秤杆上。

这本小册子还从上帝才有的德行、无涯的智慧、仁慈和权力得出结论：绝没有一件东西在世界上是不对的，善和恶是无意义的区分，并无差别。现在看来，我以前的想法并不是聪明之举，并且我疑心也许有些错误会不知不觉地潜入我的言论中，所以就影响到一切信从的人，以为这是普遍的哲学上的道理。

我慢慢地相信，“真实”、“诚恳”和“淳厚”在人与人的交往上是获得幸福最重要的东西。于是我写了一个决心书，这仍旧存放于我的札记中，并将终身行之。的确，《圣经》中的《启示录》对于我还不像这些决心书这么重要，但是我怀有一种想法，即虽然禁止我们做的某些行为不见得由于它们是坏行为，有些叫我们做的不见得由于它们是好行为，但若把环境中一切事物的各方面都考虑进去，按其本性来说，这些禁止做的行为可能对我们是有害的，而命令我们做的可能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种确信，加上上帝仁慈的手，或守护天使的保佑，或偶然的幸运的环境和地位，或这一切综合起来，保护我度过这个危险的青年时期和在异乡时陷入的危险境地，在举目无亲，远离父亲的照顾和训诫的情况下，竟然保全我并没有做一件任性而严重的大错，而那种错误也许是由于我没有宗教信仰而可能造成的。我说严重的错误是因为当我年轻时，既没有经验，又有时受人家的欺诈，因此上面我提起的那些过错是有些必然性在其中的。在开始踏入社会时有着还可以的品格，我颇为珍视而决定保持着它。

合伙创办印刷所

我们在新印刷机从伦敦运来之前没多久回到费城。我们和凯默办清手续，让他在知道我们开店之前允许我们离开他。我们在市场旁边找到一间要出租的房子，把它租了下来。我现在知道这间房子每年要租金70英镑，而那时只要24英镑，为了减少房租我们便招了一个玻璃匠托马斯·戈弗莱一家同住，他们付一部分的租费给我们，而我们对外说法是寄食在他们家里。我们刚刚把铅字打开，把印刷所整理就绪，我的一位朋友乔治·豪斯就带来了一个乡下客户。这个人他在街上碰见，正在寻找印刷所要印东西。当时我们全部的钱正因为必须购置各种用品而都花光了，这个乡下人的5先令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而且来得这样适时，这比后来挣的任何5先令都令我高兴。我感激豪斯，使我以后常常预备扶助初次入世的青年，不然我不会这样热心呢。

哪里都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常常预言毁灭即将来临。在费城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很出名的一位老人，他看上去很有见识，说话时态度很严肃，他的名字叫塞绍尔·米克尔。这位先生和我素不相识。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门口，就问我是不是新近开设一个印刷所的那个青年，我答他“是的”，他说他为我担忧，因为印刷所是一个消耗大的事业，而且这种消耗必致赔尽本钱：因为费城是一个没落的地方，许多人都已半破产或近于破产，因此一切与此相反的表面现象，例如新起的建筑物和租金的高涨，就他所知都是虚妄的，因为事实上它们正是那些会使我们破产的东西。他还详细告诉我许多现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不幸。他离去后，我颇有些忧郁。如果我在开设此店之前认识了他，显然我绝不会开业了。这个人继续住在这个没落的地方，以同样的论调演说着。他好几年来拒绝在费城买一所房子，因为他认为一切都要慢慢地灭亡了。直到后来我很有幸看到他以高价买下一所房屋，其价比他以前做不祥议论时要高出五倍。

创办讲读俱乐部

我该先提一提，在前一年的秋天，我曾和几个朋友组织一个交换知识互相促进的俱乐部，名之曰“讲读俱乐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开会，我所拟定的会章要求每一个会员轮流提出一个或几个关于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加以讨论；又每人在三个月中提出或诵读一篇他自己写作的论文，题目随他自己的便。我们辩论是在会长的指导之下，务求本着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不喜欢争论，不以急于求胜的态度进行，并且为防止激昂的情绪，又规定一切独断自信的或针锋相对的意见，都算犯规，并且罚以小额的金钱。

最初入会的会员有约瑟夫·布赖思特纳尔，一个公证人契据誊写者，脾气好，够朋友的中年人，他是诗歌的爱好者，凡能到他手的书从不放过阅读，写几首诗也过得去，在许多小玩意儿上很精通，谈话颇有见解。

托马斯·戈弗莱，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后来发明了一种现在叫做“哈德里象限仪”的东西。但是他除数学以外，所知甚少，并且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伙伴。正如我曾遇见的大多数大数学家一样，他盼望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绝对精确，常常无休止地争辩一件极小的事情，以致妨碍了全部的谈话。他很快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个测量员，后来做测量局长。他爱读书，有时也作几首诗。

威廉·派尔逊，当过鞋匠，但他也喜欢读书，数学知识丰富。起先他为了想做占星家，所以学数学，后来却嘲笑占星学。后来他也成为了测量局长。

威廉·毛格理治，一个技艺极其精巧的工匠，是个心地善良、有见识的人。

休·梅雷迪斯、斯蒂芬·颇茨和乔治·韦布，我之前已说过了。

罗伯特·格雷，一个有钱的青年绅士，慷慨、活泼、聪慧，喜欢说笑话，也讨人喜欢。

还有威廉·科尔曼，当时是一个商店职员，和我年龄相仿。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冷静、头脑最清晰、心地最善良和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为很出名的商人，并且是我们州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毫无间断地持续到他逝世，有40年之久。

而这个俱乐部也差不多持续了这样长的时间，它是这一州中最好的哲学、道德和政治学术团体。因为我们的问题，在讨论前一个星期已宣读了，使我们能围绕这几个题目用心阅读，更可多地发挥题旨，并且在这里，又学到谈话的好习惯，每一件事情都按规定而行，以免双方争论。我们自组织以来，这个俱乐部长久存在，我在以后将有很多的机会谈起它。

我把俱乐部在这里叙述是让你知道有些事情对我颇为有利，会中每人都极力为我们介绍生意。尤其是布赖恩特纳尔使我们从教会那里获得印刷他们40张的教会历史的机会，其余由凯默承印，在这件事上我们工作得极为艰苦，因为价格是很低的。这书是四开本，印四号字，用大号长体字做标题，我一天排一张纸的字，而梅雷迪斯负责把它印出来。等我把版面拆开放回原字盘，以备明日之用时，已是夜间11时了，有时还要晚，因为我们还有别的朋友送来的小生意，所以时常使我们弄得更晚。但是我仍决定要每天印一张四开纸。有一天晚上，我已将活字版排好，以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不料其中有一版不小心碰乱了，有两页的活字弄得杂乱无序，我立即在我上床以前把活

字分还原盘，重新再排。这样的勤劳工作，我们的邻居都已知道，也开始赞誉和信任我们了。尤其人家告诉我，在商人的“夜夜俱乐部”中提及新开的印刷所，普遍意见以为必将失败，因为那里已有两家印刷所：凯默和布雷福德，但是贝尔德博士（你跟我在许多年以后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看见过他）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说：“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劳，高出我所见过的他的同行中任何人。当我从俱乐部返家时，我见他仍在工作，并且他在他的邻居起床之前就在工作了。”这些话打动了别人，以后就有其中一位文具商托我们代销文具，但是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做门市买卖呢。

我之所以这样着重地、毫无顾忌地提起这种勤劳，虽然看来似乎有点自夸自赞，却是为了我的子孙们。当他们读这本书时，由于看到这种美德在我的全部叙述中都对我有利，就会知道这种美德的用处了。

办报成功

乔治·韦布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她借给他一笔钱，他用它收回同凯默签订工作时限的合同，就到我们这里来，要求做一个工人。我们那时不能雇用他，但我却愚蠢地告诉他我有意创办报纸的秘密，说到那时他就可以有工作了。我还告诉他，我成功的希望在于现在的布雷福德所印的唯一的报纸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管理得很糟，毫无趣味，但他仍可获利。我于是想，办份好的报纸在我的经营之下是不会失败的。我请韦布不要对人讲起，但是他把这事告诉了凯默，凯默立即先行着手，自己筹备印行报纸，韦布也被他雇用了。我大为愤怒，因为我现已不能创办我们的报纸了，就用“好事者”为署名，写了几篇有趣味的文章，登在布雷福德的报纸上来反对他们，这些文章后来被勃伦脱纳尔继续写了几个月。因为这个缘故，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布雷福德的报纸上，而对凯默所要开办的、被我们戏谑和嘲笑的报纸，都置之不理了。然他仍开办他的报纸，办了三季，订报的人至多有90个，他就以很少的钱盘给我了。而我，早已预备办这件事，就径自把它抓到手中，在数年之中这份报确实给了我极大的利益。

我觉得我常常只提到自己，虽然我们仍旧继续合伙。这可能是因为在事实上，全部的业务经营都放在我身上。梅雷迪斯不懂排版，印刷也不行，头脑清醒的时候又很少。我的朋友们都为我和他的合作而惋惜，但是我还是努力把这个合作搞好。

我们刚出版的新报纸与以前本州的任何一种报纸迥然不同：字迹清晰，印刷精美，并且针对伯内尔总督和马萨诸塞州议会之间的争辩，写了观点激烈的文章，引起了重要人物的关注，遂使这份报纸和主办人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都做了我们的订户。

他们一订我们的报纸，就有许多人跟着订，我们的销量就日渐发达。这是我曾研习写作的第一个好效果。还有一个效果是，那些领袖人物，见到一种报纸现在归一个能够执笔的人管理，觉得应当鼓励和资助我。布雷福德仍旧印他的选举票、法典和别的公家生意。他曾印一篇议会给总督的咨文，印得模糊错乱，我们把它重新排过，排得完美而正确，每一个议员送一篇，他们觉得两者差别一目了然，这件事加强了我们在议院里的朋友们讲话的分量，他们通过了明年由我们承印他们各种印刷物的决定。

在议会里的我的朋友中，我绝不能忘记哈密尔顿先生，先前我已经提到过他了，他那时已自英国回来，做了议员。在那件事情上他为我很尽力，后来他还帮我做过许多别的事，他毕生对我爱护备至。

佛农的那笔账款，大约在此时要求我汇去，但是也不催我。我写给他一封坦直的答谢书，恳求他宽容几时，他就答应了我。等到我能够归还时，立即本利偿清，并且深致谢意。这样，那个过失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

自立门户

但是现在我们又遭遇到另一件难事，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梅雷迪斯先生的父亲，根据我的了解和指望，他是应当为我们的印刷所付款的，他预付了100英镑现金。但是我们还欠设备商人100多英镑，他们变得不耐烦起来，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交了保释金，但是看起来，如果这笔款子不能如期偿付，这件官司必将立即判决和执行，而我们极有希望的前途就一定会和我一起遭到毁灭，因为印刷机和铅字必将出卖以清偿债务，也许只好半价卖掉。

在这个困难中有两个忠实的朋友，他们的好意，只要我有记忆之时，我将永志不忘。他们互不认识，分别到我那儿去了，也不是由于我的请求，两人都肯垫付足以使我自己经营印刷事务的全部金钱，如果我认为可行的话。但是他们不愿意我和梅雷迪斯继续合作，因为他们说，时常看见他在街上饮酒，并且在酒店里玩下流的娱乐，已是声名狼藉了。这两个朋友就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如果梅雷迪斯能够履行合同中的职责，我不能有散伙的计划。因为我想，由于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若能做一定就去做的事，我对他们的恩惠亏欠甚大，但是如果他们后来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我们的合作才必须解散，那时我自己才有自由去接受我朋友的帮助。

这样，这件事停顿了一些时候，我才对我的同伙说：“也许你的父亲不满意你在我们的事务中只承担一部分，并且不愿意用单独为你垫付的钱而为我和你两人垫付。如果是因为这个缘故，告诉我，那么我将把全部事务让出来给你，我自去找事情好了。”他说：“不是的，我的父亲真的已束手无策了，并且是真的没有能力了，而我又愿再去逼他。我看这是一种对我不合适的事业。我素来是学做农业的，跑到

城里来实是我的愚蠢之举，以30岁的年龄，来做一个新行业的学徒。我们威尔士人有许多都跑到北卡罗来纳去立业，那里的地是很便宜的。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去，仍做我的旧业，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如果你担当下我们共同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付的100英镑，代我付清我个人的小额借款，再给我30英镑和一副新马鞍，我就放弃这个合伙经营，一切东西都归你所有。”我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起草了份协议，签字盖章。我把他要求的東西给了他，然后他就立刻到北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写来两封长信，信中有对那个地方的气候、土壤、农业状况等很满意的描写，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是聪明在行的。我把那信印在报上，大家甚为欢迎。

等到他去了，我就求助于我的两位朋友，又因为我不肯在两人之间有所偏爱，我把我所需要的钱，也就是各人愿意供给的钱，各取一半。还清了合伙时的债务，我就独立进行业务，登报声明那个合伙已取消了。我想此事大约是在1729年。

约在这时民众有要求更多纸币的呼声，在本州现存的只有15000英镑纸币，而那些纸币不久就在市面上不大见到了。有钱的居民反对增发，凡是债权人都武断地反对全部的纸币，因为他们恐怕会像新英格兰一样造成纸币跌价。我们曾把这一点在我们的讲读会中讨论，在那里我是站在增发纸币一方的，我确信在1723年初次发行的那笔小数目纸币，会使商业提高，就业机会、人口也有所增加，因为现在我见所有的老房子都住了人，而许多新的住房也在建造；反之，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初次在费城的街道上散步，吃我的面包卷时，我曾看见在胡桃街，与二街和前街之间的房屋，大部分的门上贴着“招租”的告示，在栗子街和别的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差不多，这种情形，使我想到城里的居民都要一个个离开此地了。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辩论愈积愈多，我撰写并印行了一本不署名的小册子，题为《纸币的性质与需要》。这本书颇为普通公众所欢迎，但是富人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本书加强了增发纸币的呼声，恰巧在富人之间没有一个写文章的人能够批驳这本书。他们的反对减弱了，于是议院终于以大多数票通过了增发纸币的议案。我的议院中的朋友们想起我曾有微劳，以为当由我承印纸币以奖赏我。这是很获利的生意，对我大有帮助。这是另一件由于我能够写作而得到的利益。

纸币的效用，因时间和经验而变得明显到用不着再多辩论的地步了，所以没有几时纸币就增发到55000镑，在1739年达到8万英镑，以后因战事而增发到35万英镑。在这个时期，商业、建筑和人口数都有增加。然而我现在想发行纸币应有一个限度，超出了限度的数量是有害的。

不久，我又因我的朋友哈密尔顿的介绍，获得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那时我以为这又是一件有利的生意了。在小本经营者看来，小事情也显得重大了。至于这些生意，据我看来，也确有很大利益，因为它们对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又为我介绍承印政府的法典和选举票，这些业务在我做这个行业时一直是由我来做的。

我现在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店中兼卖各种发票，是市面上所仅见的最无错误的一种，能做到这点，要依赖我的朋友勃伦脱纳尔的帮助。我也卖纸张、羊皮纸、账簿等。怀特马什，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一个很出色的工人，现在到我这儿来和我一起工作，他勤恳而有恒心。我还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我现在开始把为开印刷所而欠下的债慢慢还清。因为要巩固商人的信用和声望，我不但注意到勤劳和节俭的实际情形，也要避免那种趾高气扬的形象。我穿得很朴素，从来不在消闲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和打猎。真的，只有时因一本书籍把我的工作耽误了，

但那也是不常有的，而且是隐蔽的，不会受到指摘的。为了表示我并不高高在上看不起我的职业，有时我把店中购置的纸张装在手推小车上，穿过街道，推回家中。于是，人家敬我为一个勤劳节俭的青年。我买东西从不拖欠，那些进口文具的商人都拉我做客户，还有别的商人主动把书籍供给我代销，所以我的生意进行得很顺利。在这时候，凯默的信誉和事业一天天地衰败了，终于逼得他把自己的印刷所卖掉来还债。他跑到巴巴多斯，在很苦的环境下住了几年。

凯默的学徒戴维·哈里，这个人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时我曾教过他的，在费城也开了一个印刷所，并买了许多印刷设备。我起先觉得哈里是一个劲敌，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很有能力的，并且有很大的信誉。我于是建议和他合伙，我真幸运，他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他很骄傲，穿得像个绅士，生活奢侈，喜好许多消遣游戏和户外娱乐，债务缠身，根本不管他的事业。在这种情形下，什么生意都丢开他了，他没有办法，就和凯默一样到巴巴多斯去了，并且把印刷所也带了去。在那里这个学徒用他的旧主人做工人，却常常生口角。哈里仍旧入不敷出，终于被逼得卖掉了印刷机，而回到宾夕法尼亚乡间去工作了。那个盘下哈里的印刷所的人仍用凯默工作，不几年凯默就去世了。

现在费城除了布雷福德的老店以外，没有和我竞争的印刷所了。布雷福德现在生活富有而舒适，用零散的工人，做一点生意，并不是很热心于这个事业。不过他是管理邮局的，因此一般认为他有更好的机会去得到新闻，认为他的报纸上的广告传布得更远，因此他的广告也比我的报纸多，这对他是有利的，而对我是不利的。虽然我也的确是由邮局派送报纸，但是公众的意见却仍对我们两人的报纸有两样看法。我派送报纸是贿赂邮差，由邮差暗中派送的，布雷福德甚至恶意到禁止邮差这样做，这件事使我很愤慨。我认为他做这件事太卑鄙了，有朝一日等我做到他的职位，我绝不会效仿他。

结婚

我至今仍寄食于高弗莱处。他和他的妻子、小孩住我的房屋的一部分，店面的一边是他做玻璃生意的地方，他总是醉心于自己的数学之中，所以不大工作。高弗莱太太计划把她的一個亲戚的女儿介绍给我做妻子，并经常给我们晤面的机会。天长日久，我就产生了爱慕之情，而这位少女自身也是值得爱的。她的家长以不断邀请我去吃饭并且把我们两人单独留在一起作为鼓励，直到谈婚论嫁的地步。高弗莱太太从中大力搓合，我告诉她我希望他们女儿带来的钱可以偿还我的印刷所尚未付清的债务，我相信这个数目不会超过100英镑。她传过话来，说他们给不起这么多的嫁妆。我说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房屋抵押出去。过了几天，回来的答复是他们不赞成这桩婚事了，说是他们询问布雷福德，他告诉他们印刷所不是赚钱的生意：铅字很快就会用坏，因此常要添新换旧；凯默和哈里相继失败，而我或许不久就跟他们一样了。这样，我就被禁止登门，而这个女儿也给关在屋里了。

我不知道究竟真的是情感的变迁，抑或不过是一种诡计。他们认为我们两人堕入情网太深，必然不能割断，因此我们就会偷着去结婚，这样他们便可以任意地给我们或不给我们钱了，事实到底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怀疑他们的动机，大为痛恨，再不去他们家了。高弗莱太太后来又带给我一些关于他们意旨的好消息，想叫我们继续来往，但是我断然宣布我决心和那个家庭断绝来往了。这句话高弗莱太太听后大为不悦，从此有了裂痕，高弗莱就迁居了，于是全部房屋都归我住，我也决定不再和人家分租了。

但是这件事情把我的思想转移到婚姻方面来了，我在我的四周寻找，在别的地方也设法结交，但是不久就觉得，一个以印刷为职业的人，别人一般都以为是穷人，我再不抱希望能娶一个带钱来的妻子，

即使有这样的一个，在我却又难得合意。正在此时，那种青年的难以克制的欲念促使我常和偶然碰到的下等妇女谈情说爱，跟着这种事情而来的后果是浪费和不方便，此外还有我最怕的是会有染上疾病的危险，虽然我很幸运地没染上。一种友谊的来往在我和里德小姐的家庭之间仍旧继续着，因为我们是邻居，又是旧相识，他们从我原先寄宿在他家的时候就都关心着我。我常被请去，有时他们也到我这里来商议事情。我怜惜可怜的里德小姐的不幸境地，她总是很沮丧的样子，很少有快活的时候，避免与人接触。我想到当我在伦敦时的轻率和无定见，实是致她不幸的大原因，虽然里德小姐的母亲以为这个过失应归咎于她自己，因为她曾阻止我们在我到伦敦去以前结婚，又趁我不在时劝女儿和别人结婚。我和里德小姐相互间的爱情又复活了，但是我们的结合现在还有很大的阻力。里德小姐和她丈夫的结合看起来虽已失效，因为据说他有前妻住在伦敦，但是这件事因在远地不容易证明，并且虽然有他死亡的消息，也是不能确定的，何况这个消息即使是确实的，他还留下许多债，这些债必得要求他的继承人偿还。但我们还是大胆地不顾一切的困难，在1730年11月1日结婚了。我们所害怕的麻烦没有遇到一件。她确是个善良、忠实的助手，帮助我照管店务，我们共谋繁荣，并且有福同享、相互努力以求对方的快乐。这样，我总算尽力改正了我的大过失。

建立订阅图书馆

大概在此时，我们的俱乐部不在酒店里开会，而搬到格雷斯先生的一间小房间里去了，迁移的目的是由于我的建议，因为我们的书籍在我们讨论问题时经常要参考，不如把它们聚在我们开会的地方，可以更方便一点，有必要时就可以参考。这样把我们的书籍合并为一个普通图书馆，每一个会员都有利用别的会员的书籍的好处，差不多像是每一个人都有这许多书一样。他们都同意了。我们能交出的书籍摆满了房间的一端，书的数目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多。它们虽然有很大的用途，但是因为对书籍缺乏必要的照料，所以常有麻烦的事情发生，这次书籍的集聚，约在一年之后就分散了，各人都又把自己的书带回家去了。

现在我着手进行有着社会性质的第一个计划，就是成立一个订阅图书馆。我作了一篇建议书，由大律师布洛克登先生把建议书的格式弄好，又由讲读会中我的几位朋友帮助，介绍了50个订户，开办时每人出40先令，以后50年每年出10先令，这是我们的会社准备维持的年限。后来我们获得特许状，会社年限增加至100年。这是北美订阅图书馆之母，现在这样的图书馆是非常多了。图书馆自身成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且继续增加。那些图书馆丰富了美洲人的普通知识，使普通的商人和农夫的知识和其他各地的大多数绅士一样，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全殖民地普遍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也有所贡献。

第2部 正传续篇

两封来信

艾贝尔·詹姆斯先生的来信，内附有我的生活记录，此信是在巴黎接到的。

我亲爱的可敬的朋友：

我常想写信给你，但是却不能按着我的意思去做，因为这封信也许会落到英国人的手中，恐怕有些印刷商或其他好事之徒会把其中的部分内容发表出来，那就要给我的友人带来痛苦，而我自己也要受到谴责的。

自从我得到您自传的原稿之后，使我欢欣异常，原稿约有23页，全都是您的亲笔，有着您的出身和生平的记述，是写给您儿子的，结束于1730年，还有一些注释，显然是您的作品。我把一个抄本封好附上，意思是想请您继续写下去，写到最近的时期，那么前后两部分就可以合并在一起。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动手，希望您不要再延迟下去。正如牧师告诉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如果诚恳仁爱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旦离开他的朋友们而去，世间将失去一部有趣而有益的著作，那么世界将要说些什么呢？这部著作不单对于少数人是有用的，读来赏心悦目，对千百人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一类著作对青年心理的影响之巨大，在我看来，是没有像您——我知名的朋友的札记这么明显的。这本书差不多不知不觉地引导青年决心努力像您这位著者一样善良和杰出。当您的作品出版时（我想不能不出版），引导青年像您青年时期一样勤劳和节俭，这种工作对于那些青年来说，是何等的幸事啊！我知道，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或者许多人加在一起，像您在早期

就注意到美洲青年的事业、节俭和克己这样能鼓励勤勉刻苦的精神。我并不是说，除此以外，这部著作没有别的价值和用处，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艾贝尔·詹姆斯

上列一信，我交给一位朋友去看，下面是我从他那里接到的回信。

最亲爱的先生：

我读完了你生平大事的札记，那是你的教友会的朋友还给你的，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要写一封信给你，说明我的理由，为什么如你这位朋友所希望的那样写完与出版这本书是有益的。过去有一个时期，各种事情阻碍我写信给你，并且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值得任何期望。可是，现在正碰上空闲的时间，我就来写信，至少是为了我自己喜欢，并使我自己从中得到教益。但是我所用的词句或者会得罪像你这样的人，不过我要告诉你，我要当做写给别的和你一样善良和伟大的人一样，那么就会少一些拘束。我想对你说，先生，我要以下述的动机恳求你写出你的平生经历。

你的经历是这样不平凡，如果你不自己写出来，别人也一定会把它写出来，那这样也许是有害的，而如果你自己来写却一定能写得完善。它还可以介绍你国家的国内形势，可以大力吸引那些善良、豁达的移民前来。想到他们如此热想知道你的生活，看到你的声名远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你的传记所能给予的更有效的广告了。

你所经历的都和一个新兴民族的习俗与生活环境相关联。在这一方面，我不以为恺撒和塔西陀的著作在人性和对社会真实性的判断上比你的更有意思。

但是，先生，根据我的意见，这些还是细小的理由，更重要的是你的一生所给予的陶冶未来伟人的机会，并连同你那陶冶个人品性的道德艺术（你所愿意发表的），常常有助于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幸福。

我提到的这两种工作，先生，特别地将提供一个崇高的自学的范例。学校和其他的教育常常按照虚妄的原理，像是用一架笨拙的器械瞄准一个虚设的目标，但是你的机械是简单的，而目标是实在的，并且当父母和青年们缺乏资财来安排一个合理的人生时，你却发现了许多人的自我能力，这是不可估量的！

在个人品德上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是在晚年时期的生活里，那只是一种微弱的影响，而在青年时期，我们培植了我们主要的习惯和见解；在青年时期，我们选择了职业和配偶；在青年时期，人生转折点也确定了；在青年时期，甚至连下一代的教育也确定了；在青年时期，人所不知和人所共知的品格也已决定；同时，生命的期限就是从青年时期展开的，生命该从青年时期就好好地开始，尤其在我们以选择职业为主要目标以前。

你的传记将不仅是传授自我教育的好方法，也是一个造就有智慧的人的教育方法。而最有智慧的人，将以观看另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行为的详细叙述，而得到启发和促进。那么，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在黑暗中盲目前进，几乎没有一个向导时，为什么软弱的人们要被剥夺这样的帮助呢？

先生，现在要对儿子们和父亲们加以指导。引导所有有智慧的人变得和你自己一样，使另外的人们也成为有智慧的人。当我们看见政治家和军人对人类是怎样残忍，知名人士对他们的朋友是怎样悖理时，那么去观察这关于平和谦恭、恬淡态度的人渐渐增多的例证是有益的，且这个人又善于治事，并具备热情和善良。

你所讲述的这种个人的生活事件，超出整个的事件，一定很有用处，我们在通常的事务上需要谨慎小心，那么你所讲的你怎样处理这些事务，会使人们从中受益。这很可以说是人生的关键，要向他们解释这许多无论何人都该听到一次解释的事情，给他们一个由于有先见之明而智慧的机会。

说到我个人的经验，最亲切的东西是把别人具体的事务拿到我们面前，那是很有兴趣的。这显然可以在你的笔下碰到，鼓舞我们，那么我们的事务和管理将有一种简易而重要的方法了。而我确信你安排这些事务有独到之处，和你谈论政治或哲学一样，什么东西能比人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方法（考虑其重要和错谬）更有价值呢？

有些人不懂得道德，有些人空幻地玄想，还有些人故意做恶事，但是你，先生，我可确定，你所写出来的东西都没有这些，而是智慧的、有经验的和善良的。

你的自传中（因为我想象以富兰克林博士互相比拟相似之处，不仅取其品格的一点，也要以个人生平相比较）不以出身微贱为耻，这是很重要的事，并且你已经证明对于快乐、道德或伟大，出身微贱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没有方法同样也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发现你自己也做出了一个计划，并努力遵行，得到效果，成为要人，同时我们也许看到，方法是简单而明智的，那是要依靠天性、道德、思想与习惯来实践的。

另外指出的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应当等待时机在社会舞台上显露头角。我们的感觉往往凝结于现今，而常常忘掉有更多的时间是会跟着来的，因此一个人应该安排他的行为以适合其整个一生。你的德行看来曾经引用于你的生活中，过去的时刻曾因知足和愉快而有生气，并不以愚蠢的暴躁或懊丧使之苦恼。这样一种举止是使人的道德

与实际行为容易效法个别真正伟人的例子，因为伟大的人的品格常是忍耐。

你的教友会的朋友，先生（这里我又将想象我这封信是写给很像富兰克林博士的人的），称赞你的仁慈、勤劳和节俭，他以你为青年的典范，但是他单单忘掉了你的谨慎谦虚和公正无私，没有这两点你永远不能期望你的进步，或在那时找到你愉快的境遇。这是一个有力的教训，足以表示不追逐名利和节制心理的重要。如果这位朋友已知道你的名誉、性格和我一样，他必将说，你前期的写作和评价将引起对于你的传记和《道德的艺术》的注意，反之，你的传记和《道德的艺术》，也将引起对于你前期写作和评价的注意。这是一种有益的品格，并且它把整个的属于此类的东西都引到更伟大的戏剧中去，而这是比许多人已经做的或者有意去做的有更大的用处的，如果他们缺少改进他们的思想和品格的方法。

但是我有最后一种想法，先生，就是请把你的一生写成一篇传记。这种写法似乎有点不时兴，但仍是很有用的，尤其是你的范例更为合用，因为这本传记将是一种可以和各种公开的凶手、阴谋家和可笑的修道士的自传或虚妄的文学作品相比较的作品。如果鼓励你自己多写这一类的东西，并且引导许多人在一生中模仿你所写的，这会比全部的普鲁塔克的传记合在一起还要有价值。但是我已厌倦了自己形成的品格，关于这个品格每一种表现在世界上只适合于一人。

我将结束我的信了，我亲爱的富兰克林博士，特向你作一个个人的请求。我是诚恳地期望着，那么，我亲爱的先生，你必得把你高尚品格的特点贡献于世界。考虑到你的高年、你的性格的谨慎和你的思想的特殊风格，以及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充分地了解你的一生的事实。

除开这些，现时代的伟大的革命，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一位作者，道德的原理已在这本书中提示出来，这本书将大大地显示它的重要影响。再者你自己的品格是值得精细研究的品格中最主要的一个，这一定将永久地受到赞誉。为了促进人生的幸福，我已经一再证明人即使在现在也不是一种邪恶可憎的动物，并且还要证明良好的管理可以使他改过迁善。同样的理由多着呢，我极愿看见这种意见早日成立，在人类中间树立许多良好的品格。

动手吧，我亲爱的先生，快一点把这件工作放在手中。你要表示你的善良，表示你的节俭。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你自己是一个热爱正义、自由与和谐的人，如我们在最近17年中看见的你的行事一样。让英国人不仅敬重你，而又热爱你。当他们对于在你的故乡中的个人有好感时，他们将进而对你的故乡有好感，并且当你的乡人知道英国人对他们有好感时，他们将进而对英国有好感。把你的眼光放得更远些，不要只限于说英语者，等到在政治和自然上的许多观点确定了以后，就要想到改良整个的人类。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自传的任何部分是成问题的，我觉得有一种品德存在于世上，只是我写的信多少有点随便。

我确信，我所提及的论《道德的艺术》，必能满足我们的主要希望。还有，如果你能把以上所说的几个观点放在心中，你所能做出的还要大得多。即使不能满足你的热诚的赞颂者的希望，你至少可以作几篇对人类的心灵有兴趣的东西。如能给予愉快的感觉，那就无罪于人了，这个人对于生命的美好的方面就能增加许多，否则他就被忧虑所愁，被痛苦所损害了。

所以，我希望，你将倾听在这封信里对你的祈求。我最亲爱的先生，我请求你同意。

本杰明·沃恩

巴黎，1783年1月31日

续传说明

我接到上面两封信已有多时了，但是我太忙，直到现在才想起履行信里的请求。如果我在家里，手头有以前所写的札记，这也许会写得更好，因为那些札记必将有助于我的记忆，而使我确定日期，但是我什么时候回家还无定准，恰巧现在有点空闲时间，我将极力回忆和写出来。如果我能活着回来，那么到了那里也许可以更正和修改。

这里没有任何写好了的抄本，我不知道是否写到我集资建立费城公共图书馆，这在当时只是个很小的规模，而到现在却相当可观了。我记得已经写到近于这件事的时间（1730年）。这里我将以这件事的叙述来开头，如果后来发现已经写过了，那么就删掉它。

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当我在宾夕法尼亚立业时，波士顿以南的任何一州都没有一家好书店。在纽约和费城，那些印刷所实际上就是文具店，他们只卖纸张等物，以及日历、俚歌和一些普通学校用书。谁要读书，就得先向英国去买了寄来，俱乐部的会员每人都有少许书籍。我们已离开了起先我们在那里开会的酒店，租了一间房间做会所。我建议我们全体都得把我们的书籍带到那间房间里，那么不仅在那里讨论时可用来参考，并且成为一个公共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借得要在家里读的书。这件事就照办了，使我们好些时候都感到满意。

知道了这个小的书会的利益，我建议把这种读书的利益贡献给大众，创办一所公共的订阅图书馆。我拟了一个必需的计划 and 规则的草稿，并得一位练达的律师查尔斯·布洛克登，把一切做成订阅合同的条款，合同中规定每一个订阅人要付出一笔钱做购买第一批书籍的费用，还要付每年的辅助金以添购书籍。当时费城的读者是很少的，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又大多数很穷，所以我极力奔走还是不能超过50人。他们大多是青年商人，每人先付40先令，以后每年付10先令，用这笔小小的经费我们就开办了图书馆，书籍从国外运了来。这个图书馆一星期开馆一日，出借书籍给订阅人，而由订阅人出一个字据，如果到期不还，就罚他书价两倍的罚金。这个设施立即显示了它的功用，别州的市镇都争相仿效。这个图书馆由于捐赠规模日益扩大，读书成了风气。我们的民众，没有别的大众娱乐能够转移他们对读书的注意力，因而和书籍结成了好朋友。没有几年，外国人就会看到我们的民众比别国同阶级的民众所受的教育要好，知识也高。

当签订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得遵守的为期50年的上述借书条款时，布洛克登先生，这位公正的律师，对我们说：“你们是青年，但是

你们中间任何一人都很少可能活着看到证书上写定的期满年限。”然现在我们中间毕竟还有许多人仍旧活着，而过不多几年，这张证书就无效了，因为图书馆已经归并于政府，上述文件也就失效了。

在征求会员时我遇到了反对和勉强答应的情形，使我立刻觉得借个人名义为任何有效计划提出的建议是不适当的。当一个人需要人们的帮助以完成那个计划时，他们也许疑心这样会把个人的声誉提高到他们之上。于是我把我自己放在不被注目的地位，并且说明这是许多朋友的计划，他们是爱读书的人，请我来进行和设法实现这个计划。用了这个方法，我的事情进行得极为顺利。自从这一次取得成功，我以后在这种情形下总是用这个方法，并且还诚恳地介绍给别人。在现时，你在虚荣方面的小小牺牲，在以后将大大地得到回报。如果有件事在一时不能确定是谁的功劳，有些比你更爱虚荣的人便要以为是他个人的功劳，以后即使嫉妒也得还你公道，而把功绩交还给真正的所有者。

读书是我唯一的乐趣

图书馆使我得以有恒地研习增进我的知识，每天我停留在里面一两个钟头，用这个办法相当地补足了我失掉的高等教育，那是我父亲从前所期望的。我自认读书是我唯一的乐趣。我从不把时间浪费于酒店、赌博或任何一种恶劣的游戏，而我对于事业的勤劳仍是照旧，不厌不倦。当时我因印刷所拖欠的债务还没有还清，还有年幼的孩子慢慢地要受教育了，还要和两家在我之前就在这里开了店的印刷所做事业的竞争。但是不管怎样，我的境况一天比一天舒服了。我本来的节俭习惯仍旧未变。我幼时，我的父亲在他的教训之中常常引用所罗门的一句格言：“凡一生勤劳的人，他将要站在帝王之前，而不站在下等人之前。”从此以后，我以为勤劳是得到财富和名声的方法，这句格言鼓励着我。虽然我不曾想到真的会站在帝王之前，然而这件事，也终于碰到了，因为我曾站在五个帝王之前，甚至曾有和一位国王——丹麦国王并坐吃饭的荣幸。

有一句英国格言说：“一个人要发达，必得请教他的妻子。”我真幸运，有了一位和我一样有勤俭志趣的妻子。她愉快地帮助我的事业，折叠和装订那些小册子，照管店面，收集破布卖给造纸商等。我们不用好懒的仆人，桌子和我们最便宜的器具都是简单而清洁的。例如，我们的早餐有很久就只吃面包喝牛奶（没有茶），我喝牛奶是用一只价值2便士的陶制碗来盛，又用一只锡制的汤匙。但是请注意奢侈会怎样进入家庭，且不管原则怎样总是日益增长。一天早上，我被请去吃早餐，我看见牛奶盛在一只瓷碗中，还有一把银匙。这些东西是我的妻子没有让我知道就为我买来的，费去她23先令的巨款。做这件事，她并无其他托词来辩护，只是她认为她的丈夫应该有一把银匙和一个瓷碗，像他的任何一位邻居一样。这是初次在我们家里发现银器

和瓷器。隔了多少年以后，我们的财富增加了，金银器皿也渐渐地增多到价值数百英镑。

我曾受长老会教徒的宗教教育，虽然有些教义，如上帝的永恒教令、选拔、定罪等，据我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还有几点是可疑的，并且我老早就不出席这个教派的公共集会，因为礼拜日是我的读书日，但是我绝不是没有某些宗教的原则。我绝不怀疑，比如说，上帝的存在；他创造世界并以他的神意管理世界；对于上帝最蒙嘉纳的服务是为人造福；我们的灵魂不灭；以及一切罪恶将受惩罚而道德将受赏赐，或在现在或在将来。我认为这些是每一个宗教的要义，而这些既然是我国一切宗教都具有的，我就尊敬它们，虽然尊敬的程度有差别，因为我发现它们多少有点和别的东西相混合，这些东西没有鼓舞、促进或巩固道德的倾向，它们的主要作用却是分裂我们，使我们互相敌视。据我的意见，最坏的宗教也有一些好的效果，这种对于一切宗教的尊重，使我避免一切足以减少别人对他自己的宗教所抱的好意见的言论。至于我们一州人口增多，而礼拜的新场所不断感到缺乏，一般是用自愿捐款的方法建造礼拜堂。为了这个目的，不管是什么教派，我从来不拒绝拿出我的区区一份。

虽然我很少出席公共礼拜，我仍以为当它正当地举行时是既适当又有效的，我也照例地付我的常年捐款以供给费城仅有的长老会和长老会牧师。长老会牧师时常来拜访我，像一个朋友一样，并且劝我出席他的布道演讲。他时常这样说，我被劝服了，就依他去做礼拜，有一次连续去了五个星期日。如果他是在我见解中的一个好牧师，也许我还会继续下去，而不管我原是把星期日的空闲作为研习的机会了，但是他的谈话主要在讲各派互相攻击的辩论，或是解释我们长老会特有的教义，这对于我都是很枯燥无味、没有教育意义的。他从来没有指示或强调一句道德的原则。他谈论的目的似乎与其说是使我们成为好公民，不如说是使我们成为长老会教徒。

后来他以圣经中的《腓力比书》第四章的一节作为布道的题目：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我想，在这样一个题目上布道，我们不会没有一些道德。但是他把圣徒的意旨只限于五点，就是：

一、虔诚地遵守安息日；

二、勤读《圣经》；

三、须按时出席公众祈祷；

四、须熟悉圣典；

五、须敬重代表上帝的牧师。

这些也许都是好东西，但因为它们不是我在这个布道题目中所期望的好东西，我就没有从任何其他题目中遇见这些好东西的希望了，由此产生厌恶，从此不再去出席听讲。几年以前，我曾编制一个小小的礼拜式，或是祈祷的形式，预备我私人用的（那是在1728年），它叫做《宗教的信仰及行动条例》。从此以后，我总用这个仪式，再也不到公众礼拜堂去了。我的举动也许是可谴责的，但是我不管，也不求人家的谅解，我现在的目的是讲究实际，而不向人们辩解。

道德圆满计划

大约在这时，我想到一个达到道德圆满的勇敢而艰苦的计划。我愿意在无论何时过着没有错误行为的生活，我必得克服一切的自然倾向、恶习或交友不善的诱惑，如我所知道，或我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对的或是错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常去做这一件事而避免另外一件，但是我立即觉得我已担当了一个任务，其艰难很出于我意料之外。当我的注意力是用于监视某一种过失时，常常又因别的过失使我惊骇了，习惯就利用轻忽，嗜好有时比理由还强硬。我终于得出结论：仅仅一个空洞的信念，认为完美道德是我们的利益，还不足以杜绝我们的过失。悖理的习惯必须破除，良好的习惯必须获得和确立，我们才能有把握做出牢固的、始终如一的正直举动。为了这个目的，我想出下面的方法。

我曾在书上读到各种道德细目，我看到这类目录因不同的作者在同样名词下包含的意思或多或少而详略不同。例如“节制”一词，有些人只限于饮食，而别人却把它扩大到节制各种别的娱乐、嗜好、癖性、肉体或精神的情欲，甚至扩大到我们的贪婪和野心。我对自己建议，为了使它们清楚，宁可多用名目，每一个名目只附着很少的意思。我的计划一共包含13个道德名目，当时我以为都是很需要或很合意的，每一个都附以短短的定义，充分地说明我所下的定义的范围。

这些道德名目和它的定义是：

- 1.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 2.沉默。除非于人于己有利之言不谈；避免琐屑的谈话。

3.秩序。你的一切东西该有它们自己的位置；你的工作何时干、何时完，该有它们的时间。

4.决断。决定做你该做的事；做好你决定做的事。

5.俭朴。除非于人于己有益者不去花费，否则即为浪费。

6.勤劳。勿浪费时间；时间要常常用之于有用的事；弃掉一切不需要的举动。

7.诚恳。勿为有害之欺诈；勿思邪恶，唯念正义；如有言，言必诚。

8.正直。不要施行有害行为，也不要忽略你所应给的利益来损害任何人。

9.中庸。勿趋极端，制止因受到应得的损害而发怒。

10.清洁。身体、衣服与习惯，不许不洁。

11.宁静。勿为琐事或普通和不可避免的事件而自扰。

12.贞洁。除非为了健康和后嗣不行房事；行房事的时候，不要做到无味、衰弱或者损害你的或别人的安宁或名誉。

13.谦逊。效法耶稣与苏格拉底。

我很想奉行这一切道德的习惯。我认为，最好不要同时试行一切，以免分散了注意力，而应每次只抓住一条去实行。当我已掌握这一条，然后再进而实行另一条，这样下去，等到我把13条完全做到，而以前几条的获得可以使另外的更容易获得。上面的排列法我是依据这么一个观点定的：“节制”第一，因为它有助于获得冷静清晰的头

脑，这是为保持经常警惕所必需的，并且可以警惕旧习惯不停的吸引，是抵制不断诱惑的力量。这一条做到和建立了，“沉默”就要容易一点。而我要获得知识，同时也培植道德，想到在谈话中用耳比用舌多，所以想矫正我正在养成的只使我取悦于游戏伙伴的空谈、诙谐和说笑话的习惯，所以我列“沉默”为第二；其次是“秩序”，我希望能允许我多一点时间去用于我的计划和研习；“决断”，如果成为习惯，将使我能保持坚决的努力来获得一切上列诸德行；“俭朴”和“勤劳”可以使我从剩余的债务中解放出来，才能致富与独立，而使“诚恳”和“正直”更容易实践等。我又想起，依照毕达哥拉斯所著的《黄金诗》，日常考查是必需的，我想出下面的方法用以考查。

我做了一本小册子，在里面每一种德行占一页。每页我用红墨水画了直线，共计7行，每星期的一天占一行，上面写着曜日。7行之中又横画了13行红线，每行之首记着一种德行的第一个字母，在纵横线之中，用小黑点记着由考查而知道的在这一日的过失。

我决定每星期对于德行中的一项特别注意。因此，在第一个星期，我最关心的是避免与“节制”有任何小的冲突，把别的德行抛开，以待他日，只在每页记这一天的过失而已。如果在第一个星期内我能够做到第一行——注明是“节制”的那行，毫无黑点，那我猜想那一项德行的习惯已大为巩固了，否则便是无力。于是我才敢扩大我的注意力包括到第二项，而在下一星期保持两行都要没有黑点。这样进行到最末一项，我在13星期内把本期的条目完全做到（13星期为一期，每年4期）。正像一个人有个园地要除去莠草，不要企图一次就把莠草除光，这将超过他的范围和体力，但是如果同时只在一个苗床里工作，等到第一个做完了，再进而做第二个。所以我希望我会有使我鼓舞的快乐来从陆续消灭每行的黑点上看到在我每篇上我的德行的进步，直到末了，经过了几期，在13星期中按日检查后，我将因看到一本清白的册子而快活了。

我这本小册子曾引几行爱迪生的《卡托》作格言：

我相信如有一个权威凌驾于我们之上（那是有的，万物高声宣告），

他必喜爱美德，

他所喜爱的具有美德的人一定快乐。

又有西塞罗的格言：

人生的前导就是哲理，信从劝人为善的神，

为善虽死亦光荣，吾又何求长生不死而蒙受恶名。

另外又从所罗门的格言中引来，讲到智慧和道德的：

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是和平。

相信上帝是智慧的源泉，我以为为了得到智慧，既正当又需要恳求他的帮助，为了这个目的，我撰写了下面的简短祷告文，这篇置于我日常所用的考查表之前：

啊，全能的至善！宽仁的父亲！慈爱的引导者！增加我的智慧，它将发现我真诚的兴趣。加强我对于去实行智慧所指挥的事业的决心。领受我对于你另外的孩子的仁慈服务，以此为我力所能及的对于你给我的不断恩惠的唯一报答。

我有时也引用汤姆森的诗作为祈祷文，诗是：

光明与生命的父亲，你至高的上帝！

啊，教导我什么是善的，你自己来教导我吧！

救我出来，从愚蠢、虚荣和罪恶中，

从各种卑劣的追求中；

充实我的灵魂

以知识、自觉的安静和道德的洁净；

神圣，实质，永无止息之天福！

“秩序”格言要求我事业的每一部分都要有它应分得的时间，我的小册子的一页含有一日24小时的时间分配计划。

我执行这个自己检查的计划，偶尔中断，但随即接续上了。我惊愕地发现自身充满着远出于我意料之外的这么多的过失，但是我也满意地看到它的减少。为了避免时时调换小册子的麻烦，我遂擦掉记着旧过失的纸上的记号，以便记录下一期的新过失，以后还到处充满着黑洞，我把我的表和格言易以象牙册页，在其上面用红墨水画了直格，那就能久耐污染，而在那些格子上我用黑铅笔记着我的过失，这种记号我可以很容易地用湿海绵擦去。过了几时，我一年中只经过一次的检查，后来几年检查一次，直到最后我完全废止了，因为在航行与因事出外时，有许多的事情侵扰，但是我总是带着我的小册子。

实践“秩序”计划最使我感到困难。我觉得，虽然在个人他有支配他时间的场合，例如，一个印刷工人，这个计划可能是合于实际的，但是要使商人准确地遵守时间是不可能的，他必得同客户交往，常要按照商人自己的钟点接见他们。关于安置东西、纸张等的“秩序”，我觉得极难做到。我以前没有做这个的习惯，又因为我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好记忆力，所以并不觉得缺乏方法而带来的不方便。这个条目费去了我那么多的深切注意，而我的这种过失也大大使我烦恼，稍加改正，又重蹈覆辙，于是差不多预备放弃这个企图了，在这一点上我将

以有缺点的品格知足了。正像一个人，他向我邻居的一位铁匠买一把斧子，他要把斧面全部弄得跟斧刃边上一样的光亮。铁匠答应为他擦亮，如果他肯旋转那个机轮，他就去旋转了，铁匠把宽阔的斧面重重地压在矿石上，却使它的旋转很为吃力。这个人时时从机轮那面跑过来看这件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到了后来他想就这样拿走了，不要再磨了。铁匠说：“不，转下去，转下去，我们将渐渐地把它弄得光亮，现在还有几个斑点。”这个人说：“是的，但是我想我最喜欢有斑点的斧子呢。”而我相信也许有许多事也是这样的情形，他们为了缺乏一些什么和我所用的方法一样，等到觉得这好习惯和破坏恶习惯的困难，就抛弃了善与恶的斗争，而结论说是“一把有斑点的斧子是最好的斧子”。因为某种自命为理性的东西，时常指示我说，像我自己要求的极端严格也许是道德上的蠢事，如果人家知道了，会使我成为可笑的人了。而一个完美的人格必将受到妒忌和憎厌的骚扰，所以有善心的人必得在身上留下一些缺点，以留作他朋友指摘的余地。

其实，我知道对于“秩序”难以矫正。现在我慢慢地老了，我的记忆力也坏了，我才显然地感觉到需要它了。但是，虽然我曾妄想获得的完全人格永不曾达到，“秩序”两字尚未做到，但是我由此计划，成为一个比无此企图时较为良好和快乐的人，正像志在学书法而临帖的人，虽然他绝不能达到他的本愿，写得像那些帖一样高妙，他却由于临帖而有长进，如果继续写下去，也可以写得既清秀漂亮又清楚可读了。

我想把那个小计划告诉我的子孙也许是好的。谢谢上帝，他们的祖先一生有不断的幸福，直到他79岁，在这一年写他的自传。也许我在残年有什么逆运，唯有上帝知道。但是，如果逆运来到，过去快乐的映象应该能帮助他愉快地以更大的忍耐来承担它们。他以为他长期持续着的健康应归功于“节制”，直到现在仍旧留给他一个强壮的体格；早年境遇的顺适，财富的获得，应归功于“勤俭”，而以一切的知

识使他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并且在学者中间得到相当的声誉；本国人对他的信仰应归功于“诚恳”和“公平”，因此给他尊贵的位置，而所有一切美德结合起来的影响，就算在他所能得到的那种不完全的状况下，在一切态度温和、谈话愉快的情况下，使人乐于同他打交道，甚至他的青年相识也欢迎同他在一起，我因此希望我的子孙能仿效这个例子而获得有益的效果。

我还要在这里说明，虽然我的计划并非完全没有宗教成分，里面却绝对没有任何教派特有教义的记号。我有意避免这些。因为，既已完全相信我的方法有用又卓越，有时也相信可能对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会有好处（有时颇想刊行它），在其中，我必将避免足以引起宗教教派偏执的任何东西。我想为每种德行写一点注解，在里面我将说明有这种德行的好处，与此相反的恶行的害处。我想我的书名应该叫《道德的艺术》，因为它将说明得到美德的方法和态度，这将和仅限于劝人为善的书大有分别，那些书是不教导和说明为善的方法的，只是像口头施恩的信徒，对受冻挨饿的人不说怎样或在哪里可以得到衣服或粮食，却告诫他们必得吃饭和穿衣（《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15、16节）。

不过我写作和刊行这个注解的志愿绝没有达到过。确实地，我时时写下这种感觉、理由等的短短摘录，以备他日之用，有些东西仍在我旁边，但是在我早年时需要严密地关注我的个人事业，而以后又从事公众事务，使我延搁至今。因为，它在我的脑中是与需要一个人的全副精力去实行的庞大计划相连的，却有一连串不能预料的事情使我不能从事它，至今还留在那里没有完成。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解释并强调这个学说，那种不良的行为不是因为它们被禁而有害，而是因为它们有害而加以禁止，单以人的本质而论，那么人人的兴趣都是有美德的，他们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快乐，

而我将从这个环境中，企图说服青年，说没有一种品质能够像正直忠厚那样使一个穷人致富。

我的德行表起先只包含12项，但是一位教友会的朋友亲切地告诉我，说我大概看来是骄傲的，而我的骄傲常常在谈话中流露。当我讨论问题时，如果我是对的，我不是以谦逊的态度来讨论，而是又自大又傲慢，对于这点他提出几个例证来劝服我。我决定尽力想法自行治疗这种恶德行，所以我把“谦逊”加入我的表中，而给此字以广义。

我不敢自夸我已获得这种德行的实质，但是关于这种德行的外表方面，我却有了很多改进。我制止一切对于别人的意见当面抢白的反驳，也不作盛气凌人的正面肯定的论断。甚至我按照我们俱乐部的老规矩，禁止自己在言辞中遽下断语，例如不用“确定的”、“无疑的”等词，而采用“我猜想”、“我揣测”或“我猜度某事是如此如此”，或用“在现在，这件事据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肯定某种事情，而我以为错误时，我自己制止以粗暴的方式攻击他或立即表示对于他的建议认为可笑，而只回答他：据我的观察，在某种情形与环境中，他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据我看来（或我以为好像）有点不同，等。我立即感受到我的态度转变的利益，我所参加的谈话进行得都很愉快。这种有礼貌的方法在我提建议意见时使他们易于赞成而反对减少，当我讲得错误时也可减少耻辱，而当我恰是讲得对时也更易于使人抛弃他们的错误而和我一致。

这个方法，起初运用时是违反自然倾向的，到了后来就变得那么容易，也成为我的习惯了。经过50年之久，没有人曾听得一句独断的表示从我的口中冲出。至于这种习惯（及我正直的品格），当我有新的建议或去旧更新时，公民们都很看重我的主张，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原因。因此，当我成为议员时在议会里有很大的影响。我不长于演

讲，发言不流利，措辞也常有错误，言语上不尽正确，但是人们仍能曲谅。

其实，我们各种习气中再没有一种像克服骄傲那么难的了。虽极力藏匿它，克服它，消灭它，但无论如何，它在不知不觉之间，仍旧显露。你将常在这本书中看到，我是自以为完全克服了骄矜习气的，但是我恐怕又以我的谦逊而自骄了。

第3部 续传

我的政治观

上述之大计划，我似乎该在这里谈一谈那个计划和它的目的。我最初的感想都可在下面这张小纸中看到，这是偶然保存的：

读史短评

世界的大事情，如战争、革命等，都为政党所造成并受它的影响。

这些政党的观点，是代表他们的眼前利益，或是他们借以达到这种利益的条件。

不同的政党，观点亦不相同，一切的混乱由此产生。

当一个政党制定它的政纲时，每一个人在观点上都有他的私人利益。

等到政党达到它的公共目的，每一个政党成员为了个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抵触，以致这个政党破裂，而造成更多的混乱。

凡公共团体所做的事业，很少是纯粹为国家谋利的，不过他们都假借名义相号召。即使他们所做的真的为国家造福，但是这些人最初的思想还是以他们自己的和国家的利益联结起来，而不是由于一种尽忠为国的热忱而做此事。

至于在公共事业中为了人类福利而做的就更少了。

据我看来，现在很需要成立一个道德联合会，联合世界各国有道德的与善良的人们结成一个有规律的团体，用适当的善良和贤明的规章来管理。善良与贤明的人们显然会同心一致地服从这个规章，胜过普通人服从法律。

我现在想，如果有人试行此事而得到适当的效果，都是得到上帝的保佑，而能有所成功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1731年5月19日在图书馆

我的宗教信仰

我决定在我环境稍顺，且得闲暇时，即实行生平的志愿，把我的思想写出来。然而当日所有的记述，多数是遗失了。但是我找到一篇关于宗教的议论，我以为它含有各种著名宗教的精义，而未掺入它们的见解，所以对于无论信奉哪一种宗教的人都不致有相冲突之点。这些议论是：

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万物。

上帝以其天命治理世界。

人类应该以崇拜、祷告和感谢来尊奉上帝。

对人行善，为人类对上帝唯一的服务。

灵魂是不灭的。

上帝必惩恶褒善，或在现在，或在以后。

在那个时候，我的意见是，那个教派开始必须只在青年和单身汉中间首先传播。入会的每一个人不只宣布承认这样的教义，还必须实行13星期的道德考查和实验，如上述之例。此教初传时，因为要防止不适当的人申请加入，所以必须严守秘密，直到为社会重视之后。但是那些会员，每一个都在他们认识的人中间慎重找寻坦率而好心的青年，使这个计划在他们中间慢慢地传播。凡是会员必须济困扶危，扶助他人，以促进别人的利益、事业和上进，清楚这一点，也可定名为“自由安逸社”。所谓自由，因为道德的一般实践养成习惯，已能自由恶德之外，尤其是以勤勉和节俭的习惯，而免于负债，因为负债使人受到拘束和奴役。

关于这个计划，这就是我现在所能回想起来的。其时得两个青年同志参与其事，他们热心采用我的计划。但是我那时境况贫穷，所以必须专心致力于我的事业，使我在那时候延搁了进一步实行这个计划，而我的公私事务又使我继续延搁它，所以这个计划直到我已没有充足的精力或充足的能力去做这样一种事业时也就丢开了。虽然我仍以为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并且一定是很有用的，能够造就许多优良的公民。并且我也不以这个事业看起来很大而沮丧，因为我常常想，一个有相当能力的人，就可以作出巨大的改革，能在人类中间完成伟大的事业，如果他先制订一个好计划，舍弃一切的娱乐和足以分扰他注意力的别的事务，专心致志地去执行那个计划。

《穷理查年鉴》

在1732年，我第一次刊行我的历书，署名为理查·桑德斯，这本书我继续刊行了大约25年，通常称之为《穷理查年鉴》。我把这本书做得既有趣，又实用，因此书的销路日增，我也获得很大的利益，每年可行销将近1万本。凡本省的普通公众，莫不人手一册，我想如果以这本书做教导普通百姓的利器是再适当没有了，因为他们难得再买到别的书。于是我在历书中所有的一点空间都填以格言式的句子，主要的如教人勤劳节俭，这是致富的方法，并且是道德的保证。一个人在挨冻受饿之中，更难于做事始终忠实，因此历书中就有一条格言：“空无一物的袋子是难以站得笔直的。”

这些格言包含着古今中外的智慧，我收集起来，编为一集，印在1757年的历书的前面，像一位聪明的老人对人们大声演讲。把这些分散的忠告集中在一起，使它们更能令人深思。这个作品为世界所嘉纳，美洲各报竞相转录；英国用大纸单页翻印，以便挂在屋子里；在法国有两种译本，大多数的教士和绅士都买了它，送给他们教区里贫苦的居民和佃户；在宾夕法尼亚，由于我的这本书劝阻无用的外国奢侈品的消费，因此，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对于本州财富的增加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它出版以后几年就看得出来了。

编报心得

我也想把我的报纸作为另一种教育公众的工具，根据这种观点，我常常在报上转录《旁观者》的精华，以及其他道德著作家的论文，有时刊载我自著的短篇作品，这是从前在我们的俱乐部中讨论而写成的。这些文章中有苏格拉底式的谈话，证明一个人在道德上有不完美处，无论他的才学如何，绝不能正式称他为有识见的人。又有一篇讲克己的论文，说明为善不仅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也要使恶念不得发于心中。这些文章也许可以在1735年年初的报上找到。

关于办报纸，我谨慎地排除一切诽谤和攻击个人的行为。有时人家请我插入这类诽谤和攻击个人的东西，如有些作者们托词出版自由，要求刊载，他们以为报纸就像一辆受雇的马车，只要有人出了钱就有权利叫它到任何一处去，但我的答复是，我可以把这个作品单独地印出来，如果你愿意的话，而且作者要印多少份就印多少份，但是一概由作者自己署名，我不能承担传播他诽谤的责任。并且，我也曾和客户相约，供给他们的东西不是有用的，就是有趣味的，不应以私人的争吵充塞全篇，否则对待他们就不公道了。现在许多报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们毫不迟疑地去满足个人的恶意，对于好人反加以攻击，或者挑拨离间，甚至因此发生口角。此外，或是毫不慎重地印上对于邻邦政府无礼的非难，甚至以这种行为对待我们最好的盟国，这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我提及的这些话是对青年印刷家的警告，希望他们不要以这种不名誉之事去败坏他们的出版物和玷污他们的职业，只要他们坚定地拒绝这些，如他们所看到的我的榜样，这种举动完全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1733年，我派我的一个工人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去，那里正需要一个印刷所。我供给他一架印刷机和许多铅字，订立一个合伙合

同，约定这个买卖的利润我得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做印刷所的开销。他是个有学问又诚实的人，但是不懂得记账的事情。虽然他常常汇钱给我，我从他那里却得不到账单。在他生前，我们的合伙没有任何满意的情况。他去世后，这个买卖由他的妻子继续经营。她出生于荷兰，并在那儿受教，如我所知，在荷兰，记账知识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仅送给我她所能找到的以前的营业清单，并且以后每季送给我一份井井有条的和准确的账单。她很成功地经营这个买卖，她不仅把她的孩子教养成人，并且到期限届满时，她还能把我的印刷所买下来，使她的儿子独自经营。

我之所以提及这件事，就是要证明我们的青年女子也应该受教育，因为这对于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如果是寡妇），远比跳舞和音乐有用得多，可以保障她们不致为奸猾的人所引诱而丧失财产，可以使她们有经商的能力，能继续经营可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成人，适合担任这种工作，到后来还发家致富。

汉姆菲尔牧师

约在1734年，有一个长老会派一个青年牧师从爱尔兰到我们那里来，他的名字叫汉姆菲尔。他演说的声音很好听，并且可以即席演讲，谈话尤其精妙，他把各种宗派的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在一起，他们一致赞美他。我也是其中一个经常听讲的人，他的说教我很喜欢，因为他所说的关于教理的一类话很少，只是有力地详述道德的实践，或是在宗教的说法上究竟什么才称为好事。一班自以为是真正长老会教徒的人，却不赞成他的教义，这些人为许多老派牧师所勾结，在宗教会议前控告他为异端，要剥夺他的传道权。我成为他的热心信徒，尽力组织了一个会来帮助他，我们为他斗争，希望得到成功。于是在这时候发生笔战，然而这位青年牧师虽长于演讲，却拙于笔墨，是个很蹩脚的作者。我替他作了几篇论文，还有一篇刊载在1735年4月的公报中。那些论文大抵都是争辩的作品，虽然在那时候风行一时，但是在今天就不时髦了，我怀疑现在是否还有孤本存在。

正在争论中，一件不幸的事故极大地损害了这位青年牧师的事业。我们的敌人中的一个，正在听这位牧师传播很受人赞誉的教义，他想起以前他在什么地方读过这一篇说教，至少有部分是读过的。他找寻了一会儿，终于发现这位牧师的演讲部分节录自《英国评论》上所载的福斯特博士的一篇论文。这件事发生以后，使我们会内的许多人都厌恶他，从此就舍弃了他，而造成我们在宗教会议中迅速败下阵来。无论如何，我还是被他所吸引，因为我与其听虽是自己做的却很差的说教，宁可赞成他抄袭别人的好的说教，前者却是我们普通牧师的一般情况。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所讲的没有一篇是他自己的。又说，他的记忆力是那样的好，任何说教只要看过一遍就能背诵了。我们在宗教会议上败阵之后，他也就离开我们去另找好运气了。我也脱

离了这个礼拜会，以后再也不加入，虽然我有好多年还继续付出补助教会的捐款。

苦学多种外语

我在1733年年初学习外国语，不久就把法文学得很好，能够顺利地阅读法文书。我于是再学意大利文。有一位朋友，他也在学意大利文，常常引我和他下棋。我觉得这耗费我省下来学习的时间太多了，最后就拒绝和他再下棋，除非在一种条件之下，就是那一局的胜利者应该有权督课，或是文法部分，或是翻译等，在下一次我们会见时执行这一督课的权利。因为我们的棋下得差不多平手，于是我们互相督责以学习那种语言。后来我稍微费心一点去学西班牙文，也能直接读他们的书。

我曾提起过，我在拉丁学校里只受过一年的教育，那时年纪还很轻，后来我完全把那种语言抛弃了。但是，当我能认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文字时，我惊愕地发觉，再看拉丁经典竟知道得那么多，殊出于我意料之外。这件事鼓励我重新研习拉丁文，而我也得到很大的成功，因为那些起先所学的语言已为我铺平了道路。

从这些情形看来，我想到我们教授外国语的一般方法有点不合理。人家告诉我们说，应该先学拉丁文，等学好了那一种，再去学由拉丁文派生而来的现代语言，要容易得多。但是我们还不曾从希腊文开始学，按照那样的次序去学拉丁文要来得更容易。这是真的，如果你能够爬上一个梯子的顶端而不用梯级，那你下来也就更容易了。但是，如果你从楼梯最低一级上台阶，你将更舒适地爬到顶上。我请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人加以考虑，是否以前先学拉丁文的人费了几年时间以后，还是不能熟练或者跟没有学一样，他们所学的东西大抵成为无用的，那么他们的时间也白白地丢掉了，那么先学法文，进而升到意大利文等，不是要好一点吗？因为虽然后来费去的时间相等，而他们也许不再学外国语，也不曾达到拉丁一级，他们毕竟也学到另外的

一两种语言了，那些语言都是现代应用的，必可在日常生活中为他服务。

回到波士顿

离开波士顿10年以后，同时我的事业也很顺利，我很想旅行到波士顿去拜望我的亲友，而这是我前一些时候的经济力量都办不到的。回来时，我到纽卡斯尔去看望我的哥哥，他那时在那里落户并开着一个印刷所。我们以前的不和都忘掉了，我们的会面是很亲切的。他的身体已日见衰弱了，他说如果他死了（他认为他的死期不远了），请我把他现在只有10岁的儿子带到家里，把他教育成人，仍教他学印刷生意。这句话我依照他的意思做了，在我教他学印刷以前，让他在学校里读了几年书。他的母亲在他长成以前一直继续做印刷业。当他长成时我赠送他一套新的印刷铅字，因为他父亲留下的那套已经有些磨损了。又因为我很早地离开了他，以此我丰厚地补报了他。

在1736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4岁的很好看的孩子，得的病是天花。我悲痛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还懊悔没给他种痘。我之所以提及这件事，是为了告诉很可能忽略这件事的父母们。我认为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自己，如果他们的一个孩子死于天花。我的例子所表现的这种懊悔也许会同样地发生，所以应该采取安全的办法。

读书俱乐部壮大

我们的俱乐部成立以后，对于会员大有利益。因此有些人很愿意介绍他们的朋友入会，但是我们俱乐部规定了一个适当的数目，12个，这样就会超过这个限额。我们起先之所以定出这条规则，是为了要把这件事保守秘密（这件事会员都很好地遵守了），其目的是避免不合适的人申请入会，因为其中也许有某些人我们会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增加新会员者中的一个，这样我写了一个建议书，说每一个会员可分别组织一个支会，同样用本会的讨论规则等，但不必宣布与本会的关系。这个建议的好处是，可由我们造就许许多多的青年公民。又因为我们的会员可以向他的支会提议讨论我们希望提出的问题，并且回来向俱乐部报告他们支会的讨论经过，我们就可以在特殊时机更好地了解居民的情绪，这样也可以由于更广泛的推荐而增进我们业务上的特殊利益，可以增进我们在社会问题上的影响力，最后，由于把俱乐部的精神通过支会而推广，我们就能增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的力量。

这个建议被赞成了，于是每一个会员都着手去组织他的俱乐部，但是他们没有都成功，只组成五六个而已。这五六个俱乐部是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的，如葡萄、联合、团体等。它们的成立对自己会员们是极有益的，并且除了回答我们关于在某种时机上影响公众意见的观点以外，还供给了我们许多娱乐、消息和教训，至于这些回答我将要在讲到这些事件的发生时再讲出几个例子来。

初入政坛

我的第一次升迁是在1736年被选为议会的秘书。那一年的被选并无反对者，但是下一年，当时我又被提出（这个推选像议员一样，每年改选一次），一位新议员发表了一大篇反对我的演说，以帮助别的候选人。我最终还是当选了，这个位置我甚为合意，因为除掉有秘书的薪给以外，这个位置使我与各议都有密切的联系，保证我承印选举票、法典、纸币和公家需用的其他临时性的印件，总之，这些都很获利。

于是我不愿意这位新议员反对我。他是一位有钱的又有学问的绅士，同时他的才干将来很可能使他在议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件事，确实的，后来竟说准了。我无论如何不愿以奴颜卑膝的方式获说他的欢心，但是，过了一些日子，我用别的方法取得了。我听说他的图书室中有一部少见的珍本书，便写一封短笺给他，说明我愿意读这本书，恳请他把这本书借给我几天。他立即送来了，我大约在一星期时间内又把这书还他，又写了一封短笺，表示对于他的好意十分感激。当我们下次在议会里见面时，他对我讲话了（他以前从不和我讲话），并且很有礼貌。从此以后，他显然地无论何时都愿帮我的忙，这样我们就成为好朋友，而我们的友谊继续着直到他去世。这又应验了我曾见过的一句老格言：“那个曾经帮助过你一次的人，将更乐于再帮助你，比之你帮助过的人还愿予你以帮助。”它表示明智地转移人家的感情，比愤怒、报复、不断地增进恶感，有更大的利益。

1737年，斯波上校（弗吉尼亚前总督和那时的总邮务长）不满意在费城他的代理人的举动，关于事务上的疏忽和账目上的不准确，遂将他免职，叫我继任。我欣然接受此职，知道这个位置是有很大大利益的。虽然薪俸少，却消息灵通，有益于改良我报纸的寄递，可增加订

户，刊登的广告也可同样地增加，所以它供给我一注很可观的收入。我的老竞争对手的报纸也相应地失败了，而我并不曾报复他以前做邮政局长时禁止我的报纸由邮差递送的旧恨，我已是很快意了。他因不留心账目而大为受害，所以我提及此事作为青年的教训，你要是被别人雇用做经理职务，你必须永远对付账目、寄汇银钱十分清楚、一丝不苟。在品行鉴定书上有遵奉这一行为准则的一条，对于谋求新职业和增进业务是最有力的推荐。

热心公益事业

我现在开始把我的思想稍微转向公众事业了，却是由很小的事情上开始的。第一件事情是城里的巡夜制度，我认为缺乏规矩。巡夜是由警察所管理，轮流巡夜。警察所先行预告许多家主，叫他们在夜间值班。那些被选的人总是不肯服役，每年出6先令就免了，这6先令算是雇工代为巡夜的钱。但是，实际上，这笔钱比雇人需要的钱要多得多，使得警察职务成为赚钱的行业，而这些警察，常常为贪图一点酒就雇用懒汉做巡夜人，而体面的户主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这些警察多不巡行，而把夜间大部分时间消磨于醉酒之中。于是我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并在俱乐部里宣读，提出要改变这些不合理制度的现象，更特别着重指出不管居民的境况，都要付出6先令给警察是不平等的。如果一个寡妇为户主，她要受保护的全部财产也许不超过50英镑的价值，而所付的与库藏中有几千英镑货物的最有钱的商人一样多。

总之，我建议要有一个更精干的巡夜人，雇用的这个人经常要为这种事情服务，并且要用更公平的方法去征收经费，征税必得以财富为比例。这个意见，在俱乐部里被赞同了，还传播到别的俱乐部去，好像是各个俱乐部的意见。虽然这个计划不能立即执行，但是，它却准备了公众改革的思想，并为几年之后能通过这条法规铺好了一条路，那时我们各俱乐部的会员已有更大的势力了。

大约在这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最初在俱乐部宣读，后来刊行了），讲到各种事变和疏忽，由此而酿成火灾，要共同小心地制止它，还建议防止的方法。这篇文章大家都以为有用，遂制订一个计划，并且随即立即纠合许多同志，以在危险时互相帮助搬移和保护货物。不久成立了救火会，共计有30人。我们所订的合同规定每一个会员要常常遵守很好的秩序，并且另备合用的东西——一定数量的皮水

桶和坚固的口袋和篮子（为了装运货物），这些东西在每一次火灾时都得带来。我们同意每月集会一次，并且一起讨论和交换我们对于火灾原因的意见，并且在遇到火灾时，我们的行动如何才能更有效。

这个组织的效用立即显出来了，许多人都要加入，加入的人多出于一个团体适宜的数目以上。于是我们劝他们也照样另外组织一个，他们就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组织建立起来，直到他们的人数几乎包括有钱的大部分居民。现在，在我写自传时，虽然自成立至今已经50年了，而我首先组织的“联合救火会”仍旧存在并继续发展着，但是，原先的会员除我和另一个人以外都去世了，这一个人比我大1岁。会员在开月会时缺席者要付一点小罚款，用以为每个救火会置办救火器具。因此我要问问世界上别的城市是否还有比这更好的防止火灾的办法。事实上，自从组织了救火会以后，费城从没有因火灾而被毁的房屋一次超过两所以上的，而其火焰常在起火的屋子半毁之前就已被扑灭了。

怀特菲尔德牧师

1739年，一位可敬的游行布道牧师怀特菲尔德从爱尔兰到我们这儿来，颇受人注意。起先，他被允许在我们的几个教堂内传道，但是这些教士不高兴他来，立即拒绝他登台传道，于是，他只好在野外传道。所有宗派和教派的教徒听他说教的人数很多，我也是听众之一，观察到他的演说对于听众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慑服力，而且他们又是怎样地赞美他，敬重他，不管他们对他们如何斥责，并说他们天生是“半兽半魔鬼的东西”。可以看出我们居民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这是很奇怪的。从前对于宗教毫不关心，视为无足轻重，现在看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宗教化了，所以如果有人在黄昏时行经城市，总能听到每一条街上的各个家庭在唱赞美诗。

因为气候不良，在野外集会总觉得不大适宜，于是没有多久就有人建议建造一个会场，于是指派筹款的人员，而充足的款项立即筹到足以购地造屋的数目。屋子是100尺长，70尺宽，样式仿威斯敏斯特教堂。由于人们以充沛的精力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提前完工了。房屋和地基委托给一个保管委员会，任何教派的牧师如果愿意向费城民众布道，就可用这所会场，建造的目的不是专为某一个宗派的便利，而是为普遍的居民的便利，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传布伊斯兰教，他也可登台演讲。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以后，他沿路传道经过诸殖民地而到佐治亚州，这一州的移民还是新近开始的，唯一适合于这样一种事业的人该是勤劳耐苦、习于工作的民众，但是这种民众没有，到那里的却是一些亏本的店主，有许多懒惰、游荡习性，不能偿还债款的破产的人，他们才由牢狱中放出来，他们是不配去做开垦工作的，并且不能忍耐新殖民地的艰苦，许多人死掉了，留下许多无人供养的孩子。他们的

悲惨境遇引发了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仁心，他决意在那里建立一所孤儿院，使他们可以受抚养和教育。于是他掉头向北回来，宣传这一种施救办法，因为他的口才激动了听众，人们慷慨解囊，就募集了一宗巨款，我自己就是一个受他感动的例证。

我不赞成他的计划，因为那时佐治亚州缺乏材料和工人，而他的建议是以很大的费用将其从费城运到佐治亚州去建立孤儿院。我以为，如果在费城建筑，再把这些孤儿带来要好一点。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但是他执于他原来的计划，不听我的忠告，于是我拒绝捐款。没有多久，我碰巧有一次出席他的说教，我猜得到他要以集款而收场，我暗自决定他从我这里必是一无所获。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元，三四个银元和五个金币。在他继续讲下去时，我开始软化了，就决定把铜元给他。后来他的演说感动了我，使我羞愧了，就决定把银元给他，而他的结尾又是那样的可赞美，等到收款者持捐款盘来时，我倾囊付与。在这一次说教中，还有一个我们俱乐部的人在听，他关于在佐治亚州建造孤儿院的意见也和我一样，他早料及这一次必要捐款，所以他在从家里来的时候预先把口袋倒空。在演讲完了时，他还是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他付钱，就向站在他旁边的邻居借些钱来捐。这个请求很不幸，也许那人是听众之间唯一不被这位传道师所感动的人。那人的回答是：“好友霍普森先生，无论何时我都愿慷慨地借钱给你，但是现在却不能，因为你似乎有点昏迷了，我觉得现在捐钱毫无道理。”

有几个怀特菲尔德的仇人恶意地疑心他会把这些钱用作他自己的个人挥霍，但是我和他是关系很密切的老相识（他的讲演录和记事册等是叫我们印的），对于他的忠诚毫无怀疑，并且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据他的一切举动，他是一个完全诚实的人。我们并无宗教上的关系，所以我想我的有利于他的保证该有更大的价值。确实的，他有时为我

祈祷，希望我皈依，但是他的祈祷从不曾得到答复，我仍独行其是。我们只是普通的交谊，双方均以诚恳相待，直到他去世。

下面的例证多少可以表明我们交谊的立场。有一次他从英格兰到波士顿来，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即到费城来，但是他不知道在这里他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已知道的他的老朋友和房东贝内泽已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的住处的。如果你不以它的简陋而见弃，那么我诚心地欢迎你。”他回复说，如果我为了基督的缘故而为此义举，我将受到上帝的恩宠。我又回他：“不要误会我，这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只是为了你。”我们的一位朋友听到这件事很滑稽地说，他知道这是这些教中圣人的习惯，当他受到任何好的接待时，便把理该负担的担子从他自己的肩上搬开，而归之于上天，而我却想把它放在地上。

最后一次我看见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那时他和我商议关于他的孤儿院的事，他的意思是想把它改办为专门学校。

他有响亮而清楚的嗓子，并且发音准确，一丝不苟，所以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到并理解他的意思，尤其是他的听众无论怎样多，总是肃静地注意听讲。有一天黄昏，他在法院石阶上传道，法院是在市场街的中间，第二街的西侧，两条街都很远地站满了他的听众。那时，我站在市场街的最后面，好奇地想知道他的声音能够传到多远，就沿路向河而退，直到我走近前街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后来，因为那条街上人声嘈杂，才把他的声音淹没了。当时，假设是个半圆，我与他的距离就是半圆的半径，半圆之中都站满了听众，每一个听众大约占2平方尺，我推算起来，大概有3万以上的人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演讲。这使我相信报纸上说他在野外曾向25000人传道的记载和古代历史上的大将向全体军队训话一样，这种事我以前是不相信的。

因为我时常听他布道，渐渐就能很容易地区分他新的演讲和那些在他旅行时的演讲的不同了。因为常常复讲的缘故，所以他的旅行演讲是那样有进步，每一个重音、每一个重字、每一个声调的抑扬是那样完美地配置，即使人家对于他的题目毫无兴趣也不能不乐于听讲。它使人愉快，正如听一首名家的乐曲一样。这是游行传道师所具有的一种优点，足以超过常驻牧师，因为后者不能以复讲的形式使他的演讲有所改进。

他的写作和印刷品常常给予他的仇人可乘之机，因为这些东西常有不小心的措辞甚至错误的意见。如果在传道时讲出，能够随后解释，或再以别的话相辅而使其意义适当，或者干脆取消这些话，但是落了笔墨便不能了。批评界猛烈地攻击他的写作，为此他的信徒人数减少而再不见增加了，所以我想如果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他死后必将留下人数更多和更重要的教派，而他的声誉也必将日渐增长，因为他并没有作品可以作为责骂的根据，他的皈依者也可自由地尽其热忱赞颂他，认为他是一个多方面的杰出人物。

事业取得成功

我的印刷业务现在不断扩大，我的环境也一天天地变好了，我办的报纸也很赚钱，因为这时本州和邻州差不多只有这一种报。我更体验到这句成语的道理：“能得到100英镑以后，就更容易得到第二个100英镑了。”钱本身是具有再生的本质的。

在卡罗来纳州的合伙得到成功后，我于是被鼓励着再去做别的合伙，遂拔擢好脾气的工人，在各个州里和他们合伙开设印刷所，条件和卡罗来纳的一样。他们大多数做得很好，能在6年的期限届满时向我购置铅字而单独经营，因为这个方法，有几个家庭都发家致富了。有许多合伙往往以口角而终，但是我却以快乐而终，我的合伙都能和睦地进行至终。我想，我有许多预见，我们的合同上很明白地订明双方该做的或预期的东西，所以并无可以争论的地方。于是我将这种先见介绍给所有将和人合伙的人。因为即使是可敬的合伙，或在当时双方互相信赖合约，但如果在工作的照管和负担等上有不平等的观念，那么就会产生妒忌和憎恶，常常弄到友谊和合伙破裂，也许还要涉讼或发生别的不如意的事情。

我有许多理由使我乐于在宾夕法尼亚立业。但那里却有两件使我感到遗憾的事：一是没有防御的设备；二是没有青年的完备教育，没有军备，没有任何专门学院。于是在1743年，我写了一篇开办学院的建议书。正在此时，想到那位可敬的彼得斯先生恰好正失业，他是一位监督这样一个社会建设的合适人物，我把这个计划和他商议，不料他认为替业主服务更有利，所以谢绝担任此事。而在此时，我不知道有另外的人适宜于这样的委托，就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起来。在下一年，即1744年，我建议开办一个哲学会，这件事得到了成功。我为这个目的所写的文章，在收集全集时仍可在我的著作中找到。

至于讲到防卫的事，西班牙有好几年和英国进行战争，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并站在西班牙一边，这件事使我们处在十分危险的状态中。而我们的总督托马斯竭力不断地企图说服教友会手里的议会通过一个军备案和以保障我州的其他条款，但结果终归失败。我决定试图使民众自组团体，以资保障。为提倡这件事，我先写印一本小册子，名称是《明显的事实》，在书中着重地说明我们的无防卫地位，需要团结和训练，以作自卫，且拟定在数日内组织一个团体，请大家为这个目的而签名。这本小册子产生了迅速和惊人的效果。他们请我发起组织大会，我又和几个朋友拟定草案，我指定在上述的大会堂里召开市民大会。大厅里挤满了民众，我们预备了许多印刷好的志愿书，又准备了笔和墨水分给到会的人。我们先把主题向他们高声宣读，又解释了一遍，于是分发印刷品，他们很热心地在上面签名，并无反对。

散会时，把志愿书收集起来，签名者约有1200人以上。另外还有分发到各乡的印刷品，后来计算签名的达到万人以上。他们立即自备军械，编成许多中队与大队，选举他们自己的长官，每星期集会一次，实行执枪训练和别的军事训练。妇女们也捐助丝绸旗帜赠与团部，上面画着不同的标记，还写着口号，这都是我拟定的。

各队长官开了会，组织费城联队，选我为他们的联队司令官。但我自己知道不适合，就谢绝了这个职务，并推荐劳伦斯先生，因为他是个名流，威望很高，所以就被指定为司令官了。我建议发行彩票，以支付在城下建筑炮台和置备大炮的费用。彩票行销很快，同时炮台也不几日就落成，炮眼是用木料做框子，中间盛着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了些旧炮，可是还不够，我们又写信到英国去添办，同时请求我们的业主援助，然而并无多大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正在此时，劳伦斯上校、威廉·爱伦、艾布拉姆·泰勒和我自己都被派到纽约去，向克林顿总督借些炮来。他起先很坚决地拒绝我们，

但与诸官吏聚餐时，依据那里的习俗，喝了许多马德拉葡萄酒，他渐渐地软化了，说他可借给我们6尊。再请他饮几杯酒之后，他增加到10尊，到最后他很高兴地允许借18尊。这些都是精良的炮，能发射18磅的炮弹，而且还附以炮车，我们立即运回，并装置在炮台上。作战时，我们日夜在那里守卫，期间我也和普通的士兵一样按时地执行我的轮值义务。

我的筹划能力颇为总督和参事所赞许，凡有要事他们都和我商量，并和我商议每宗案件，同时，与他们的团结一致对联队也是有益的。为求得宗教界的帮助，我向他们建议宣布一个斋日，以祈福于上帝。他们接受了我这个提议，但是，在本州内这是第一次想到的斋日，这位秘书没有先例可援，无法起草通告。我在新英格兰受教育时，那里每年宣布斋戒，所以现在有用了，我用通常的格式草拟后，他们又把它译作德文，以两种文字刊行，公布全州。这件事使各派的教士有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教民加入联队，如果不是立即停战，那么除了教友会以外，其余各派显然还要普遍地加入。

教友会

我的朋友们心想我参与这些事情，将为教友会派所反对，而因此失掉我在本州议会里的地位，因为在那里教友会派占大多数。一位青年绅士，他也有几个朋友在议会里，希望取代我为他们的秘书，告诉我说议会已决定在下一次选举时不选我为秘书了。于是他以好意劝我告退，这样比被黜退休面一些。我对他的回答是，我曾读过或听到过从事公众事业的人所立的一条规矩，就是绝不营求一个职务，也绝不拒绝请他做的职务。我说：“我赞成他们的规矩，我将实行之，并且还要附加一点：我绝不营求，绝不拒绝，也绝不辞职。如果他们要将我的秘书职务委与另外一个人，他们很可以从我这里取去，但我不会拱手相让，假使我丢了这个职务，绝不放弃乘机回驳对手的机会。”此后我不再听到这类话了。在下一次选举时，我如平时一般毫无异议地又当选了。他们不喜欢我与州参事过从甚密，因为他们曾和总督争论过军备案，而议会为了此事曾很久地受到迫害。如果我自愿和他们少往来，教友会派议员是很乐意的，但是他们不能只为了我热心团练的缘故而罢免我，此外他们也不能找到别的理由。

确实的，我相信设立防卫团一事，他们中的无论何人不会不同意，只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罢了。而我觉得，出于我意料之外地，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明显地赞成防卫，只是反对侵略的战争。许多讨论这个问题的赞成或反对的小册子印出来了，有几本是优秀的教友会教徒著的，也赞成防卫，我相信该教的多数青年都是可以被说服的。

关于救火会里的一事，使我能够洞察到教友会教徒的志趣。为鼓励建筑炮台起见，曾有建议说我们应该用现存约有60英镑的钱买彩票，照我们的规矩，不待下届大会决议，不能移用此款项。这个会共

有30个会员，其中22个是教友会教徒，只有8个人是别的教派。我们八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想有几个教友会教徒和我们联合，我们显然也不能得到多数。只有一位教友会教徒詹姆士·莫里斯先生出面反对这个提案。他表示甚为遗憾，说会中竟有这样的议案，据他说教友会的教友都反对这件事，并且也许会造成冲突使救火会破裂。我们告诉他不至于到那种程度，我们是少数，那么如果教友反对这个提案，而票数比我们多，我们必得合于一切社会的习惯而服从多数，当讨论这事的时间到来时，就投票决定了。他说依规矩必得现在就做这件事，但是，他料定有许多会员颇想出席以反对此事，那样才算公正，准予稍迟一些时间，等他们出席再投票。

当我们在争论时，有一个侍者来，告诉我说有两位绅士在下面想和我谈话。我跑下去，见是两个我们的教友会教徒。他们告诉我有8个教友会教徒正在酒店里开会，必要时，他们决定来赞助我们，但他们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做到，希望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帮助，因为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个提案必定要和他们的长者和教友们发生纠纷。现在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可保有多数了，我就又跑上去，表面上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以后，表示同意延迟一小时。这件事莫里斯先生认为满意极了，但是他的投反对票的教友却一个也没出现，这使他大吃一惊。在延迟的时间终了时，我们以8对1通过此案。在那22个教友会教徒中，有8个是准备投票赞同我们的，还有13个，由于他们缺席，表示他们无意反对这个议案。我后来计算了一下，教友会教徒真正反对防卫的只是2比1。因为这些人都是那个教会的忠实会员，而且在他们中间都有很好的名声，对会议上提出的议案都相当关注。

有声誉又有学问的洛根先生，始终是属于那个教派的，他写了篇东西给他们，宣布他赞成防卫战，并且以许多有力的论证，来支持他的意见。他交给我60英镑要买彩票来建筑炮台，并嘱咐把抽到的奖全

部用在这件事上。他告诉我下面一段他的老主人威廉·佩恩关于防卫的逸事。他少年时和他的主人从英国渡海过来，做他的秘书。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他们的船被一艘军舰追逐，他们以为是一艘敌船。他们的船长准备抵抗，但是告诉威廉·佩恩和他的教友会同伴，说他不希望他们帮助，他们可以躲进舱里去。大家都进去了，只有詹姆士·洛根决定留在甲板上，而被派为看守一尊炮。这个假想敌已被证明是艘友船，所以并无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佩恩很严厉地责骂他，说他不该逗留在甲板上，又去帮助抵抗那艘军舰，违反教友会的教义，尤其是船长并没有要他去。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样的责备，惹恼了这位秘书，他回答说：“我是你的仆人，为什么你不命令我下来？但是当你觉得危险的时候，难道你不愿意我留在那里帮着打那艘军舰吗？”

我参加议会已有好多年了，议会中的大多数都是教友会教徒，使我常有机会看见他们在每一次英王下令要他们帮助筹谋军备时，由于自己的非战主义而受到窘迫。他们一方面不愿得罪政府，而绝对拒绝；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违反教义而得罪他们的教友。教友会的大多数人，于是就用种种遁辞来推脱，而当无法推脱时，又假装听从。通常的方法是最后在“为英王之用”一辞之下给予金钱，却从不问这笔钱是怎样用的。

但是，如果这个要求不是直接出自英王，那句话就觉得太不合适了，于是又发明一些别的办法。例如，当火药缺乏时（我想是路易斯堡守备队用的），新英格兰政府恳请从宾夕法尼亚发给一些，由总督托马斯向议会极力催促，但他们却不能给钱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一个要素。可是他们投票通过资助新英格兰3000英镑，把这笔钱交给总督，专用来购置面包、面粉、小麦，或别种粮食。枢密院有些人想给议会再增加困难，建议总督不要接受粮款，因为这不是他需要的

东西，但是他回答说：“我要拿这笔钱，因为我很明白他们的意思，所谓别种粮食就是火药。”结果他买了，而他们并没有反对。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暗示出这种情况，当我们担心在救火会里不能通过我们的提议购买彩票时，我曾对一位会员，我的朋友辛格先生说：“如果我们失败了，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置备火机。教友会不会反对，于是，你举荐我，我举荐你，做购置这个东西的委员，我们可以买一尊大炮，这也确实是火机呀。”他说：“我明白你在议会里这么久是进步了，你的提议正和他们的小麦和其他粮食是一样的。”

教友会遭到的困难是因为它已经建立和公布一种教义，认为“没有一种战争是合法的”，既经公布，他们即使想改变，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这种种困难使我想到了我们之间的另一个教派的谨慎行事了，那就是浸礼会派。在这一派刚出现时，我就和这派的一个首创人迈克尔·韦尔费厄相识。他抱怨地跟我说他们被别派的狂热教徒猛烈地诽谤，以可恶的教义和行为加在他们的身上，而这些东西与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我告诉他新教派往往有这种情形，要止住这样的诽谤，我以为公布他们的信条和他们的教规也许会好一点。他说，这已在教徒间提议过了，但是没有得到同意，理由是这样：“我们最初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教派的时候”，他说，“以上帝之惠使我们心思这样地明白，认识几条我们曾敬为真理者实是谬误，还有我们认为谬误的实是真理。他时时乐于以更远大的光明赐予我们，而我们的教义已有改进，我们的错误也已有减少。现在我不敢妄自以为我们达到了进步的终点，性灵神学知识已臻于完善。并且我们还怕，如果我们刊印我们的信条，我们自身被它束缚了，限制了，也许就不愿意再接受改进的办法，而我们的继承者将更有甚者，因为他们想他们的长老和创教者之所以这样做，会以为是神圣而不可违反的东西。”

这样谦逊的态度在教派中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例子，每一个别的教派都以为自身持有一切真理，而那些与它相异的都是错误。正像一个人在雾天旅行，在他前面的离他稍远的那些路上的人，他看起来都裹在雾中，在后面的和在两旁的田野里的人也都是一样，但是靠近他的东西都显得很清楚，虽然其实他也是同其他人一样身在雾中。为了避免这种困窘，教友会教徒近年来已渐渐对议会和政府的公务持冷淡态度，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背弃他们的教义。

发明新式火炉

如果照时间顺序，我该在前面就提起这件事，那是在1742年，我曾发明一种能使室中更温暖的火炉，而同时又节省燃料，因为新鲜空气进去时就能温暖。我制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個老朋友罗伯特·格累斯先生，他有一所熔铁厂，知道这种火炉渐渐需要，制造这种火炉用的铁板也可以赚钱。为提倡那种需求，我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新发明的宾夕法尼亚火炉的说明》，书中详细解释这种火炉的构造和效用，指出它超越各种样式暖室器的好处，并解答和消除反对使用这种火炉的意见。这本小册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马斯总督很喜欢书中所说的这种炉子的构造，他要给我几年的专利，但是我由于以下的主张而谢绝了：我们从别人的发明中享受了很大的利益，我们也应该乐于有机会以我们的任何一种发明为别人服务，而这种事我们应该自愿地慷慨地去做。

一个伦敦的铁商从我的小册子中窃取了许多方法，作为自己的铸造起来，又把机器稍改动一下，这种改动伤害了它的效用。但是据我所知他在那里却得到了专利奖，并以此发了一点小财。我的发明被别人拿去获得专利，不止这一个例子，但是常常没有达到同样的成功。这种事情我绝不去争，因为我不愿意以自己的专利而获利，并且憎恨吵闹。本州与邻州有许多的屋子都用这种火炉，给居民节省了大量的燃料。

开办学校

和约签订了，团练事务于是结束，我把我的心思转到设立公学的事务上了。第一步我先去集合热心公益的朋友草拟计划，这些人在我们的俱乐部里很多；第二步是写作和刊行一本小册子，名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之建议》，这本小册子我免费赠给当地名流，当猜想他们看了会动心时，我马上就开始募捐，作开办和维持一所公学之用。捐款可以在5年中每年付一部分，由于分批缴付，我猜想捐款的人可以更多。我相信，如果我记的不错，这笔钱算起来不下5000英镑。

我在这个建议的序言中，说明这个建议的创议人，不是我，而是几位具有公益精神的绅士。依据我的惯例，凡事有关公众的利益，应尽力避免在公众之前表现出自己是任何一种计划的发起人。

这些捐助人为了立即实行这个计划，在他们之中选出24个董事，又指定检察长弗朗西斯先生和我起草学校的行政规约。草订签字后，租了一所房屋，教师聘定，学校也就开学了。我想此事也是在1749年。

学生迅速增多，房屋很快觉得太小了，我们开始寻找一块适当的地基，想要建筑，而机缘凑巧，有一所大房屋早已建筑好了，只要稍加改动，就可以使用了。这所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听众所建筑的，我们以下述的方法得为己用。

应该注意的是，这座建筑的捐款人是属于各教派的人，而由派定的保管委员会保管，房屋和地基都委托给这个委员会，任何一个教派不能占优势，唯恐哪个占有优势将以此专供这一个教派使用，而违反原来的目的。于是这个保管委员会指定每个教派一人，就是：一个英格兰会教徒，一个长老会教徒，一个浸礼会教徒，一个摩拉维亚教

徒，等等。这些人如因死亡而缺额时，由捐款人中选举充任。这个摩拉维亚教徒恰巧他的同僚不喜欢他，当他死后，他们决定不再以那个教派的人充任。于是就发生困难，如何用新的选举方法避免一派有两个位置？

有几个人被提了出来，但是因为上述理由没有通过。终于有一个人提出我，说我是个诚实人，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个理由使他们来选任我。在建造房子时所具有的热情早已冷淡了，而保管委员会也不能募集新款来交付地租和清偿建造时所欠的一些别的债务，这使他们大为困窘。正在此时，我在这所房屋方面和学校方面都是委员会委员，有很好的机会和两方商议，使他们最后达成了协议。房屋保管委员会把这所房子转让给学校委员会，后者负责清偿债务，并保留这所房屋里的一间会堂，供牧师传教临时之用，因为依据原来建筑这所房屋的意思是如此的，同时又维持一所教导贫苦儿童的义务学校。协议依此订立，而学校的委员会因为负有还债的责任就掌握这所房屋的所有权了。我们把高大的会堂分为两层，上面下面分为好几间教室，作为课堂，又添购了一些地基，一切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很快弄好，这些学生就都搬进了这所房屋。凡是与工人订约、购置材料，监督工作的困难和该留意的事都落在我的身上，我很愉快地都担当起来。之所以没有妨碍我的私人事务，是因为在这一年以前我有了一位能干、勤劳和诚实的伙伴戴维·霍尔先生，他的性格我很了解，因为他已与我共事4年了。他把我照管印刷所的事务全部承担过去，按期付给我红利。我们两人顺利合作了18年之久。

这个学校的委员会，不久以后，由总督下令归州政府。学校的经费也由于英国的募集捐款和业主的捐助土地而有所增加，后来议会也增加了几次经费，这样就成立了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我继续为学校委员，自开办至今已近40年了，使我最愉快的是，看见青年在那里

受教育，学有所长，充任公职，对民有益，替他们的邦国增光，为自己扬名。

如上所述，当我不致力于私人事务时，我自幸我家仅属中产，却也很富足，我要以我的余年闲暇研究哲学，且求快乐了。

我购置了斯宾斯博士的一切仪器，他是从英国到这里来演讲的。我更以极大的欣喜着手进行电气实验，但是公众以为我是一个空闲的人了，就抓住我为他们办事。市政当局各个部门，差不多同时都让我担负一些责任，总督叫我办理治安之事；市民总会选我为参事会会员，不多时，我就被选为市参事；普通市民选我为代表他们的市邑议员，这个位置对我更为合适，因为我在议会中做过秘书，久已厌烦坐在那里听辩驳，而我又不能参与，在那里常常是这样地无聊，于是我常信笔乱涂，画些方形或圆圈，或任何一种避免疲倦的东西以自娱。我以为做了议员，一定会增加我做好事的权力。我毕竟不必隐讳，我的野心并不因这一切的升迁而自幸。我理应感到光荣，因为想到我的出身不高，升迁至此，已足以自慰。而更快乐的是竟有这样多的公众对我有好感，我的升迁，自己却完全没有去钻营。

我曾做过治安裁判所的裁判，出席于几个法庭，坐在凳上听着诉讼。但是觉得需要学习更多的民法学识，才能胜任，所以我就慢慢地托词不去了，说我该照顾议会里更重大的立法责任。我每年都被连选为议员，达10年之久，我从不请求任何一个选民投我的票，或直接间接地表示一点当选的愿望。当我在议会中取得一席时，我的儿子就被指定为议会的秘书。

次年，要和卡莱尔的印第安人订立条约，总督给议会来函，建议议会指定几个议员会同几个市参事会官员去做订立条约的专使。议会指定了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到卡莱尔去见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极好喝酒，喝了就醉，所以订约时他们很爱争吵又不守秩序。我们严格地制止卖酒给他们，当他们为了禁酒而出怨言时，我们说，如果他们能够在订约期间不喝酒，在事情完结之后我们可以给他们许多甜酒。他们答应了，并且也履行了这个诺言。于是这个条约很有秩序地缔结了，结果双方都满意。他们于是就要求甜酒，我们也就提供了。那是在当天下午，他们男女老少约有100人，住在城外建造成方形的临时草舍里。晚上，听到他们大声喧嚷，我们就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他们在广场中间点着庆祝的火堆，不管男女全都喝醉了，还争吵和打架。他们半裸着黑色的身体，在暗淡的火光中宛然可见，互相追逐，还挥舞着火炬，同时伴着他们可怕的呼喊，造成一种极像我们幻想中的地狱景象。这种骚动毫无平息之意，我们就回到寓所了。在半夜时，他们有一些人跑到我们的门前大声呼喊，还要甜酒，我们只好不理睬。

次日，他们觉得给我们那些扰乱不对，便派来三个年老的辨士向我们道歉。他们承认他们的过错，却归咎于酒，后来又企图为酒辩解，说：“上帝创造万物，使每一种东西都有某种用处，而任何一样东西用处既定，那么就总是应该用它。现在上帝造了甜酒，他就说：‘这东西是为了印第安人一醉的。’所以我们就得照做。”的确，如果上帝有意要灭绝这些野蛮人来给地球上的文明人留出地方的话，那么似乎很明显甜酒就是指定的方法，它已把起先住在海滨一带的印第安人灭绝了。

募捐技巧

1751年，托马斯·邦德医生，我的一位好朋友，有意在费城设立一所医院（人们把这个很有益的计划的功劳归之于我，其实是他首倡的），为贫苦的病人治疗，无论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心和起劲地企图募捐，但是这个建议在美洲是从来未有的，起先人们不大了解，因此收效甚微。

后来他到我这里来说，他觉得凡是公益的事情，没有我参加是办不到的。他说：“我常被那些我想向他们捐款的人询问，‘这件事情你和富兰克林商量过吗？他认为如何？’而当我告诉他们说没有时（我以为这原是出于你的本务之外的），他们就不捐助，说他们要考虑一下。”我考问他的计划性质和可能的效果，得到了他很满意的解释，我非但自己捐助，并且热心地计划为他向别人劝募。不过在要募捐之前，我总是在报上用心写一点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给人一个精神上的准备。这是我在做这类事情时的习惯，但是这位医生却没有做这一件事。

自此以后，捐款者都很大方慷慨。但是不久就开始减少下来，我想如果没有议会的一些帮助，仅靠募捐是不够用的，于是我建议请求补助，这件事是做了。乡间议员起先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他们反对，说这只能为城市服务，所以应当完全由市民负担其费用，而他们也不知道市民本身是不是一般都赞成这个计划。我的主张却正相反，认为此事会受到赞许，无疑地我们能够募捐到2000英镑的自愿捐款。他们都认为我的估计过高，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此我想了个办法，由我提出一个意见书，依照申请人的要求，由政府捐助，其金额留一个空隙，以便他们的考虑，如果他不赞成就

可弃之不顾，我这样地写，把重要的条款拟定成内有一假定的条件，那就是：“此约为上述当事人所制定，如捐款人集会，可选其经理与会计，其捐款总额将达××镑（此款之年息专用于供给在该医院中之贫苦病人，凡饮食、看护、诊视及医药概不取费），此时，经议会议长认为对此股本看来很满意，则该议长签发命令，通知州金库，付款2000英镑，分两年拨给，交付该医院之会计，用以创办、建筑及装修该院之用。”

这一条件使这个议案通过了。因为这些曾经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知道依据此约可以不花钱而得到慈善的好名声，所以同意这个议案。在我们向民众募捐时，又竭力把议会的有条件的诺言作为一种新增的发动捐款的力量，因为每人的捐款都会是加倍的。这样，这一条款便起了两方面的作用。捐款就此立即超过了必需的数目，我们就请求并得到了公家的赠款，这就使我们能够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一所舒适而漂亮的建筑物很快地建成了，这个建筑由积久的经验已经看出它是很有用的，而且至今还是很好的。那时我曾用过些什么政治策略，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是当时对这事的成功感到很高兴，因而以后想起来，对于自己使过某些技巧手段，就更易于原谅自己了。

大约正在此时，另外一个倡议人，这位可敬的吉尔伯特·坦南特牧师到我这儿来，请我帮助他募捐建造一所新的教堂。这所屋子是用以为他所召集的长老会教徒们的集会，他们原先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我不愿意使自己因过多地要求市民捐助而受他们的厌憎，所以坚决地拒绝了。于是他要我供给他一张我从经验得知的慷慨而热心公益的人的名单。我认为他们既已当我恳求时好心地帮助过我，现在又把他們推给别的恳求者去受烦扰，这是很不适当的，所以我也拒绝给他这样一张表。他于是要求我至少给他一点忠告。我说：“那我很愿意。首先，我劝你先向一切你认为肯捐助一点东西的人去募集；其次，再向你不能确定他是否肯捐助的人去募集，并把已经捐款者的表给他们

看；最后，也不要疏忽了那些你确定其必不肯捐助的人，因为其中有几个你也许是猜错的。”他笑笑谢了我，并说他将实行我的忠告。他这样去做了，因为他恳求了每一个人，竟得到了超出预料的很大一笔款，他以此建成了这所耸立于拱门街的宏伟高雅的教堂。

关注市政建设

我们的城市，虽然表面整齐美观，街道宽而直并且相交叉为直角形，但因年久没有铺过，所以不大雅观，在阴湿天气时笨重车辆的车轮把街道碾为沼地，因此很难通行。而在干燥天气时则又灰尘飞扬。我住在靠近泽西街的地方，不安地看到这些居民购置食物时跋涉在泥泞之中。在市场的中心有一条狭长的地段，铺上了砖块，因此只要到了市场中间就有一块稳定的落脚之处，但是等人们到那里时常已是满靴的污泥了。我向人们呼吁，又写文章发表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得以在市场与砖地之间铺以石块，使它的两边都和房屋接近。有了这条路，使人容易到达市场而靴子不致被浸湿，但是其余的街道还没有铺，如果有车辆从泥泞里出来跑到这条路上，把它的泥摇下来留在路上，这条路也就立即罩满了泥，并且这些泥泞不易除去，因为城市里还没有清道夫呢。

访问数次之后，我找到一个贫苦而勤劳的人，他愿意来打扫这条小路，每周扫两次，把那些邻居门前的污秽搬走，由每户每月出6便士给他。我于是写印一张传单，说明邻居们以很少的费用就可得到好处。我们会由于房屋清洁而得到不少好处，因为这样多的污秽，不会被人家的脚带进屋里来了，而且店家又可得到增加顾客人数的好处等，因为顾客能更容易地到达他们店里去，而在刮风天，尘土也不会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我给每一家送一张传单，每隔一二日去跑一趟，看他们是否签字同意支付6便士，他们一致签了字，过了一些时候就很好地执行了。全城居民见市场周围的小路清洁，很是高兴，因为这件事让大家都觉得舒服，因此激起了要铺好一切街道的普遍愿望，同时使公众都愿意为达到这个修路的目的而缴纳税款。

过了些时候，我提出修铺全城街道的议案，交与议会。那时正是1757年我到英国之前，而直到我走后才通过，同时对于收税的方法又作了一种变更，这变更我以为不是改用了更好的方法，而只是在修路的同时为装路灯而增加经费，这件事是一种大改良。路灯装设是由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提倡的，他在自己的门口装了一盏灯，以示灯的效用的例子，于是居民第一次深印着使全城光明的观念。这项公益的荣誉也已归于我，其实它是属于这位先生的，我只是跟着他的例子做，仅仅关于灯的形状有过一点功劳而已。这种灯和我们起先从伦敦买来的球型灯不同。那种球型灯我觉得有几点不便利：它们的下面不通空气，于是烟不能从上面出去，只是在球里面转，停滞在里面，会妨碍灯供给光亮；除此之外，还有天天擦去烟灰的困难，而如果偶然打破了一个地方就等于毁坏了它，使全都没有用了。我于是提议用四块平玻璃做灯罩，上面置有长烟囱以引出烟气，下开小洞以流通空气，使烟气易于上升。用了这个方法，它们就可保持清洁，不致在数小时内像伦敦灯那样渐成昏暗，而能继续光亮直到早晨，就是偶然打撞一下，也大抵只是四块中打破一块，容易修补。

我有时觉得奇怪，沃克斯霍尔地方所用的球型灯的底下有一个有效的洞以保持清洁，为什么那些伦敦人不学着在他们的路灯上也开洞呢？但是那些圆灯的洞是为了别种目的而开的，就是以一小片麻挂下来穿过这些洞，使火焰更快地通到灯芯，至于别的用处，流通空气，似乎他们并不曾想到。所以，在点灯数小时后，伦敦街道就很暗了。

提起这些改良使我记起在伦敦时我向福瑟吉尔博士提议的一件事了。他是我所知道的顶好的人中的一个，又是公益计划的大提倡家。我曾观察这种街道，在晴时，从不扫除，从不把尘土搬走，于是就堆积起来，一到雨天就化为污泥，于是堆积几天之后，路上的污泥是那样的深，就不能穿过了，但是街旁的小路上却因穷人用扫帚扫除而保持清洁，这种扫除也很费力气，先把污秽耙在一起，再倒进上面敞开

着的车子，可是车子的旁边在路上每次颠簸就摇下一些污泥，有时还扰及走路的人。不扫除街道上的尘土的理由是怕这种尘土会飞进住户和店铺的窗里面去。

一件偶然的事情曾经教导我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做很多的扫除工作。一天早上，我在克莱文街我的门口发现一个穷苦的妇人，用一把桦木扫帚扫着我的门径。她面容苍白衰弱，好像一场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谁雇她来扫除了，她说：“没有人，但是我很穷，又在困苦中，所以我在上流人的门口扫地，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东西。”我叮嘱她扫干净全街，我可以给她1先令，这时是9点钟，到12点钟她来要钱了。起先我看她工作很慢，很难相信这个工作会做得那么快，就派我的仆人去考查了一下，他报告说街道全部打扫得极为清洁，一切尘土都放在街道中央的阴沟里，后来一场雨把它都冲走了，因此这条路甚至这条阴沟都完全清洁了。

我于是估量那件事，如果那个孱弱的妇人能够在3小时中扫除这一条街道，那么一个强壮敏捷的男子，以一半的时间就能够做好它。这件事又使我注意到，在这样一条狭道上，在中央设置一条阴沟以代替两面靠近人行道的两条沟，倒较为便利。因为在那里一切落在路上的雨水都会从边上流到中央，成为一个急流，足以冲走道上的一切污泥，但是当水分为两条时，那水势就常嫌过弱，不够清除两边，仅使灰尘着了水而化为污泥，因此车轮和马足把它抛溅到人行道上，使道上因此污秽泞滑，有时还溅到行路人的身上去。我就向这位贤明博士提出如下建议：

伦敦与威斯敏斯特的道路的扫除与保持清洁的更有效的方法，是应与几个守街人订约，在晴季时要把尘土扫除，而在雨季时耙去污泥，每人负责几条街与附近的小巷。为了工作方便，应供给他们扫帚

和别的清洁器具，分别放在固定地方保存，预备供给雇用贫民服务之需。

当夏季干燥时，要在店门与住户的窗户依习惯尚未开启之前，就把所有尘土扫除，并堆积在一定的距离之处，由清道夫以紧闭的车运走。

当耙集那种污泥时，不应任其堆积到再被车轮马蹄践散的地方，而清道夫所用车子的车身，不要高放在车轮之上，而应低放在滑盘上，身底有空格，空格之上应盖以稻草，把污泥抛在上面，可使水从这儿流出，如此则重量可减轻许多，因为水是污泥重量中最重的部分；车身应置于方便合适的地方，污泥用小车带走；大车则仍留在那里直待污泥滤净时，才用马拖走。

这个建议的最后一部分我早已疑心是否适当，因为有些街道狭窄，要把泥车放在不使街道太受挤的地方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仍持前面的意见，扫除尘土应在店家开门之前搬走。这在夏季是很容易实行的，因其时日长、天亮得早。我在早上7点钟走过河滨街和舰队街，看见那里没有一家店是开的，虽然早已天明，太阳已出了3小时以上了。伦敦的居民宁可多在烛光下生活着，而在日光下睡觉，却对于烛税和油价太高，常常口出怨言，真有点好笑。

有些人以为这些小事情不值得注意和讨论。而当他们想到虽然尘土在刮风天吹入一个人的眼睛，或刮进一家小店，是不大重要的，但是在人口多的城市里，经常重复着这类事情就不会觉得它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他们也就不会很严厉地责备那些对于似乎无关重要的事情费一点注意力的人了。人生幸福，不是由于很少碰到的大段好运气产生出来，而是由于天天有的小利益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教一个贫苦青年自己修面，并且好好保藏他的剃刀，这也许比你给他1000几尼还要使他快乐得多。钱也许一会儿就用完了，剩下的只是曾经愚蠢

地花费它的反悔，但是在另一种情形里，他免掉常要等候理发匠的麻烦和避免他们污秽的手指、难闻的气味和锈钝的剃刀。他可以拣最适宜的时间做，又可天天享受用好剃刀修面的快乐。综合这些感想，我甘冒不韪写了上面的几页，希望它们供给我所爱的城市以有用的提议，这个城市我已很快活地住过许多年了。而且美洲的某些市镇，也许同样可以适用我的提议。

我曾受美洲的总邮务长的委任做他的监察员，审查分局与巡查职员工作。他逝世于1753年，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两人受英国总邮务长之命继任。美洲的邮局从未交过钱给英国邮局。如果我们能够使邮局获利，那么在纯利润中每年提出600英镑给我们两人。要使其获利，就需要各种的改进。有些改进在起先难免要花钱的，所以在开头4年里，邮局欠我们的债在900英镑以上。但是不久之后，就偿还了我们，而在我为某狂妄大臣罢免之前，我们使本局缴给英王的纯利润要3倍于爱尔兰邮局。罢免的事情我将在后面讲到。而自从那个粗莽的更调后，他们从那里不曾收到一文钱了！

这一年这个邮局的事务使我到新英格兰旅行了一次，那里的剑桥大学主动地赠我以文学硕士学位。以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也曾给我以同样的宠遇。因此，以我之未曾在任何大学读过书，也可获此殊荣了。他们的赠与是因为我在自然哲学和电学方面曾有所改进和发明。

奥尔巴尼计划

1754年，又将与法兰西开战了。商部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推派代表集合在奥尔巴尼开会和美洲土著人六邦的酋长商议彼此的防卫方法。哈密尔顿总督接到了这个命令，通知议会，说请他们趁此时机预备合适的赠品送给印第安人，且推举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自己，偕同托马斯·佩恩先生和秘书彼得先生为代表宾夕法尼亚的委员。议会赞成这个推举，预备了赠品，虽然他们不太喜欢款待外省人，我们约在6月中旬和别的委员会于奥尔巴尼。

在路上，我拟订了一个计划，使各殖民地在一个政府之下联合，为了防卫和别的重要目的，这是很需要的。到我们经过纽约时，我在那里把我的计划拿给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他们两人都是对于公共事务很有认识的，受了他们赞许的鼓励后，我大胆地提交代表大会。这时又有几位委员也制成了同样的计划。联合会应否成立是应讨论的先决问题，这个问题结果全场一致通过予以成立。于是大会指定一个委员会，一个殖民地一人，审查这几个计划和报告。我的计划稍加修改，幸得采用，因此就报告大会。

照此计划，总政府应有一个总督治理，总督由英王任命，并予以相当的援助，还应有一个总参事会，由几个殖民地民众代表在他们自己的议会里开会选举。代表大会上天天争辩这个问题，与土著人协商防务相提并论。其间发生了许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是终于一切都克服了，这个计划全场一致同意。于是将议案送到商务大臣处，并分别告知各州的议会。但它的命运很不佳：议会不加采用，因为他们都以为这个计划太“集权”了，而在英国却估量着它太“民主”了。由于商务大臣不赞成，也就不呈请英王裁可。但是还是立了另外的一个计划，以为是解决这同一目的的更好办法，照此计划，各州的总督和几个他们

本州的市参事会会员应行集会、招募军队、建筑堡垒等，其费用由英国的金库拨给，这笔费用以后由英国议会通令向美洲征税偿还。我的计划连同计划的理由可在我已刊行的政治论文中找到。

这一年的冬季，我住在波士顿，对于这两个计划曾和总督雪利做过好几次的讨论。我们讨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在那些论文中见到。和我的计划持不同的和反对的理由，反使我认为那个计划倒是真正的折中办法。而我仍旧认为它可以使两方都满意，如果被采用的话。这些殖民地这样地联合起来可以有充足的力量以保卫他们自己，那么就可以不需要英国的军队，而其后向美洲征税以引起血战的事当然更可以避免了。不过这样的错误不是新近才有，历史上充满着国家和君主的错误多着呢：

环视全世界，能知己善者有几，

知而行之又有几。

那些治国的人，在他们的手上有许多的事情，大概不高兴把考虑和执行一个新计划的困难拉到自己身上。最好的国家大计于是就很少能有先见而采用，只是被时势所逼罢了。

宾夕法尼亚的总督，把我的计划提交议会，表示他对于这个计划极为赞成。据他看来，作者的判断非常精确有力，他以为的确值得他们严密郑重关注。其时我恰巧缺席，议会为几个人所把持，但就在这时讨论了，这件事我以为不公平，议会完全不加注意地就把它搁置一边，使我大为懊丧。

这一年我去波士顿旅行时，在纽约碰到我们的新总督莫里斯先生，他正从英国到达那里。我和他在以前就很熟识的。他奉命接替哈密尔顿先生，哈密尔顿因和英国大业主辩论，疲于奔命，就辞职了。

莫里斯先生问我是否以为他必将遇到行政上的困难。我说：“不！你也许倒可以和衷共济地处理行政，只是你留意不要和议会发生争论。”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如何能够忠告我避免争论呢？你知道我是喜欢争论的，争论是我最大的娱乐。无论如何，为感谢你对我的忠告，如果可能，我将尽力避免争论。”他有理由喜爱争论，他的口才很好，是一个敏捷的诡辩家，因此在辩论的谈话中他大概都能取胜。如我所闻，他在孩提时已深受争辩的教育了，他的父亲在饭后环坐桌旁时，使他的孩子们习惯于互相争论，以为消遣。但是我认为这种练习不大聪明，因为据我的观察所及，这些喜欢争辩的、反驳人的人，大概做起事来都不幸。他们有时得到胜利，但是他们决不能赢得好感，而好感将是对他们更为有用的。我们分手之后，他到费城，而我到波士顿。

在回来时，我在纽约看见一册本州的会议录。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兑现他对我的诺言，他和议会已经处在激烈的争论中了。在其任职期间，他与州议会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争斗不断。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有份的。因为当我参加议会之时，我立刻就被指定让每一个委员会来答复他的演说和咨文，并受各委员会之托进行起草工作。我们的复文和他的咨文一样常常都写得尖酸刻薄的，有时竟是粗鲁地咒骂。当他知道议会里的复文是我写的，人们通常会认为，当我们相遇时，将难免相互厮杀一场。但他却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以致我们两人间并未因争论而引起个人的嫌隙，而且我们常常一起吃饭。

一天下午，在激烈的公开争辩以后，我们在街上遇见了。他说：“富兰克林，你必须和我一起到我家去消磨这个晚上，我这里有几位你所喜欢的朋友。”说完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他家里。在晚饭之后的饮酒欢谈之中，他开玩笑地告诉我说，他很佩服桑乔·潘查的意见，当有人要把一个政府交给他时，他要求这个政府得是治理黑人的政府，这样，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民众意见一致时，他就可以卖掉他

们。坐在我身旁的他的一位朋友说：“富兰克林，为什么你还是帮助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徒？你卖掉他们不好吗？业主们会给你好价钱的。”我说：“这位总督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在他的一切咨文中，他总是拼命向议会的脸上涂抹黑色（意为诽谤），但是他们等到他一涂上去立即把这个颜色擦掉，反而很厚重地回涂到他自己的脸上。这样，等他知道自己仿佛就要被涂得像一个黑人的时候，就像哈密尔顿先生一样，倦于这种争论而离职了。

这些公开的争论其实都是发自业主——我们世袭的统治者。当为了本州的防卫而需要任何款项时，他们便以非常卑鄙的手段指令他们的代理人，不要通过一个征收必要租税的议案，除非这个议案规定他们的大片地产特别免税。他们甚至和代理人订约要这些人遵守这样的指令。议会3年以来都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做法，然而终于被迫屈服。继莫里斯任总督的丹尼上校，竟敢不遵守那些指令。那件事怎样发生的，我在后面再说明。

我的事情讲得太快了。在莫里斯总督执政时，还有一些事情该提起。

我们和法国已在交战状态中了，马萨诸塞州政府计划袭击克朗波因特（1755年），派昆西先生到宾夕法尼亚，派波纳尔先生（后来的波纳尔总督）到纽约，请求帮助。我既是在议会中，对议会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是昆西先生的同乡，他便请我予以照顾和协助。我把他的申请书向议会宣读，大家都同意了。他们票决资助1万英镑，用以置备粮食。但是这位总督拒绝同意这个议案（议案中还包含另外一笔钱供给英王使用），除非插入一项业主的产业免缴任何一部分必需的税的话。这个议会，虽然很愿意有效地帮助新英格兰，却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个志愿。昆西先生十分卖力地想得到总督的允诺，但他就是固执己见。

我于是提出一个不需总督过问也能办到这件事的法子，就是以证券向贷金管理处支钱，因为依据法律，议会有预支款项之权的。其实那时候贷金管理处只有很少的钱或者竟没有，于是我建议这种证券应在一年中收回，并负担5厘的利息。有了这种证券，我以为粮食就很容易购备了。议会毫不犹豫地赞成了这个建议。证券立即印了出来，我也是掌管签发证券的委员会中的一人。收回证券的经费是全省一切纸币贷款的利息和国产税的收入，这大家知道是很够用的了。这些证券立即得到信用，不但购买粮食还可以通用，就是手里有现款的许多有钱人，也投资于那些证券。他们觉得这是很有利的，因为证券在手，可取得利息，而一有急需又可像现钱般通用。因此他们都热心地购买，在几星期中证券便销售一空了。这件重要的事情就用了我的法子而完成了。昆西先生用一个漂亮的纪念物来答谢议会的帮助，使命完成后，他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从此以后同我结下了最忠诚与最亲切的友谊。

为布雷多克捐输

英国政府不赞成在奥尔巴尼所建议的殖民地联盟并且不愿以防卫之责委托那个联盟，恐怕他们过于强大而威胁到自己。当时英政府对各殖民地持疑忌态度，为此而派布雷多克将军率两联队英国常备军渡海而来，以为驻防。他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得里亚登岸，从这又开到马里兰的弗立得里克镇，在那里他停下来等待车辆。我们的议会风闻他对议会心存强烈的偏见，乃至不高兴从事防务，因此希望我去见他疏通一下，不是以议会代表名义，而是用邮务长的名义，假装为了与他商量他和某几州总督之间的紧急电文，这些电文的传递如何能做到最迅速而又稳妥，因为他和总督必须不断地通信。议会答应付给我这件使命的费用。这一次的旅行是我的儿子陪我去的。

我们在弗立得里克镇看到了这位将军，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差往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边陲地带征集车辆的人回来。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几天，天天和他一起吃饭，所以有充足的机会解除他的偏见，报告他议会在他没有到达之前本已预备协助他的军事行动，现在仍旧愿意这样做。当我正要辞别时这些征到的车辆回来了，带进来一看，一共算来只有25辆，又不是全部都能运用的。这位将军和所有的官员都很惊愕，于是宣告这次远征完了，不可能完成了。又哗然指责大臣们糊里糊涂地要他们在缺少运输工具的地方登陆，他们的军粮、行李等至少需要150辆车来运送呢。

我无意之间说，我想他们没有在宾夕法尼亚登岸是有点可惜，因为在那里乡间差不多每个农夫都有车的。这位将军紧紧地抓住我这句话，就说：“那么你，先生，在那里是一个有影响的人，可能为我们弄到车辆，我请求你担任这个职务。”我问他对于车主的报酬怎样，他们要我把我认为必需的报酬写在纸上。我写了张纸，他们都同意，于是

把委任状和通告令都立即准备好了。什么报酬都在我到达兰开斯特立即公布的通告上可以看到。从这张通告竟生出很大很快的效力看来，真是有点奇怪的一张通告，我将揭载如下：

通告

兹因英王陛下之军队拟集合于维尔斯克里克，但缺乏用以运输之车辆150辆，每辆须有四马者，以及鞍马或驮马1500匹。布雷多克将军麾下授权予我办理租马事项。是以通告，我将自本日至次星期三晚留于兰开斯特担任此事。下星期四晨至星期五晚当驻约克。于此两地我将与出租车辆马匹者立约，其条件如下：

（一）一车四良马及一御者，按日给予15先令；每一良马附以驮货鞍或其他马鞍及配备者，按日2先令；每一良马无鞍者，按日18便士。

（二）其租费应自车马与在维尔斯克里克之军队会合时开始计算。到达之期当在5月20日或以前，但赴维尔斯克里克及运输告终后之旅费可给予相当津贴。

（三）每一车一马及鞍件或驮货鞍应由物主及我所选定之公证人估定其价值；如在服役中车马有失去情况的，其价格依据所估定数给予赔偿。

（四）在订结契约时，车马主如有急需可由我先支給7日之赁费，其余在运输告终时或每当请求时，由布雷多克将军或军需官支付。

（五）凡御车者或饲马者无论何时决不命其负士卒之责任，或照顾车马以外之其他驱役。

（六）一切燕麦、玉米，或其他饲料为车马主所携入营中者，如于喂养马匹所需之外尚有余多者，由军中取用之，但亦付与相当之代价。

附条——我儿威廉·富兰克林亦有权与坎伯兰州之任何一人订立契约。

本杰明·富兰克林

兰开斯特

1755年4月26日

致兰开斯特、约克及坎伯兰诸州

居民书

朋友与同乡们：

偶然在弗立得里克的军营里住了几天，我觉得这位将军和军官们为了没有供给他们马匹和车辆，极为不满，他们希望在本州得到这种车马，因为本州是最有能力供给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总督和议会间的齟齬，钱是没有预备，也没有为此目的采取任何步骤。

有人建议派遣武装力量立即开进诸州，如其所需，把许多最好的车辆马匹硬抢去，且如其所需，强逼许多人去服役、驾驱和照管车马。

我忧虑英国军士经行诸州时真有这种情形，尤其忧虑他们现在的脾气和他们对于我们的愤懑，必将使居民大为不便，所以我很愿意不辞其劳，试以公平合理的办法解决此事。近来后部诸州的民众向议会诉说缺乏充足的现金，你们现在有机会去得到与分配一笔很可观的钱

了。因为如果这次的远征任务会继续下去，持续120天（也许还会更长），那么，这些车辆马匹的租费计算起来将超出3万英镑，这笔钱是用英王的金银币付给的。

这个工作是很轻便的，因为军队每天很少能行12英里以上。这种车辆和驮货的马匹所运载的东西都是军用的必需品，所以必得和大军同行，不会更快。并且为了军队的缘故，车辆马匹总是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无论在行军时或屯驻时。

如果你们如我所相信的那样，真正是英王陛下的忠良臣民，你们现在就该做这个很合意的服役，而且大可放心。如果有三四家不能从种植事务上单独抽出一车四马和一个车夫，那可以合起来做，一家供给车，另一家供给一两匹马，另一家供给车夫，而把租费在你们之间按比例分派。有这样好的租价和合理条件给你们，如果你们还不肯为你们的英王与国家服务，你们的忠心就大为可疑了。英王的事务是必得做的。这么多勇敢的军队远道来保卫你们，对合理地盼望你们做的事情不应畏缩不前。车马必得要出来的，否则会采取过激手段，那时你们就将自食其果，而且也许得不到什么可怜和关心了。

我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私利可图，除了努力做好事以外，只是尽我的责任。如果这个取得车马的办法做不到，在14日内我只好报告这位将军。我想这位骠骑将军约翰·圣克莱爵士会立即带一队士兵进州里来找车马，这是我不忍听到的，因为我是你们很诚恳、很忠实的朋友和同情者。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从这位将军处收到约800英镑钱，作为预先付给车主等人的租费。但是这个数目不够用，我就垫付了200英镑，在两星期中150辆车和259匹驾车的马都送往军营。通告言明，车马如有遗失则照价赔偿。

可是车马的主人说他们不认识布雷多克将军，他的诺言应有所保证，坚持要我做履行契约的担保，于是我照办了。

当时，我是在军营中，某日黄昏和邓巴上校联队的军官们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对这些部下很怜念。他说，他们一般都不富裕，在这个物价昂贵的地方，他们的财力不够置备一点东西，而且为了买东西需要长途跋涉，穿过荒野，那里却没有什可买。我也关怀他们的处境，就决定努力给他们设法找些慰劳的东西。不过我没有把我的心意告诉他们，只在第二天早上写了封信给议会的委员会，因为那里有些公款由他们管理，我热心地告诉他们这些军官的处境，请他们顾念并建议给这些军官送一些必需品和食品做礼物。我的儿子有一些军营生活的经验，知道军营需要什么，他就开一张单子给我，我把它也附在信里。委员会同意了，并大为起劲，于是由我儿带领，这些东西如所募的车辆一般很快地到达军营了。它们一共有20袋，每袋装着：

方糖6磅上等黑砂糖6磅上等绿茶1磅上等咖啡6磅巧克力6磅一级白饼干半箱胡椒面半磅一级白醋1夸特格洛斯特奶油1方上等牛油20磅1桶马德拉葡萄酒两打牙买加酒2加仑芥末1瓶精制火腿2只腌牛舌半打大米6磅葡萄干6磅

这20袋东西包装好，放在20匹马上，每匹马所驮的一袋送给一个军官。他们很感谢地收下了，两联队的校官都写信给我表示谢意，用词十分诚恳。这位将军对我替他征集车辆等极为满意，就欣然付给我代垫的账，几次谢我，并请我再帮助他在后方运粮。我也担任了，忙碌地做着这个工作，直到听说他打败为止。我曾用我自己的钱为这工作预付了垫款，数目在1000英镑以上。我把这笔钱开了一个账单给他。很幸运，这账单到他的手中恰在开战之前几日，他立即给我寄来一张向军需处兑款的支票，整整1000英镑，零数并入下次账目。我认

为领回这笔款项真是幸运，那个零数却永远得不到了，这件事后面再讲。

这位将军，我以为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一些欧洲的战争中，他几乎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军官。但是他太自信，高估常备军的效率，而低估美洲军与印第安军的效率。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员乔治·克罗根和100个印第安人随他一起前进，如果他好好地接待他们，可能有很大的好处，可以做向导、哨防等，但是他不关心他们，并且蔑视他们，于是他们渐渐地离开他了。

有一天我和他谈话，他告诉我一些他想进行的计划。他说：“等攻取了杜肯要塞以后，我将进军尼亚加，取得尼亚加之后，如果气候适宜，就进至弗伦特纳克。我以为这是做得到的，因为杜肯很难阻留我三四天以上，而以后我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进军尼亚加了。”我心里早就暗想他的行军必须取道小径，队伍一定很长，在穿过树林丛莽时会被敌军割断，并且我曾知道前次法军1500人进攻伊罗夸伊的失败，所以我对他的此次出征既怀疑又担心。但是只好说：“当然的，先生，以这些优良的军队，辅以完备的炮队，如果能安抵杜肯，那个地方现在还没有防御巩固，并且我们听说也没有强壮的守兵，显然只能短期的抵抗。我担心阻碍你们行军的唯一危险是印第安人的埋伏兵。他们由于经常练习，行动起来极为敏捷，而你的军队的行列必定很长，几乎要4英里，也许招惹他们突然的袭击侧翼，而被他们像一根线似的割裂成几段，但是，因为距离太远，就不能立即互相救援。”

他笑我不明事势，并回答说：“这些野蛮人也许确实是你们未经训练的美洲军队的可怕敌人，但是，先生，以我们精练的常备军当之，决无影响的可能。”我自知和一个军人辩论军事有点不恰当，也就不再多说了。敌人却并没如我所虑的那样当他的队伍延长时加以袭击，只是让它毫无阻碍地前进到这个地方的9英里以内。当时有许多散队集合

（因为它才渡过一条河，前列停驻等待全部渡过），此处是树林中空旷的地方，比以前走过的地方要空旷得多，敌人从树林丛莽后面用密集的炮火袭击前哨队，这是使这位将军知道附近有敌人的第一次报告。于是，前哨队秩序乱起来了，这位将军赶紧催大军上前援助，他非常狼狈地穿过车辆、行李、马匹到前面去。这时炮火已攻击侧翼，军官们骑在马上，更容易被辨别出来当做射击目标，很快地跌下来了。这些兵卒胡乱地挤成一团，没有军令，或听不出军令，只是站着被射击，直到三分之二被杀，于是大家都惊惶起来，慌张地逃走了。

有些车夫从马车上拉开了一匹马匆忙奔逃，其他人立即效仿。因之一切车辆、粮食、大炮和其他军储都留给了敌人。这位将军受了伤，困难地逃出。他的秘书雪利先生在他的旁边被击毙。在86个军官中，63个被击毙或受伤，士卒1100人死掉714人。这1100个士卒是从全军中挑选出来的，其他的和邓巴上校一起留在后面，他们跟着押运军储、粮食和行李。逃走的人没有受追，到达邓巴的营帐，而他们带来的恐慌立即传给了他和他所带的人。虽然他现在还有1000多人，而打败布雷多克的敌人，法国人与印第安人合起来至多不会超过400人，他却非但不前进以企图恢复一些失去的光荣，反而命令把一切军储军需等尽行毁坏，以为他可以多有一些马匹以助他逃往居留地和减少一些搬移的负载。他在那里接到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总督的请求书，请他驻军前线，因为这样可以保护居民，但是他仍继续他的匆急前进，经过诸州，直等到了费城才觉得安全，因为在那里这些居民能够保护他。这次事件使我们美洲人第一次疑心我们对于英国常备军勇敢的尊重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在他们初次行军中，从登陆起到离开居留地止，抢劫居民剥夺衣物，一些穷苦的家庭尽被破毁，此外，如果这些百姓敢有所异议，那么侮辱、责骂、禁闭无所不为。纵然我们真的需要保卫者，这些事已足够使我们不满于这样的保卫者了。这与我们的法国朋友在1781年的

举动多么不同呢，他们从罗德岛到弗吉尼亚前进时要穿过本州居民最多的地方，几乎要有700英里之长，但是丝毫未听到一些类似失去一只鸡、一头猪，或甚至于一个苹果的丝毫怨言。

奥姆上校是这位将军的一个副官，身受重伤和将军一起被救出来，继续和将军住在一起，直到将军去世（这件事在几天以内发生的）。他告诉我将军在第一天全日沉默，到晚上只说了一句：“谁能料到这件事呢？”第二天他仍是沉默，直到最后，才说：“我们在下次该更明白怎样对付他们了。”说完这句话，在几分钟之后就去世了。

凡秘书的文件和这位将军的命令教令和信札等，全部落在敌人的手里。他们选择了一下，把几件译做法文，以之付印，以证明在宣战之前英国政府已有挑衅之意。在这些文件之中我曾见有几封这位将军给内阁的信，称赞我协助军队的大功，把我介绍给他们，请他们另眼相看。戴维·休姆（他几年以后，在赫特福德勋爵做法国公使时，曾为其秘书，后来在康韦将军任国务卿时亦任秘书）也告诉我，在那个办公室中曾在有些文件中见有布雷多克将军的信极力举荐我。但是这次远征已是不幸，我的劳绩，似乎已并无多大价值，而这些介绍也与我无用了。

将军曾表示要酬答我，我只向他请求一事，这就是，他必得下令所属不再征募我们的佣工，并且把已登记的解除。这件事他已经赐允了，而有几个就据此回到他们的主人处去。我为军队服务，所获仅此而已。当邓巴握有兵权时，就没有那样宽厚了。他退兵到费城，或者可说是逃亡到费城时，我向他请求释放他所招募的三个兰开斯特的贫苦农民，提醒他想到已故将军的命令。他答应我，如果这几个主人能在屈伦顿见他（他到纽约的途中不要几日即可到达该地），他将在那里释放他们的佣工归其旧主。因这主人们就费钱费力地向屈伦顿去，而在那里他却拒绝履行其诺言，使他们受了损失而又大为失望。

等到车辆马匹损失的消息普遍地被知道了时，所有物主都找我要代价，这乃是我曾担保赔偿的。他们的要求使我大感困难。我通知他们那笔款子已预备在军需官的手头了，但是首先要得到雪利将军的支付命令。我又向他们保证说已去信向这位将军请求，但是他相距非近，不能立即得到他的答复，所以必须要他们忍耐一下。如此处理，他们也不能满意，于是有几个开始控诉我。终于雪利将军派一个委员来考查这些请求并下令支付，才使我从可怕的境况中解脱出来。这笔款项几近2万英镑，如果要我付，那必得破产了。

在我们得到战败消息之前，有两位邦德医生到我那里来，带着捐册，募集燃放烟火经费，这些烟火预期用于等到我们攻克杜肯要塞的消息时举行的庆祝会里。我严肃地告诉他们，我以为，当我们确信有庆祝的机会时也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这个庆祝会。他们似乎以我不立即附和他们的建议为奇，一个说：“为什么！你肯定以为这要塞不能攻取吧？”我说：“我不能知道这要塞是否能攻取，但是，我知道战争中的事件是动不动就有变化的。”我把我的疑点告诉他们，募捐之事就此作罢。而这些筹备者于是免除了如果他们置备烟火的许多难堪。邦德医生以后在别的事件里，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先见。

担任西北边防军务

莫里斯总督，他在布雷多克战败之前向议会发出一封又一封信，促使他们立法，筹措本州防务经费，不要向业主的财产课税，并且凡是没有这么一句免税话的法案他都给予驳回。后因军情日紧，供应更属必要，他想他的要求大有成功的希望。谁知议会却无论如何坚持立场不动摇，自信公正，并且以为如果他们屈从总督之情而修改这征税法令，必至把重要的正义抛弃。后来有一条法令，集款5万英镑，而他的修改建议全部只有一字。这条法令说：“所有财产，无论动产与不动产必将征税，业主的财产不得视为例外。”他的修改虽小但实际上却很重要，他的修改是把“不”改为“需”。我们把议会致总督的复文全部函告在英国的朋友。当他们听到这个惨败的消息后，纷纷指责业主们的鄙吝，违反正义，竟把这种训令给予总督，就引起反对业主们的呼声，甚至于有人说，因为他们已阻滞州防，应该剥夺他们的权利。业主们听到这些话甚为恐惧，就下令给征税总管，由他们捐输5000英镑，供议会拨充州防之需。

业主捐输之事，议会知道了，于是另拟一个法案，附有免税条文，就依此通过了。在此议案中，我被指定为委员之一，以处理这笔6万英镑之款项。我曾积极参与这法案的起草工作，同时并提出一件建立和招练志愿民兵的法案，这个法案通过议会时并没有多大困难，因为已雇及教友会教徒，使其得自由应募。在组织志愿民兵之前，成立一个筹备会。我写了一篇问答，说明和回答一切我所想得到的对于志愿民兵的反对意见。这篇东西付印了，我以为收效甚大。

当城乡的志愿民兵已组织演习操练时，这位总督怂恿我管理我们的西北边防，因为这地方常受敌人侵扰，因此让我们准备练兵，修造堡垒，保卫居民。我担任了这件军务，虽然我并不自己忖度有资格担

任这件事。他付给我全权的委任状和许多空白的委任状，使我有权分颁发给我认为合适的人。关于招集人员并无多大困难，不久就有560人，由我指挥。我的儿子，他在上次战争时曾在对抗加拿大的战斗中任职，现在做我的副将。这些印第安人把纳登赫特村焚毁，并屠杀村民。该村是摩拉维亚教徒的居住地，但是这个地方我以为是一个建立炮台的好位置。

在行军到那边去时，我把军队集合于伯利恒，此地是摩拉维亚教徒最多的地方。见其防卫很严密，我颇惊讶，纳登赫特的被毁，使他们深感危险。这些主要建筑都以木棚围住。他们从纽约购买到若干武器和炮弹，甚至在他们高大石屋的窗间置放了许多铺路的石子，如有印第安人尝试侵入，妇女们则可以拿石子掷其头颅。这些武装的弟兄们也经常守卫，其纪律之有法和任何城镇驻军一样。在和斯潘根贝格主教的谈话中，我指出我所惊异的事。因知道他们曾得到一个国会法令，免除他们在殖民地的兵役，我曾以为他们决不愿武装起来。他回答我，这并不是他们的立教宗旨，但因为是要和其他教派表示同样宗旨，所以请示政府免征殖民地民众入伍。虽然如此，遵守免征入伍的人却很少。这样看来，他们不仅欺骗自己还欺骗国会了。常识告诉我们，危险已在目前，这有时是会胜过奇思异想的。

那正是1月初，其时我们开始筹备修筑堡垒。我派遣一支队伍向米尼辛克去，命令他们在那里的上沿修筑一所堡垒，再派一队到下沿，附着同样的训令。最后，我自己带着其余部队到纳登赫特去，因为在那里修筑一所堡垒是更为需要的。这些摩拉维亚教徒替我们代备货车5辆、以载运器具、食物、行李，等等。

正在我们离开伯利恒时，遇见11个农夫，他们是被印第安人逐出农场的，跑来请求借些军器，以便回去救护他们的牛羊。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和适当的弹药。我们军队行不上几里，天就下雨了，整整下

了一天。路上并没有民居可供栖身。直到傍晚时才住到一个德国人的家里，在他的仓房中，我们都遍体淋湿地挤在一起。进行中我们还没有被袭击，可算大幸。我们的武器是最平常的一种，而士兵们又不知怎样使他们的枪械保持干燥。印第安人对于这种方法颇为精谙，而我们却不会。在那天印第安人碰到上述的11个可怜的农夫，把他们杀了10个。逃出来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他和他同伴的枪弹都不管用，火药已被雨浸湿了。

接下来的一天是晴天了，我们继续前进，到达了荒凉的纳登赫特。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四周遗存了几堆木板，用这些木板，我们立即以之为栖身之用。在此严寒的天气中最需要的是行动，因为我们没有帐幕，所以这是必须的。我们第一件工作是把我们见到的尸身埋葬，因为乡民只把他们草草掩埋了事。

第二日早上，我们的堡垒已有了图样，定好标记，周围计有455尺，这必须要用尺数一样长的木桩制成栅栏，每个栅栏木桩直径一尺，我们的斧头，共计有70柄，于是立即开始伐树工作。士兵们运斧巧妙，成效显著。看到这些树很快地倒下，我有了好奇心，在两人开始伐取松树时，我看着表，在6分钟内他们把树砍倒在地上了。我发现树的直径有14寸。每株松树可做长18尺、一头尖的木桩3个。当这些事都预备好时，另有些人挖掘周围3尺深的壕沟，栅栏是要立在中间的。我们抽开货车中联络前后两部的车轴，使前后轮分开，把车身取出，于是我们有10辆两轮车，每车两马，装载栅栏木桩从树林中运到壕间。栅栏立好了，我们的木工环绕其中造一个木板月台，大约有6尺高，以备人立在上面，在枪洞里发枪。我们有一架旋转炮，把它架在一角，安置后，立即开放，让印第安人知道我们也有这样一架东西，如果他们听得到的话。如此我们的堡垒（如果我们如此可怜的简陋木栅能配得上如此庄重的名称的话）在一星期中完成了，虽然每隔一天就下大雨，每每使人不能做工。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知道那些被雇用的人极感满意。因为在日间他们安静和快乐地工作，已好好地做了一天的工，晚上消磨得很愉快，但是在我们不做工的日子里，他们就喧哗争吵，并且挑剔食物，而且不断地发脾气。这种事使我记起一位船长来了，他管理海船就是让他的水手不停地工作。他的大副某次告诉他说他们每一件事都做完了，在那里已别无可利用他们之处，他说：“哦，叫他们洗铁锚吧。”

这一类的堡垒，无论如何简陋，已是足够抵御没有炮的印第安人了。当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驻防可保万全，并且遇有机会也有地可退之后，我们就大胆地分队向邻近村落进行搜索。我们没有碰到印第安人，但是我们找到他们伏在附近的小山上守视我们前进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他们设计得很有技巧，似乎值得提及。这时已是冬天了，对他们来说火是必需的，但在普通的地平面上生火，将因为它的光亮，会被远处的人发现他们的住处。于是他们在地上挖掘大约直径3尺，其深度大略超过3尺的洞穴。在那里我们见到他们曾用斧头从森林中烧焦了的木头上砍下的木炭，用这种木炭在洞底生过小火。我们在杂草上又观察到他们留下的痕迹，他们睡在洞的四围，下半身伸进洞里取暖，这在他们是必须的。这种火，如此设法，就不能从光亮、火焰、火星发现他们了。看起来他们的人数不多，似乎看到我们人数过多，袭击无机可乘了。

我们有一位热心的长老会教士比蒂先生做我们的随军牧师，他以怨言告我说人们并不普遍地注意他的祈祷和教训。在这些士兵应募登记时，答应他们除掉饷金和伙食外，每日可得甜酒一吉尔，按时分发，晨夕各半。我观察他们总是准时领取。我就对比蒂先生说：“如果你去管理量酒也许会降低你职务的庄严。但是假如你去做这件事，并且是在祈祷刚完毕时做这件事，他们必定都会到你那里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建议，并担任了这个职务，让几个人帮助他量酒，执行得颇为

公正，于是赴祈祷者从未见过这样地普遍和守时。因此我觉得，处罚不出席祈祷者，这个法子比军法惩办还好。

我好容易才完成这件职务，并使我的堡垒丰储粮食。那时我收到一封总督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召集议会，愿意我到那里去出席，如果边防的事情无须我多留在此的话，我议会中的朋友也写信来催促我到会，如果可能。而我筹的三处堡垒现在都已完成，居民们也在它的保卫之下安心留居田间，于是我决定回去。尤其乐意的是一位新英格兰的官吏、在印度战争中颇有经验的陆军上尉克拉彭跑来参观我的建设，他答应继任为指挥官。我给他一张委任状，令卫队站好行列，在他们面前宣读，并为之介绍，说他是一位军官，以他在军务上之才能实在比我自己更适宜于统领他们，又给他们一点训词，就离去了。我被护送到伯利恒，在那里休息了数天，以恢复疲劳。睡在舒适的床上，第一夜我颇难入睡，这和我们在纳登赫特的小舍中地板上居住，仅仅盖一条或两条毯子的艰苦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呀。

当在伯利恒时，我略为考察了一点摩拉维亚教徒的习俗。他们有几个和我做伴，待我都很好。我发现他们一起工作，共同进餐，在公共的卧室里睡觉，许许多多的人聚在一起。在卧室里我观察到在天花板下相隔一定的距离有许多小洞，这个东西我想是为了流通空气而设的。我到他们的教堂里，听到悦耳的音乐，用风琴以及双簧管、长笛、单簧管伴着小提琴演奏的。我明白他们的说教并不常常把男女老幼混在一起，如我们的习惯一般。他们有时叫结婚的男子集合，有时又集合他们的妻子，同样青年男子、青年女子、小孩子都依类而分。我所听到的说教是小孩子的集合，入堂后，依次坐下。男孩们受一个年轻男子的指导，是他们的教师，而女孩们则受一个年轻女子的指导。这种讲解似乎适合于儿童的智力，抱有快乐亲热的态度，好像是用好东西哄他们似的。他们都很有秩序，但是看起来面色灰白而不健康。这使我疑心他们因长居室中，不曾得到充分的运动锻炼。

我询问了关于摩拉维亚教徒的婚姻，不知道这个报告是否确实，说他们是用抽签法决定的。他们告诉我说这种抽签法只用于某种特别的情形。大概是，当一个青年男子有结婚的倾向时，他通知管理他们这些青年男子的长者，这位长者便和管理青年女子的长者商量。因为男女两性的长者都熟悉他们的性情和嗜好，所以足够判定怎样的一对才合适，而他们的判定一般都被认可。但是，试举一例，如果碰到两个或三个青年女子都同样地合适于嫁一个男子，那么就用抽签法了。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凡是不由男女自主选择的配偶，也许有几个会遭到不幸。但是那人回答我：“如果你让一对对自主选择，他们也许一样会有不幸福的。”这句话我也的确不能反对。

回到了费城，我知道这个志愿民兵进行得很顺利，非教友会教徒的居民很普遍地加入，他们根据新法律自行组成一支队伍，并选举了他们的上校、中尉和少尉。邦德博士过访，向我诉说，他因四处宣传这法令的意旨而受到的痛苦，还认为成功都由于那些努力。我过去曾以归功于我的“问答”为荣。但是，不管他对不对，我却让他自以为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军官集会时选举我为上校，在这时候我接受了。我现在忘掉我们当时有多少连队，但是我们好像把健康的士兵排列起来约有1200人，附有一队炮兵，供给他们6门铜制野战炮，他们运用得很纯熟，在1分钟内可发12响。我第一次检阅我的队伍之后，他们又护送我回到住处，还在我的门前放礼炮以致敬，结果震破了我的电气仪器中的几只玻璃瓶。而我的新荣誉，证明也和玻璃瓶一样脆，因为不久以后由于英国废除了这种法律，我们的职位就被撤销了。

在我短短的上校任期内，我起身向弗吉尼亚旅行。团中军官们以为上校出行，应该由他们护送出城，直到下费里，这才合我的身份。正在我骑着马快要出发时，他们跑到了我的门前，约有三四十人，骑着马，都穿着制服。这个计划先前我不知道，否则我必加以制止。我

天性不喜在任何场合出风头，因而他们的出现遂使我大为不安，又不便阻止他们同行。更坏的事是在我们开始出发时，他们都拔刀出鞘，沿途一直举刀骑马而行。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业主，使他大有反感。当他在州里时，从未受到过这种荣誉，就是对他的任何长官也不行这种敬礼。他说只有王室血亲的王子才配，这句话也许是确实的，因为我至今仍不明白这种礼仪。

这件愚蠢的事情竟增加了他对我的仇恨。那积怨起先就已不小了，因为我供职议会时，关于免除业主财产税，我老是强烈地反对，并且对于他卑鄙和不顾正义地以争此案的情形，不无严格的非难过他。他向内阁控诉，说我是妨碍公务的罪魁，说我凭恃在议会中的势力，阻碍筹款法案的正式通过，并且他以我的军官们列队相送之事证明我有倚恃力量自彼手中夺取本州政权的倾向。他怂恿邮务长埃弗拉德·福克纳勋爵解除我的职务。但是除掉使我从勋爵那里受到一个温和的劝告之外，他别无他效。

不管总督和议会不断的纷争，在议会中我是个议员，也要积极参与，而我仍和这位绅士保持友谊，我们从未有私人的不合。他知道议会对他的复文由我起草，但很少或毫不对我怨恨。我有时以为也许由于他职业习惯的影响，因为他是律师出身，他也许想我们大家只是代替诉讼当事人办理案情，他代表业主而我代表议会。他有时在困难之处时很友好地跑来请求我的指教，有时也接受我的劝告，虽然并不时常如此。

我们同心协力办理供给布雷多克将军军队粮食的事宜。当他战败的噩耗到达时，这位总督立即叫我去，商议防止后面几处地方的沦陷。我现在忘掉我给他的劝告，想起来大概是必得写信与邓巴将军，如果可能，叫他驻军边境，以保卫那些地方，一直等到殖民地的援军到达，使他能够进行远征为止。而在我从边境回来时，他要我率领州

军从事远征，为了杜肯要塞的失陷，邓巴及其军队已另有任用，他提议委我做上将。我知道我的军事学识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么好，我相信他推举我实在超过他的真情，但是他也许以为我的名誉必能易于招集士兵，而我在议会中的势力，也许可以得到军饷，或许还可以不用征业主的税。他见我并不如他所望地热心，这个计划就打消了。不久他就离职，继任者为丹尼上校。

自然科学成果

当我进而叙述关于我在新总督治理之下所做的公务，在这里不能漏去叙述我在学术界声誉日增的情况。

1746年我在波士顿遇见斯宾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到达此间。他把一些电气实验做给我看，这些实验做得还不完全，因为他不太纯熟。但是对于我却是个极新鲜的东西，使我又惊又喜。在我回到费城之后不久，我们的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学社会员科林森先生那里收到一件赠品，是一根玻璃管，附有用以做实验的说明书。我立即把我在波士顿所见到的实验重复进行，由于多次的实验，使我对于英国寄来的说明书中的那些实验，能够不慌不忙地运用，另外还加上了一些新的实验。我在多次的实验中都是屋子里坐满了人，因为有时有许多人来看那些新奇的东西。

为了让大家都做这样的实验，我在我们的玻璃厂中吹制了多件同样的管子，于是他们就足以供给自己用了，我们终于有好几个实验者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科金纳斯利先生，他是我的一位敏慧的邻居，其时正失业。我鼓励他利用表演实验来挣钱，并为他起草了两篇演讲词，其中把实验排列成序，依次附以说明，如此可以帮助观察者由浅入深地领悟。他备有一件专供实验的精良仪器，其中小配件都是我粗陋地制以自用而又由机械师加以精密改造的。他的演讲，听者甚多，而且大为满意。过了一时他横穿殖民地，每到一处即行表演，因此挣到一点钱。后来到了印度群岛时，因为空气常觉潮湿，表演这种实验时颇感困难。

应当向科林斯先生道谢，他赠送过玻璃管等物给我。我想等我实验成功，写信给他，详述我们的实验情况。他得到信之后，在皇家学

社宣读，在那里起先以为这些记录不值得关注，所以未被登在社刊上。我为科金纳斯利先生作了一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送到我的一位朋友米切尔先生那里。他也是皇家学社的一位会员，他写信给我说论文已经宣读，但这些鉴定家只是加以讥笑而已。可是，这些文章终于给福瑟吉尔博士看到了，他以为颇有价值，不可埋没，遂力劝付印。科林斯先生于是把这些文章给凯夫，以便刊印在《绅士》杂志上，但是他愿意分别刊印为许多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作了一篇序。凯夫对于营利似乎很有远见，因为以后的文章逐渐加增，遂集成四开本一厚册，印了五版，而他并未付一点稿费。

隔了一段时间，这些文章在英国大为人所注意。有一本偶然落在德布封伯爵的手中，他在法国是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可说是闻名欧洲。他说服达利巴尔先生把它们译为法文，其书即刊行于巴黎。这本书的刊行使诺莱院长颇不高兴，他是皇家自然哲学教师，又是个能干的实验家，他以前所著的《电气原理》，当时是颇为风行的。在起先他难以相信那样的著作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定是他在巴黎的仇人所虚造，借以推翻他的体系。过后，当他确知在费城确实有个像富兰克林那样的人存在（这事是他曾经疑惑过的），他刊行了一册信札，主要是写给我的信，捍卫他的原理，否认我实验所得的真理和推论。

我也曾有意回复这位院长，并已开始起草。但是考虑之后以为我这所述都是实验的描写，任何一人都能复试和证明，如果不能证明，也就无法辩护。而且陈述之词都用推测的话，并不是主观武断的教条，所以也不必由我来加以辩护。又想到两人间的争论，各用相异的文字发表，必定会因误译而增加误会，容易使彼此误解本意。这位院长的信，就有好几封因为译述不确，发生误解，而对我施以攻击。我决定让我的文章自去浮沉，与其辩论既成之事，相信不如把公务上省下来的时间做一点新实验，所以我从未回复诺莱先生。过后我的朋友皇家科学院里的勃罗伊先生代我驳斥其说，我就更加要静默了。我的

论文集译成意、德、拉丁文字，而其中所包含的理论逐渐为欧洲科学家所公认，而诺莱院长之说遂无声息，因此他在世时目睹了他自己学说的末日，其时他的门徒只有巴黎的B先生而已。

为什么我的书会突然普遍地受到赞誉呢？是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个实验，测试后果然成功，这个实验就是从云中引出电光。试验者为达利日尔先生和特罗耳先生，地点在马里。这个实验的成功广泛地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德洛尔先生有一套《为科学实验》所用的仪器，并备有关于这项科学的演讲，把所谓费城实验重复演习，后来他们在英王面前做实验，巴黎的好奇者都挤着来看了。我不准备详细记述这个重要实验，还有不久前在费城以风筝试验成功时的无限快乐，因为这两件都能在电学史上找到。

一位英国的外科医生赖特博士其时正在巴黎，写信给他的一位皇家社会会员朋友，叙述我的实验在外国学者之间享有的盛名，他们奇怪我的著作为什么在英国却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个学社因此再将曾向他们宣读的信札重加考虑，而素负盛名的立特森博士将这些论文和以后关于此题的内容送到英国的一切信札择要做了摘录，还附以对作者的称誉。此篇摘要刊登在他们的社刊上。有几位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敏智的坎顿先生，证明用尖竿从云中拽电的实验可以成功。他们立即大加改变以前对我的态度，不等我有任何的荣誉请求，他们就选我为会员，还公决免除我纳费的义务，这笔费算来有25几尼，此后还一直以他们的会刊相赠阅。他们又把1753年的戈弗雷·科普利勋爵的金奖章授予我，授此奖时，学会会长麦克莱斯非尔特勋爵并致精彩的祝词，其中对我大为称誉。

出使英国

我们的新总督丹尼上校，把上述由皇家社得来的奖章给我捎来，在市政府为他而设的盛宴中赠送给我。他附说着对我表示敬意的谦词，如他所说，他久已认识我的品格了。饭后，在那时有一种习惯，大家都喝一点酒，他引我走开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他的英国朋友曾劝说他和我说交，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劝告，而颇有益于他。于是他极力与我要好，又坚许我无论何事，在他权力之内的都可以为我效劳。他对我说了许多，也说到业主对于本州的良好处理，如果那种久经继续的对他的策略的反抗能够消减，而他和公众之间的和谐得以恢复，那么我们大家便可共享其利，尤其是我个人。事实上这件事非我莫属，而我也可以得到适当答谢和丰厚的报酬，等等。那些饮酒者见我们没有立即回到席上，便把马德拉酒送过来一罐。这位总督放怀畅饮，他那恳求和报酬的话也就愈多。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意思，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状况尚可，业主的恩惠于我无用。既为议员之一，不可承受任何的恩惠，毕竟我和业主并无私人的冤仇。如果他所提议的公益法案确是为了公众的福利，那么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强烈地去拥护和推行了。我过去之所以反对，就是在于那些法案在事实上都是只为业主的利益着想，而对于民众牺牲太大。我该好好地感谢他（总督），因为他对我谆谆告诫。任何事件在我力之所及的范围内，我必尽力使其行政得到便利，同时希望他不要像前任那样不幸地带着业主的训令而又无力办理。

对我所说的这番话当时他自己并未有所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和议会办事时，争论又发生了，而我如往时一样地力加反对。其时我是个起草委员，首先反对关于传达训令的请求，其次反对关于训令的摘要，这些文稿在其时的议案录和我以后刊行的《读史评论》上可以找

到。但是我们私人间并无嫌隙，我们常在一起。他是个文士，阅历又深，谈吐甚为温雅。他告诉我，我的朋友劳尔夫先生仍活在世上，他是英国最好的政论家，在弗鲁德里克王子和英王的争端中曾被雇用，至今每年可得300英镑的恩俸，但作为诗人，他的声誉确实不佳，后来诗人蒲柏曾在《敦西亚得》中诋毁他的诗，但是认为他的散文却不逊于人。

最后议会觉得业主固执地欲以命令束缚他们的代表，而这种命令不仅于民众利益不合，并且损及英王的事务，决定对此向英王控诉，指定我做他们的代表，到英国去呈递请愿书和办理诉讼。因为议会曾照会总督，愿献6万英镑供英王之用（其中1万英镑是由那时的将军劳登勋爵支配），但是此事总督完全拒绝通过，就为了顺从业主的命令。

被扣在纽约

我已和纽约邮船长莫里斯商妥行程，行李食物都已登船，其时劳登勋爵已到达费城。他告诉我，他来的目的在于企图使总督与议会之间调和，英王陛下的事务不得以他们的意见不合而陷于停顿。因此他要总督和我在他那里相会，那么他得以听到双方所说的话。我们相会并讨论了这件事务。我代表议会，强调各种辩论都可在当时的公报上找到，这些文字都是我写的，并和议会的记录一起付印。而这位总督辩称他和业主有遵守之约，如不服从，必被废黜。此时，如果劳登勋爵能加以劝告，似乎他也并非不愿冒险一下，但是这位勋爵却不愿这样做。有一次，我曾极力怂恿他，最后他宁可叫议会顺从，又请求我利用自己在本州的影响来努力达到这个目的。他宣称如果我们不再继续供给防卫之需，他将把边防皇家军撤退，因为留在那里定要受到敌人侵袭的危险。

我把经过的事情告诉议会，又拟出了一篇决议提交给他们，声明我们的权利，说我们并不放弃这种权利，但以武力威迫，只得屈服，然而对于武力我们仍旧反对。终于他们同意把这议案撤消，另外制定利于业主的法案。这件法案总督当然通过了。于是我也首途赴英。但是正在此时，这邮船已载着我海行用的行李粮食先行开航，这于我未免有一点损失。报酬我的只不过是这位勋爵的几句劳谢的话而已，所有一切调解的功劳都落在他的身上了。

他在我之前到纽约去。在此时邮船的行止都听他的命令，纽约当时正有两艘邮船逗留着，他让其中的一只立即起航了。我询问确切的日期，以免因我而误了船期。他的回答是：“我已布告此船在下星期六起航。但是我可以让你知道，如果你星期一早上到那里，恰恰正好能赶上，但不能再迟延了。”在渡口我却被一点偶然的事情所阻，在我到

达之前已是星期一的午间。我很怕船已开行，因为风势很顺，但是我立即得到安慰，原来它还在埠头，要到明天才开行呢。人家也许会想现在我到欧洲去了，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我还没有怎么熟稔这位勋爵的性格，其中他最突出的特性之一便是“狐疑不决”。我将举例如下。我到纽约时约在4月初，而直到6月末还未开船。在那里当时有两只邮船，停泊好久了，为了等候将军的书信而停留着，而这信常是说明天送到的。另外又有一只邮船到达，也停留着。在我们开船之前，预期第四只快要来了。我们那只船留在那里最长久，所以应该是首先开出的一只。旅客都在忙着，有几个急于动身，而商人们为了他们的书信和他们曾予以保险的秋季货物定单（因在战时）焦急着。但是他们的焦虑并无效力，这位勋爵的信件还没有准备好，有人去看他，见他常在书桌上，手里执着笔，所以结论必定是他一定有大量的东西要写。

一天早上，我自己去问候他，在他的前堂里看见费城的一人因尼斯邮差，他刚从那里来，带着丹尼总督给这位将军的一个包裹。他交给我那里的朋友给我的几封信。我偶然问起他在何时回去，住在哪里，因为我要托他送几封信。他告诉我勋爵命他明天9时到这里来取他给总督的回信，然后立即起程。当日我就把我的信放在他的手里。两星期之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他了。“你回来得真快，因尼斯？”“回来？不对的，我还没有去呢。”“为什么？”“两星期来我每天早上遵命到这里来拿这位勋爵的信，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写成。”“以他那么一个大著作家，会没写成一封信，不可能的！因为我常常看他伏在书桌上。”“是的，”因尼斯说，“但是他正像圣乔治画像，老是在马背上，却从不前进。”这位邮差的评述似乎是颇善造词。当我在英国时，我知道皮特先生以“阁臣们从未听到他的消息，不知他做些什么”为罢免他的理由之一，而代之以阿默斯特和沃尔夫将军。

这样天天盼望开船，3只邮船都开到桑迪湾和那里的舰队会合，旅客们以为最好还是守在船上，以免邮船突然奉命开行，而他们赶不上。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在那里我们守了约6个星期，粮食消耗殆尽，不得不再行购备。终于舰队开驶，这位将军和他的全部军队都在船上，准备前往路易斯堡，想包围此堡垒而攻克这个要塞。一切同行的邮船受命随侍将军的船，等它们准备好之后，接受他的急件。我们在五日后才得到一封信，允许离开舰队向英国驶去。另外的两只邮船他仍旧扣留着，跟他一起开到哈利法克斯，在那里他住了一段时期，训练兵士对假堡垒做假袭击，那时他围攻路易斯堡的意思改变了，于是就带着全军回到了纽约，上述的两只邮船及全船旅客与他又回到了纽约！当他远航之时，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攻取了本州边境的乔治堡垒，而这些印第安人在陷落之后杀戮了许多投降的驻军。

后来我在伦敦看到管理这些邮船之一的尤德船长。他告诉我说，当他的船被扣留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告诉这位勋爵说，船下面附着了海藻，以致到了必然要妨碍航速的程度，而这正是一只邮船的致命之点，所以请求他给一个时间，好把船只倾倒过来以便把船下的海藻打扫干净。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3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在一天之内做完这件事，我就答应你，否则不能。因为在后天是一定要起航的。”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能够得到允许，虽然后来一天又一天地扣留着，足足等了3个月。

我在伦敦也看到了波内尔的一位旅客，他对于这位勋爵颇为恼怒，因为这位勋爵欺骗他并把他扣留在纽约很久，然后又把他载到哈利法克斯，再载回来，以致他起誓说要控诉他，叫他赔偿损失。我不知道他做没做这件事，但是他所说的业务上的损害，其数额就颇为可观。

一般来说，我甚为奇怪人们怎么会把领导大军这样一个重任付托给他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在社会上混得久了，看得多了，各种无耻的钻营手段和授予职位的动机看得多了，我也就不大感到奇怪了。在布雷多克去世后执掌兵权的瑟利将军在我看来，如果他继任此职，较之1757年的罗登将军当有好得多的战绩，而罗登指挥的这一战役是轻率、糜费和玷辱国家的。瑟利虽不是行伍出身，但他本人却是头脑清楚和聪明的，他能够倾听别人的劝告，做出贤明的计划，并敏捷和主动地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罗登非但没有用他的大军来守卫殖民地，反使其完全受到危险，自己却游荡于哈利法克斯，因此失去乔治堡垒。此外，他还打乱了我们的全部商业活动，摧残我们的贸易，因为他托词保留粮食免遭敌人劫夺，而长期封港不许粮食出口，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压低物价，暗中帮助军粮承包商。因此人们说（也许只是出于怀疑），在军粮承包商的利润里他是有份的。并且当最后开禁时，由于忘掉把通知送到查尔斯顿，加上那舰队被扣留在那里又几乎达3个月之久，因此船底被虫蚀伤到毁坏的程度，以致大部分的船在回航时都沉没了。

我想以一个不知军务的人而负领导大军的责任，我相信瑟利一定衷心欢喜解脱这副重担。我曾赴纽约市公宴罗登勋爵就任统帅的盛宴，瑟利虽已卸任，但也出席了。那里有许多官员、市民和外宾，有一些椅子是向邻家借来的，其中有一只非常矮，瑟利先生恰巧座在那里。我坐在旁边看见了，对他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说：“不要紧，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矮位子最舒服。”

正如前面所说的，当我被扣留在纽约的时候，我收到了以前供给布雷多克的粮食等的全部账单。其中有几张账单，我却不能很快地从我所雇用的办事人那里得到。我把它送到罗登勋爵处，要他如数付讫。他命主管人员复核一下，这个人查明每一个项目都无误后，这位勋爵答应命令军需官付款。但是这个命令一再拖延，虽然我常常按照

约定的时间去拜访他，可是仍没有收到。而正在我离开时，他告诉我，经过详细考虑，他决定不把前任的账目和他自己的相混。他说：“你到英国时，只需把你的账单呈送国库，那你就可立即收到钱了。”

我指出由于在纽约被扣留得如此之久而花掉意外的大笔费用，故而依理应该立刻付给我，但是毫无效果。我看到我办事并无酬劳，若再使我遭到任何困难或延迟付还我的垫款，那是不公正的。他说：“哦，先生，你休想欺骗我，说你没有得到好处，那些事情我们明白得很呢，每一个办理军需的人都得想办法把自己的袋子塞满。”我向他保证说我并无这等事，并没有藏过一个铜钱，但是他显然表示不相信我。而确实我后来才知道办这事的人往往会变成巨富。至于我的垫款，至今仍未收到，这件事在后面还要讲到的。

终于到伦敦

在我们开船前，邮船船长大为吹嘘他的船只行驶之快。不幸当我们出了海时，这只船却证明是96只帆船中航行最糟糕的一只，这在他也是一件十分丢面子的事情。其时我们附近另外有一只船行得也差不多同样迟缓，但是毕竟赶过了我们的船。关于这个理由，经过许多的推测之后，这位船长便命令全体船员到船尾去，站得尽可能地挨近扣艏旗杆，包括旅客在内，我们约有40人。当我们站在那里时，这船加快了它的速度，立即把它的邻船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这一点很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船长是怀疑船头上载重过度了。所有水桶以前好像都放在前面的，于是他命令都移到后艏，这样一来，这船就显出了它的特长，表现出它真是船队中之最善于行驶者的了。

这位船长说这船的速率有一次曾经达到每小时13海里的速度。船上旅客中有一位肯尼迪船长，他是在海军里的，力辩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只船会行驶得这样快，那一定是测程器的分度不准，或投掷测程器有误。于是两位船长打赌，在风势足够的时候来决定谁是谁非。于是肯尼迪严格检查测程器，认为满意，决定自己投下去。数日之后，当风吹得很顺当的时候，这只船的船长勒特威奇说他相信此时这船正以13海里的速度行进着，肯尼迪试验之后，自认失败。

我之所以讲起上述之事，是因为我有下面的一个看法。一只新船非等到试航才知道它能不能行驶稳速，这一点是人们已指出的造船技术上的缺点了。因为新船是很准确地仿照行驶甚速的船只的样子修造，但结果适得其反，行得极慢。我觉得这种事情也许一部分是由于船员对于载物、装配和驾驶的方法各有不同意见之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同样的船，由一位船长考虑下令装配的，将与另一船长所考虑下令装配的行驶起来大有优劣。此外，一只船的建造、

装配下海和行驶同为一人者真是难以碰到。总是一个建造船身，另一个装配，又由第三个人装货驾驶。三人之中没有一个能有机会知道其他人全部的想法和经验，因此不能从整体的综合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海上，即使是在一般船的驾驶上，纵然风势相同，我也常常看到轮班的船员，他们的判断是各有不同的。有的把帆张得比别的船陡，或是比别的船平，这样看来他们似乎并无一定有可资遵循的规则。但是我以为应该制定一组实验，先决定船身的最为适当的样式使能快航，再决定其容积和安置桅杆的最适当的地方，然后依据风势，决定其张帆的形式、数量和位置，最后则决定货物的排列方法。这是一个事事讲究实验的时代，我以为这样一套精确制定的和配合起来的实验必有大用。我相信不久会有一位富于发明之才的智者从事于此，而我希望他能获得成功。

在途中我们几次被敌人追逐，但是没有追着，而且我们在30天里一直在探测水的深度。我们观察得很准确，这位船长自己断定已临近法尔默思港口了，那么如果在夜里行驶顺利，在早上我们便可以驶过港口，而在夜里又可以避过敌人掠私船的注意，因为这种船是常在海峡入口的附近巡行的。因此尽可能地把所有的帆都挂了起来，风势很顺利，很强硬，我们便乘着风头，飞快地驶行。这位船长在观察之后才决定方向，以便像他所想的那样绕开锡利群岛。但是好像在圣·乔治海峡那里有时会有一股猛烈的海流，这股海流不易为海员所察觉曾致使克劳兹莱·肖佛尔爵士的舰队覆没了。这种海流或许就是我们遇到危险的原因。

我们在船头上安置了一个守卫，他们常常对他喊：“在那儿好好地注意着。”而他总是回答：“唉，唉。”但也许就是在他闭着眼睛半睡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机械地回答问题，因为正是由于我们前面的灯塔他没有看见，这个灯塔被副帆遮住，舵手和其他值班人员都没有看

见，但由于这船偶尔逸出航线发现了它，于是大家大为惊骇起来。我们已靠它很近了，灯光在我面前就像车轮一样大。其时正值半夜，我们的船长已经熟睡，但是肯尼迪船长在甲板上跳起来，他看到了这个危险。所有的帆不动，他下令叫船转舵，这对桅杆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动作，然而它却使我们未受损伤，免遭船难，因为我们正向建有灯塔的礁石开驶，这次被救使我深深地感到灯塔的功用，并使我决心在美洲鼓励多修灯塔，如果我能够生还回美洲的话。

在早上通过探索测定后始知我们已离海口不远，只是被浓雾遮住，所以不见陆地。9时左右，浓雾散开，好像戏院的幕那样地从水面上被拉起，而在下面现出了法尔默思港市镇、港口内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在那些长时间除了无边海洋的单调景色之外别无所见的人们看来，这是最可喜的景致，而且它带给我们更多的乐趣，因为我们再不会有因战事而产生的焦虑了。

我立即带着我的儿子动身前往伦敦。我们只在道上停留了一会儿，参观了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巨石柱和威尔顿的彭布罗克勋爵的房屋和花园以及他非常珍奇的古物。我们在1757年7月27日到达伦敦。

第4部 补编

不辱使命

查理先生已为我预备好住处，我定居之后立即拜访福瑟吉尔博士，因为人家早把他极力地介绍给我，并劝我和他商议如何开展工作。他反对立即向政府控诉，认为必须先与业主们私下接洽，也许他们会因私人朋友们的调解劝导而和解了事。于是我拜访了与我通信的老友彼得斯·科林斯。他告诉我，弗吉尼亚大商人约翰·汉伯里曾请求当我来时通知他，他可以引我到枢密院长格兰维尔勋爵处去，勋爵也急于要见我。我同意在第二天早上和他同去。于是汉伯里先生特地来拜访我，带我同行到勋爵那儿。勋爵待我颇有礼貌。经过一些关于美洲现状的询问和谈论以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把宪法的本质弄错了，你们坚持认为英王给总督的训令不是法律，以为可以自由斟酌遵守或违抗这些训令。但是那些训令不同于给予一位公使出国时规定他所行使的琐碎礼节的袖中训令。这些训令都是先由饱学的法官起草，经枢密院进行论证、审订或修改，然后呈请英王颁布。这些训令对你们来说即是国家的法律，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我告诉他这番话真是闻所未闻。我久已从我们的宪章上知道，我们的法律是由议会制成，再呈请英王批准，既已批准，英王就不能加以更改或废止了。议会不得英王的批准就不得制定永久的法律，英王也同样不能制定法律而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他肯定地说我完全错误。可是我不以为然，他的谈话使我想到内阁对于我们的意见如何有所警惕，所以我一回到寓所，立刻把这段话写下来。我记得约在20年前，内阁提交议会的一件议案中有一条，建议以英王的训令为殖民地的法律，但这一条被众议院否决了。为了此事，我们崇敬这些众议院的议员们，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自由的朋友——直至1765年——由于他们对我们

的所作所为，才看到他们拒绝让英王行使这一点权利，只是要把它保留给他们自己而已。

数天之后，由于福瑟吉尔博士已与业主们谈过，他们同意在春季花园托马斯·佩恩先生家里和我会面。起初，谈话的内容是双方都声明愿作合理的让步，但是我想关于“合理”一词的意义双方各有各的见解。于是我们进而考虑我们纷争的几点意见，我就把它们列举出来。业主们竭力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而我也竭力为议会辩护。现在我们似乎离开目标很远，双方的意见距离很大，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最后决定让我把控诉的项目写在纸上，他们答应予以考虑。不久以后我就写好送去，但是他们却把这份文件交给了他们的律师费迪南德·约翰·帕里斯。这些业主同邻境马里兰的业主巴尔的摩勋爵打大官司时所有一切法律事务都由帕里斯处理，这件案子持续了70年之久。他还为他们写一切和议会争辩的文件。这是个骄傲而善怒的人，由于我曾在议会的复文里严词批驳过他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实在是理由薄弱，措辞傲慢。他对于我抱着不共戴天之仇，我们一碰面就表现出来。因此，我拒绝业主叫他和我两人讨论控诉要点的建议，除了他们之外我不与任何人接洽。于是他们按帕里斯的劝告把这个文件交给检察长和法部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件议案在那里滞留了将近1年仅差8天，没有回音。在此期间，我常常要求业主的答复，但是除了他们还没有接到检察长和法部大臣的意见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因为他们没有通知我，只是送一封由帕里斯起稿签字的长信给议会，把我的文件重写一遍，诉说这篇东西没有礼貌，足见我的粗鲁；同时又给他们的行为一个无理由的辩护；还说他们愿意调解了事，如果议会将为此事派出一个公正的人来接洽，言外之意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所谓没有礼貌或粗鲁，大概指的是我没有在文件上用他们的尊称“宾夕法尼亚州的真正而绝对的业主”这一头衔，我以为在文件里不

需要这个称呼，因为文件的意图是把我谈话时口头上说的用书面语明确化罢了。

但是在这个耽搁期间，议会已经说服了丹尼总督，通过了作为争辩中的要点——业主财产和平民财产应一律课税案，从而解决了一大争端，所以议会也不回复他们的信了。

但当这件议案通过以后，帕里斯劝告这些业主下决心让这个议案得不到英王的批准。于是他们向代表英王的枢密院控诉，枢密院定期审讯，他们就请两个律师反对这件议案，而我也请两个律师维护这个议案。他们说，这件议案意在加重业主产业的负担而减少平民产业的负担，如果容其继续有效，这些与平民有仇的业主，在依比例而定税额时必将受平民的摆布，那么他们难免要破产。我们回答说，这件议案并没有这种意图，也不会有这种效果。那些财产估价人都是诚实谨慎的人，都会宣誓作公平适当的估价。他们期望由增加业主税额而减少自己税额上获得的利益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不足以使他们背誓。这些就是我所记得的双方所持的大意。除此之外，我们极力坚持，如果废止这件议案，必然会发生有害的后果，因为已发行10万英镑的纸币是交给英王使用的，是为他服务花出去的，现在已分布在民间，一经废止，必使这些纸币成为废纸，使许多民众破产，也妨碍将来政府的拨款。业主的自私自利惹起这样一个普遍灾难，仅仅为了他们的财产征税太高这一种毫无根据的恐惧，以致以最强硬的言辞坚持着。正在此时，当律师正在争辩的时候，一位王室法律顾问曼斯菲尔德勋爵站起来，召我到秘书室里去，他询问我是否真以为执行这件议案并不损害业主的财产。我说当然。他说：“那么你不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吗？”我回答：“决不反对。”于是他把帕里斯召来，经过一些讨论后，双方都听从这位勋爵的建议。枢密院秘书就写了文件，我和查尔斯先生签了字，他也是本州的常务代表。就在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枢密院时，在那里把这条法令通过了。但建议其中几点要修改，我们也约定

要在以后的法律中加以修改，但是州议会以为这些是不需要的。因为在枢密院命令到达之前已经根据本议案征收了一年的税。他们定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估价员的行动，并把几个业主的朋友安置在委员会中。在详细考察之后他们一致地签署了一份报告，说他们觉得所估税额甚为公允。

州议会认为我缔结契约的第一部分是对本州的重大贡献，因为这样一来，就巩固了分布全国的纸币信用。当我回州时他们向我正式道谢。但是业主们恼怨丹尼总督，通过这条议案把他撤职，并恐吓他说要控诉他违背他所约定遵行的训令。但是丹尼总督不管这种恐吓，因为他做这件事是应检察长的要求，为英王服务，而在宫廷中又有几个权贵为之袒护，所以恐吓永远没有见于实行……

附录 富兰克林年表

1706年1月17日 富兰克林出生于波士顿。

1714年 被送入文法学校学习，后转入一所写算学校。

1716年 辍学回家，帮助父亲经营皂烛业。

1718年 到其兄詹姆斯的印刷所当学徒。

1722年4月2日 首次在《新英格兰报》上以“女沉默者”的笔名发表文章。

1723年2月11日 《新英格兰报》以本杰明的名义出版。

9—10月 离开詹姆斯的印刷所来到费城，不久开始为凯默工作。

1724年11月5日 起程前往伦敦。在伦敦先后到帕尔默和瓦茨的印刷所工作。

1725年 写作并发表《论自由与穷困，快乐与痛苦》一文。

1726年7月21日 离开伦敦，返回美洲。

10月11日 抵达费城。先是受雇做德纳姆的职员，后再为凯默工作。

1727年 创办“讲读俱乐部”。

1728年 与梅雷迪思共同开办印刷所。

1729年4月3日 发表《纸币的性质与需要》一文。

10月3日 与梅雷迪斯接办凯默的《宾夕法尼亚报》。

1730年7月14日 同梅雷迪斯在印刷业上分手。

9月1日 同黛博拉·里德结婚。

1731年 第一个孩子威廉·富兰克林降生。

11月8日 创办的图书馆举行首次理事会。

1732年10月20日 弗朗西斯·福格尔·富兰克林（死于天花的儿子）降生。

12月19日 《穷理查年鉴》首次出版。

1735年4—9月 为异教传道士汉姆菲尔辩护。

1736年10月15日 受聘为议会秘书。

12月7日 组建“联合救火会”。

1737年10月5日 出任费城邮政局长，并连任至1753年。

1739年11月2日 乔治·怀特菲尔德牧师首次访问费城。

1739—1740年发明“富兰克林式火炉”。

1741年1—6月 出版《北美杂志》。

1743年5月14日 发表《对促进有用的知识的建议》一文，该文导致了“美洲哲学会”的建立。

5—6月 在波士顿会见斯宾斯博士，并观察电学实验。

8月31日 其女儿萨拉·富兰克林降生。

1747年3月28日 首次提到他进行了电学实验。

11月24日 成立保护宾夕法尼亚的联盟。

1748年1月1日 与戴维·霍尔达成合作经营印刷业18年的联盟后，宣布退出印刷业活动。

10月4日 被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

1749年10月 发表《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人教育问题的建议》一文。

11月13日 被选为费城中等学校理事会主席（后来的费城专科学校和费城学院，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任该职到1756年，后任该校理事直至他逝世。

1751年4月 富兰克林《关于电荷的观察实验》的第一部分在伦敦出版；增补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在1753年和1754年出版；到1774年它们共再版5次。

5月11日 宾夕法尼亚医院获准可。

8月13日 作为费城代表进入宾夕法尼亚议会。

10月1日 被选为费城参议员。

1752年3月25日 创建火灾保险公司。

5月10日 德阿里巴赫德在法国演示富兰克林提出的闪电实验。

6月 富兰克林在费城做风筝导引雷电实验，报道于10月9日发表。

1753年7月25日 接受哈佛大学的荣誉文科硕士学位。

8月10日 与威廉·亨特共同担任北美邮政监察员。

9月12日 接受耶鲁大学的荣誉文科硕士学位。

11月30日 伦敦皇家学会授予富兰克林科普利奖章。

1754年6月19日—7月11日 出席奥尔巴尼会议，提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1755年4—5月 为布雷多克将军筹集马匹、马车和粮食，以准备法国和印第安人的第一次大战役。

6月30日 被推选为宾夕法尼亚医院理事会主席。

12月8—31日 在北安普敦郡同其他地方官员一起组织防御印第安人。

1756年1月7日—2月5日 在北安普敦郡指挥建立了三个横跨山梁的堡垒。

2月24日 被委任为费城军团的上校。

4月20日 接受威廉和玛丽学院的荣誉文科硕士学位。

4月29日 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1757年2月3日 受殖民地议会委托作为代理人去伦敦。

6月20日—7月17日 在与儿子威廉赴英国的途中写了《穷理查年鉴》1758年版的前言。

7月27日 抵达伦敦，寄宿几天后，搬至玛格丽特夫人克莱文街的家。

8月13日—8月20日 开始同佩恩家族谈判，直到1760年8日获胜为止。

9—11月 在克莱文街的寓所患重病。

1758年 夏天同威廉一起访问了富兰克林和里德的老家，走访了一些在埃克顿、班伯里和伯明翰的亲戚。

1759年2月12日 接受圣·亚当斯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8—10月 同威廉访问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并同苏格兰的知识界人士休谟、凯姆斯、罗伯逊、迪克、卡伦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间还先后被爱丁堡市（9月5日）、格拉斯哥市（9月19日）和圣·亚当斯自治市（10月2日）给予了行动自由权。

1760年4月17日 发表《大不列颠应考虑的利益》一文。

8月27日—8月28日 出席英国枢密院会议。

9—10月 携威廉访问考文垂、柴郡、威尔、布里斯托尔和巴斯。

12月8月 首次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委员会理事会的席位，并在以后的1765、1766、1772年再次获得。

1761年8—9月 同儿子威廉与理查德·杰克逊访问弗兰德和荷兰。

9月22日 返回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三世的加冕礼仪式。

1762年4月30日 接受牛津大学的荣誉民法博士学位；其儿子威廉亦同时被授予文科硕士学位。

7月13日 描述了他新发明的乐器——玻璃琴。

8月24日 从朴茨茅斯起程返回费城。

9月4日 威廉·富兰克林同伊丽莎白·唐斯结婚，5天之后，威廉被委任为新泽西殖民地州长（次年2月25日上任）。

11月1日 富兰克林到达费城家中。

1763年4—5月 经过4周左右的时间旅行到达弗吉尼亚负责邮务工作。

6月8日—11月5日 在新泽西、纽约和新英格兰负责邮务工作，在此期间富兰克林患过两次重病，他的女儿萨拉一直陪伴着他。

12月 宾夕法尼亚边境发生屠杀印第安人事件。

1764年1月30日 发表题为《近来的大屠杀》一文，愤慨地抨击那些敌视印第安人者违犯人类道德法规的行为。

4月12日 发表《对时局的沉思》一文。

5月26日 被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长，任职至10月。

10月26日 议会通过法案确定富兰克林再次作为议会代理人去伦敦。

11月9日 起程前往伦敦，经过一个月的航行，于12月10日到达伦敦，住在史蒂文森夫人克莱文街的家中。

1765年2月2日 同其他殖民地的代表一起与乔治·格兰维尔商讨提出的印花税问题。

3月22日 《印花税法案》通过。

1766年1月 富兰克林在伦敦匿名发表了几篇文章，呼吁废除印花税法。

2月6日 同戴维·霍尔中止了在印刷业上的合作，从而停止了一项较大的私人收入。

2月13日 为废除印花税法，富兰克林发表了一份代表殖民地立场的声明书。

3月18日 《印花税法》废除。

6月14日—8月13日 同英国王室医生约翰·普林格尔到德国作了一次长时间

的旅行，会见了文学界和科学界的一些人士。他们两人被选为哥丁根的德国皇家科学学会的成员（7月19日）。

1767年7月2日 《汤森税法》通过。

8月28日—10月8日 同普林格尔到巴黎旅行，被引见给路易十五，会见了德阿

里巴赫德和许多法国科学家及重农主义者。

1768年1月7日 在《伦敦记事》上发表他的《1768年前美洲不满的原因

一文》，他在这些年及随后的许多年中，从未间断写些评论殖民地事务的文章给伦敦的报纸。

4月11日 被委任为佐治亚殖民地的代理人。

10月1日 同访问伦敦的丹麦国王克里斯琴七世共同进餐。

1769年1月2日 被选为美洲哲学会主席。

1—2月 他的《关于电荷的观察实验》第4版出版，增补了许多他关于电学方面的各类题目的文章。

6—12月 与英国和美洲的合作者共同组织土地公司，并在俄亥俄山

谷寻求许可。

7月14日—8月23日 到法国作第二次旅行。

11月8日 被新泽西众议院任命为代理人。

1770年4月 《汤森税法》废除，又出现“茶叶事件”。

10月24日 被马萨诸塞众议院委任为代理人。

1771年7月30日—8月13日 在特怀福德镇写了自传的第一部分。

8月25日—11月30日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作了他住在英国期间最长的一次旅行，在都柏林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1772年6月5日 在枢密院介绍维多利亚土地公司。

6—7日 访问英格兰西北部。

8月 达特默斯接替希尔斯伯勒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8月16日 被选入法国科学院，是该院仅有的8名外国成员之一。

8月21—27日 为军械器材部起草了一份关于从闪电下保护军用火药库的皇家学会报告书。

10月8—24日 访问了弗朗西斯·达什伍德（一位邮政总长）在乡村的家；将住所从史蒂文森夫人处迁移到克雷文街一家商店的邻居家中。

12月2日 将“哈钦森信件”送至马萨诸塞的通讯委员会。

1773年5月10日 《茶叶法案》通过。

5—7月 警告达特默斯殖民地将不会让步。

夏天 雅克·迪布尔在巴黎出版《富兰克林文集》。

8月21日 给达特默斯送去马萨诸塞关于撤免总督哈钦森的请求书。

9月 发表《缩小帝国要诀》（9月11日）和《普鲁士国王敕令》（9月22日）两篇文章，对英国的政策给予讽刺性的攻击。

10月 为《英国国教祈祷书节本》作序；处理他在朴茨茅斯做

的关于油在汹涌的海水中的结果的实验。

12月16日 “波士顿茶党案”。

1774年1月29日 出席密院委员会召集的讨论马萨诸塞请求书的会议。

1月31日 被免掉洲邮政总监的职务。

3—6月 《强制法案》通过，并先后通过《封闭波士顿港口法案》及《驻营条例》等一系列法案。

8月 应邀访问查塔姆勋爵，讨论美洲的危机。

9月5日—10月26日 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

9月30日 将托马斯·潘恩推荐给费城一位友人，说他是“一位机智有才、值得尊敬的年轻人”。

12月 英国很有影响的教友派及海德勋爵和豪勋爵，作为内阁的调解人积极地开始同富兰克林进行秘密谈判，试图为解决殖民地的危机寻找一条道路，富兰克林拟定了17条建议。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同威廉·皮特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也进行了磋商。

12月19日 其妻黛博拉·富兰克林在费城去世。

1775年3月20日 富兰克林放弃了任何和平解决殖民地危机的希望，从补茨茅斯起程回美国。于航行途中写了《在伦敦的谈判说明》（3月22日）。

5月5日 抵达费城。

5月6日 被选为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

5月10日 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富兰克林被委任到许多委员会中，包括负责邮政事务、“橄榄枝请求”、制造火药、秘密委员会（为了获得武器等）、秘密通讯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

6月30日 被委任到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7月3日任主席）。

7月21日 受大陆会议委托起草“美洲殖民地邦联条例”。

7月26日 被大陆会议选为邮政总长。

10月4日—11月13日 作为大陆会议派的三成员之一，视察在坎布里奇的华盛顿开营。

1776年3月25日—5月30日 同卡林顿的塞缪尔·蔡斯和查尔斯·卡罗尔在约翰·卡罗尔神甫的伴随下，前往蒙特利尔去说服法属加拿大参加殖民地武装起义，富兰克林时年已70高龄，被这次危险而艰难的长途行动弄得疲惫不堪。

6月11日 被任命为《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最后对杰斐逊起草的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6月12日 同约翰·亚当斯在委员会里准备与列强谈判的条约计划，9月17日采用的“1776年计划”成为未来的贸易政策和商务条约的模式。

7月2日 参加大陆会议的13个代表团投票赞成独立（纽约代表团弃权）。

7月4日 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

7月8日 出席宾夕法尼亚制宪会议，并当选为主席。

9月9—13日 到斯塔滕岛会见豪勋爵。

9月26日 被任命为前往法国朝廷的美国政府特使。

10月1日 同罗伯特·莫里斯安排接收法国援助的第一船货物，该船货物是通过博马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送出的。

10月26日 乘大陆会议的战船“复仇号”前往法国，陪同他的有他的孙子威廉·坦普尔·富兰克林（16岁）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7岁）。

12月3日 在法国欧赖登陆。

12月21日 抵达巴黎。

12月28日 会见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并开始谈判。

1777年1—2月 出席法国科学院及一些展览会，被邀参加法国一些社会名流的聚会。

1月14日 获得了法国对援助的保证，并接受第一次秘密援助。

3月2日 在距巴黎2英里的帕西建起了一座房子作为住所。

10月17日 萨拉托加大捷。

11月15日 大陆会议通过《邦联条例》。

12月17日 法国承认美国独立。

1778年 在这一年里，富兰克林的油画像、肖像和雕像在法国广为流传，他在法国成为一名伟大的人物，被巴黎人看做是卢梭的化身。

1月16日 富兰克林和迪恩向约翰·保罗·琼斯发出指示，令“罗杰号”在英国水域巡航。

1月28日 报告法国答应该年给予600万里弗尔的援助，分四次支付。

2月6日 同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和友好商务条约（大陆会议于5月4日批准）。

3月20日 公开地正式会见路易十六。

4月29日 在法国科学院会见伏尔泰。

6月17日 英法宣布处于战争状态。

1779年2月12日 收到大陆会议任命他为驻法全权公使的通知，时年已73岁高龄。

3月23日 向法国递交国书。

3—10月 忙于对美国大陆军的供应，争取更多的援助，并在一封信中建议美国应当发行公债。

6月21日 西班牙对英宣战。

12月 英国驻法外交官本杰明·沃恩在伦敦出版《皇家学会会员、法学博士本杰明·富兰克林政治、哲学和杂文集》，这是第一部全面编辑富兰克林这一方面文章的集子。

1780年 谋求从西班牙获得贷款。

1781年1月1日 大陆会议发行1.91亿美元的债券（大陆券）。

3月1日 《邦联条例》宣布生效。

3月10日 韦尔热纳通知富兰克林进行调停的建议。

3月12日 富兰克林请求大陆会议重新委任一名大使来代替他的职务，理由是自己年事已高（时年75岁）。

5月20日 法国向美国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贷款。

6月14日 大陆会议委任富兰克林、杰伊等人同亚当斯一起作为特使参加和谈，并要求他们只能在法国了解并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条件下进行工作。

10月19日 康华利投降。

11月19日 晚上11点，韦尔热纳给富兰克林送去关于康华利在约克敦投降的消息。

1782年3月22日 英国决定与美国和平使团开始直接谈判。4月12日和平谈判开始举行。富兰克林成为出席谈判的美国使团的唯一成员，他同英国秘密特使在4月20—22日单独进行了非正式的和谈；提议亚当斯和杰伊加入巴黎和谈，英国方面的主要和谈代表是奥斯瓦德。

6月23日 杰伊抵达巴黎参加和谈。

7月10日 富兰克林在没有通知韦尔热纳的情况下，向奥斯瓦德提出了“必不可少”的条款。

7—10月 富兰克林和杰伊坚持把承认美国独立作为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他们在未取得韦尔热纳同意的情况下起草了一个准备和谈的条款并给了英国。

10月26日 亚当斯抵达巴黎参加和谈。

11月26日 劳伦斯到达巴黎。

11月30日 英美签订和约草案。

12月15—17日 韦尔热纳抗议美国违约，富兰克林承认美国在外交上的不适当之处，并表示了美国对法国的感谢，机智地处理了这一局势。

12月20日 富兰克林又争取到法国贷款600万里弗尔的保证。

1783年1月20日 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出席《英法和约》及《英西和约》草案的签字仪式，声明《英美和约》开始生效和宣布停战。

3—7月 安排在法国出版美国州宪法和邦联条例，并印刷美国同法国、瑞典、荷兰的条约集。

4月3日 《美瑞友好商务条约》签字。

4—8月 与英国特使戴维·哈特利谈判商务条约及修改和平条约，未获结果。

7月 罗马教皇使节同富兰克林协商在美国建立罗马天主教的组织程序问题，并一直持续到次年7月。

8—12月 富兰克林对一系列的气球升空试验着迷，首先证明了人类能够操纵飞行。

9月3日 同杰伊、亚当斯及英方代表哈特利参加结束战争的《巴黎和约》签字仪式。

1784年1月14日 邦联国会批准《巴黎和约》。

5月12日 《英美贸易条约》获得批准，富兰克林再次提出辞职请求。

7—8月 又接受了新的使命，同亚当斯和杰斐逊一起与欧洲诸国及北非伊斯兰教各国商谈友好商务条约。

1785年5月2日 杰斐逊被任命为驻法公使以接替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被获准返回祖国。

7月12日 富兰克林离开帕西，由于膀胱结石带来的痛苦，不得不躺在用一头骡子驼着的狭窄的担架上行进。

7月24日 到达英国的南安普敦，在儿子威廉及其他一些朋友的陪同下访问了该地。

7月28日 起程返回美国；在航行途中写了《海上的观察》、《烟囱冒烟的原因及防治》及《一种将煤完全燃烧不产生烟雾的新式火炉的说明》等文章。

9月14日 抵达费城，费城人民倾城而出，组成了一支浩大的欢迎队伍，鸣炮、敲钟迎接富兰克林的归来。在随后的几天里，一直忙于出席庆祝会和议会，大学及其他团体和组织的欢迎会。

10月11日 被选为宾夕法尼亚最高行政会议成员。

10月18日 当选为会议州长。

1786年 扩建他在市场大街的房子，建成了一座拥有4000多册图书的书房。

1787年2月9日 创建政治研究会，并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经常在他的新住所聚会。

4月23日 当选为宾夕法尼亚促进废奴协会主席。

5月16日 招待华盛顿和其他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吃饭。

5月28日—9月17日 作为宾夕法尼亚代表参加联邦制宪会议，时年81岁。

6月28日 提议制宪会议开始时先行祈祷，提议被采纳。

7月3日 建议全体委员在代表制问题上接受“大妥协”，7月16日，委员会投票赞成了他的提议。

9月17日 在制宪会议上致闭幕词。号召每一个成员“不能说这样一个宪法是绝对可靠和正确的”，但要力争全体一致地通过它。

11月14日 同意出版他的制宪会议闭幕词，在以后批准宪法的斗争过程中，它被反复印刷了50多版。

1788年6月21日 联邦宪法获9个州批准，从而使宪法生效。

7月2日 邦联国会宣布联邦宪法生效。

7月17日 富兰克林写下他的遗嘱，在次年6月23日又写了遗嘱的附录，对波士顿和费城给予了著名的遗赠。

8月 开始撰写自传的第三部分。

10月14日 辞去了宾夕法尼亚最高行政会议主席的职务，结束了他长达近60年的政治生涯。

1789年2月 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

4月30日 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

9月16日 向华盛顿总统发出祝贺信。

11月2—13日 将自传的第一、二、三部分送给他在英国和法国的朋友。

1790年2月3日 签署他的最后一份公文；作为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主席，签署了一份要求国会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文件。

3月9日 对埃兹拉·斯泰尔斯重申了他的终生信条。

4月8日 处理了他的最后一件公务；写信答复国务卿杰斐逊关于巴黎和谈委员会解决东北疆界问题的询问，并送去了他自己的一本米切尔地区的地图。

4月17日 晚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